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 反对梵蒂冈“封圣”活动声明



10月2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在北京举行反对梵蒂冈“封圣”活动座谈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关于梵蒂冈“封圣”问题的声明

梵蒂冈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于 10 月 1 日举行“封圣”仪式，把曾经在中国犯下丑恶罪行的一些外国传教士及其追随者册封为“圣人”。中国政府和人民及中国天主教会对此表示极大愤慨和强烈抗议。

众所周知，在近代史上，天主教的一些外国传教士曾经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直接参与者和帮凶。这次被梵蒂冈册封的一些人更是在中国土地上奸淫抢掠，为非作歹，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对此，梵蒂冈不仅不表示忏悔，反而要把这些作恶多端的罪人册封为“圣人”，这是对中国人民的公然挑衅，是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翻案，是对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的爱国行动的极大侮辱。梵蒂冈的这一行径严重伤害

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和中华民族的尊严。

梵蒂冈口头上表示愿意与中国改善关系，但在实际行动中却一再违背其不干涉中国内政和在台湾问题上的承诺，现在又一意孤行，坚持“封圣”，严重破坏了中梵关系正常化的基础。这必然对中梵关系正常化进程产生严重消极影响。造成这种局面的责任应完全由梵蒂冈承担。

（原载 2000 年 10 月 2 日《人民日报》）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 天主教主教团关于梵蒂冈无视中国 教会主权拟册封所谓“圣人”的声明

近 闻，教廷拟于 10 月 1 日册封 120 名“在
中国致命”的所谓“圣人”，中国天主教会
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对这种企图借“封圣”歪曲
和篡改历史的行径表示愤慨。

根据圣教会的传统，教会对宣封之事要求
十分慎重，在有关法令和文献中对被列品者应
必备的条件，以及需要进行的严格调查和审批
论证的程序等都做出了非常严格的规定，以确
保册封的圣人真正当之无愧、堪受钦敬。然而
即将举行的这次“封圣”却令我们感到十分惊
诧。此次册封“圣人”，教廷既未履行规定的程
序，向册封者所在地的主教和中国主教团征询
意见，也没有到当地进行调查核实，而是由所谓
的“台湾地区主教团”越俎代庖。这种无视中国

教会主权，草率行事的做法令人震惊。此次“封圣”的程序混乱，“封圣”的对象中不少人劣迹斑斑，“封圣”的时间又选在中国国庆日这一象征中国人民彻底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和掠夺，翻身解放的日子，这是对中国人民、中国教会的公开羞辱和蔑视，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和接受的。

众所周知，封圣对象应当是教友公认的基督徒模范，是天主所悦纳的优秀儿女。在中国天主教七百年的历史中，的确不乏爱国爱教的大圣大德之人，册封中国圣人也是中国教会几百年来殷切希望。但是教廷此次宣封的外国传教士中有些人充当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对中国人民犯下严重罪行。他们的一些追随者也并不是为信仰而牺牲的殉道者。历史上，由于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基督教为本国的政治利益服务，一些外国传教士依仗不平等条约胡作非为，引发大小教案 1500 余起，大量中国民众因此丧失生命，一些中国天主教徒也成为无辜的牺牲品，这些历史的创伤至今仍淤积在中国人民和中国教会的心中。我们不愿回首痛苦的往事，也不愿去揭历史的伤疤。但历史是不容否定的，历史事实也是任何人抹煞不了的。梵蒂冈官方通讯社信仰社的评论员文章毫不掩饰地宣称：“封圣是向北京政府的勇敢挑战”，暴露了教廷中有一些人借“封圣”歪曲和篡改历史，企图重新控制中国天主教会，鼓动教徒对抗政府、无视法律，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利用宗教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这不仅是向中国政府的挑战，也是向 400 万中国天主教徒良心的挑战，更是向 12 亿中国人民感情的挑战。

历史上，由于罗马教廷的错误决定引起礼仪之争，造成长达百余年的禁教；在抗日战争期间，梵蒂冈要求中国教徒对日本帝国主

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的所谓“中立”原则,并在此前率先承认伪“满洲国”,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新中国成立后,梵蒂冈采取敌视新中国的立场,煽动教徒对抗人民政权,把中国教会推向危险的边缘。梵蒂冈错误的对华政策,给中国教会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在教会即将进入第三个千年之际,我们希望教廷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不要再重复历史的错误,给中国教会的福传事业带来更大的损害。千禧年是和平之年,也是忏悔之年。我们强烈要求教廷对历史上所犯的错误向中华民族真正忏悔。我们强烈要求教廷在“封圣”问题上充分尊重中国教会的主权,充分尊重中国教徒的感情,不要再为中梵关系的改善设置新的障碍。

让我们祈求天主,恩赐教会坦诚、正义和仁爱之德。在天主圣神的指引下,中国天主教会将继续坚持爱国爱教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推进福传牧灵事业,办好中国天主教会,维护圣教会的圣洁和安宁。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
中国天主教主教团
2000年9月26日

中国近代史 与外国传教士



义和团包围廊坊车站，阻击联军北犯

梵蒂冈“封圣”是 对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中 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 51 周年华诞,举国欢腾,全国各族人民共庆这一象征中华民族彻底推翻三座大山,真正站立起来的伟大日子。然而,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却上演了一台闹剧,一些曾经在中国犯下丑恶罪行的外国传教士以及追随者被册封为“圣人”。梵蒂冈不顾中国人民包括广大天主教徒的强烈反对,坚持搞“封圣”的倒行逆施,极大地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感情,这是对 12 亿中国人民的严重挑

碑。

梵蒂冈的“封圣”揭开了中国人民淤积在心底的历史伤痕。梵蒂冈此次“封圣”的 120 人，有相当一批是外籍传教士，大都死于鸦片战争至义和团运动期间，他们中的一些人违反当时中国法令非法潜入内地传教，充当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受到应有的惩罚。如法国传教士马赖、意大利传教士郭西德、西班牙传教士刘方济等，放荡无耻，为非作歹，欺官压民，无恶不作。直到现在，当地老百姓一提起他们还异常痛恨。他们并不是什么“圣人”，而是不折不扣的罪人。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中，中国百姓死伤无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浩劫。其中一些中国天主教徒也死于非命，他们是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殉难者和殖民地教会势力的牺牲品，而不是什么“为信仰而牺牲的殉道者”。

梵蒂冈一方面辩称，“封圣”是为了突出这些“圣人”对基督忠贞不渝的精神，并不意味着对历史做出评判；另一方面又忍不住说，“封圣”有助于澄清将传教事业与殖民主义混为一谈的观念，是“为历史正名”。梵蒂冈搞这次“封圣”，究竟是鼓励“对基督忠贞不渝”，还是对殖民者“忠贞不渝”？究竟是“为历史正名”，还是歪曲和篡改历史，为一些传教士曾经充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开脱罪责？自欺岂能欺人，欲盖反而弥彰。

众所周知，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伴随着中国人民的苦难。帝国主义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数以千计的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大背景下，从总体上说，外国传教士充当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

中国的工具。其中不少外国传教士直接为殖民主义的扩张效力，参与贩卖鸦片、收集情报、鼓动和参与军事侵略、攫取经济利益，参与策划胁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并凭借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特权，以殖民主义征服者的姿态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传教点的建立、传教区域的扩展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紧密相连。他们的劣迹和罪行，是任何人也无法掩盖的。

梵蒂冈的倒行逆施，当然要遭到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上一切正直的人们的反对。梵蒂冈为了混淆视听，一再表白这次“封圣”是“向中国人民表示敬意”，是“善意”的举动。但其官方通讯社信仰社在今年 3 月 17 日的评论员文章却一语道破天机，声称“封圣是向北京政府的勇敢挑战，是对教会勇气的严峻挑战。至今还有数以百计的殉道者在共产党的压制之下”。长期以来，梵蒂冈一直采取敌视新中国的立场，这次搞“封圣”，其用意就是挑动天主教徒无视中国法律，对抗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梵蒂冈搞这次“封圣”活动，决不是一次单纯的宗教活动，而是借翻历史定案为现实政治目的服务，是利用宗教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如此“善意”，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在新千年来临之际，梵蒂冈对天主教会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过，如发动十字军东征、设立宗教裁判所、派遣至非洲和美洲的传教先锋团侵害当地住民的权利、对德国法西斯屠杀犹太人表示沉默等等，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忏悔，虽然不具体也不彻底，虽然受害的国家和民族并不满意，但毕竟作出了一点姿态。值得关注的是，梵蒂冈对其在历史上对中国人民犯下的诸多罪行只字未提，避而不谈。

梵蒂冈一边说不要纠缠历史，要面向未来，一方面又在借“封圣”翻历史的旧案。

梵蒂冈口口声声表示愿意改善中梵关系，但在实际行动中却一再地为改善关系设置障碍。这次经过精心策划的“封圣”活动，成为一个极好的反面教材，它使中国人民透过梵蒂冈虚伪的道德面具，更加认清了它的反华政治面目。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要统一、中国要发展，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 100 多年前那个积贫积弱、任人欺凌的中国。我们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世界上任何国家建立正常友好的双边关系，但我们决不会以放弃原则作代价，更不会拿主权作交易，任何人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苦果。

50 年前，中国天主教发起了反帝爱国运动，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摆脱了外国势力的控制和利用，坚定地站在了国家和人民的一边，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正义道路。几十年来，中国天主教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赢得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天主教界人士的理解和支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天主教会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沿着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走下去，创造更加光明、美好的前景。

（原载 2000 年 10 月 3 日《人民日报》）

义和团运动和 罗马教廷的“封圣”活动

戴 逸

今年是义和团运动的 100 周年,100 年前的这次运动是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结果,是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矛盾的大爆发。中国近代社会,帝国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形式是清政府参加和领导的大规模战争,如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等,另一种形式是人民群众自发的反侵略斗争,主要表现为风起云涌、范围广泛的反洋教斗争,亦即所谓“民教冲突”。近代的外国教会是随同外国侵略军的坚

船利炮进入中国的，传教士们以不平等条约为护身符，深入内地，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干了很多坏事。又在中国招收大量教徒，其中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许多地痞流氓，混迹其中，他们依靠教堂势力，欺压良善，鱼肉乡里，为非作歹。正因为这些原因，加上文化上的隔阂，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帝国主义侵略越深入，外国的传教活动越频繁，教案越增多。19世纪末，矛盾积累，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的性质是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运动。周恩来总理说：“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斗争是50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当然，义和团的时代，中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还很弱小，中国还没有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传入。义和团是一次单纯的农民运动，表现其分散性、狭隘性、迷信落后、盲目排外的种种弱点，不成熟的社会只能产生不成熟的运动。但这是一场正义的自卫的爱国救亡的斗争。100年后的今天，正当我国在纪念义和团运动的时候，罗马教廷突然出来搞“封圣”活动，所封的120个“圣人”中有86人是死在义和团运动中的所谓“殉教者”，可见他的矛头是指向义和团运动，要翻历史的案，否定和诋毁义和团运动。尤其是挑选10月1日，即我国51周年国庆的日子搞“封圣活动”，其政治意图，昭然若揭，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12亿中国人民的公开挑衅。

中国人民决不会忘记过去的历史，这是一段被侵略、受屈辱的刻骨铭心的历史。但事情已经过去了100年，过去的罪行都是当年侵略分子干的，我们不想再纠缠这笔老账。但是罗马教廷主动

挑衅，对中国做出极不友好的举动，迫使我们不能不进行辩正。

义和团因何而起？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徒因何丧生？这是因为外国教会勾结清政府欺压中国人民，人民不得不进行反抗。外国传教士罪行累累，难以缕述。这里只举袁世凯的一段话，袁当时任山东巡抚，他仇视义和团，庇护外国教会，但他也不得不承认“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源，实由地方州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制，……而教民转得借官吏之势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诉，亦难伸理。积怨成仇，有由然也。”^①连袁世凯也这样说，可见教会势力的骄横跋扈。

帝国主义诬蔑义和团是杀人暴徒，把冲突的责任推到义和团一方，我们决不同意这种强盗逻辑。我们且看看传教士在义和团运动时的所作所为。当时在中国的传教士约有三、四千人，我们对外国传教士并不一概而论，而要具体分析，对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的传教士个人应当分别作出评价，有些传教士是安分守法的，他们在文化教育方面、医疗卫生方面、公益慈善事业方面做了好事，作出贡献，我们对他们表示尊重和敬意。但有很多传教士，尤其在义和团运动中，公开与中国人民为敌，他们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教堂，其中有些教堂，备有武器，建立城堡，挖掘壕沟，他们的武器是新式快枪，甚至置备大炮，到处剿捕义和团，如直隶景州朱家河教堂有武装教徒 300 人，保定某教堂有武装教徒 70 人，山东许多教堂武装任意拘捕平民，诬称他们是红拳会或义和团，私设公堂，审讯屠杀。萨拉齐所属内蒙古二十四顷地方教堂的教民石琮、

^① 《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76 页。

任喜才、刘二存等“因争地起衅，率领多人至托克托厅所属之河西淮葛尔族属麻地壕村，杀死高古年等九命，弃尸黄河，该堂洋教士藏匿正凶，旋又勾结教民一千余人，在村外房上及村口，势甚凶猛”^①。在这样残酷屠杀之下，中国人民能不起而反抗吗？最大的教堂武装组织是法国主教樊国梁，他组织 3000 名武装教堂，还有 40 名正规军，盘踞在北京的北堂中剿捕义和团。在民教冲突中死伤最多的是义和团，因为他们只有大刀长矛，而教堂武装拥有新式武器。

当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传教士是他们的向导和参谋，传教士和教徒们纷纷出动，刺探情报，如英国传教士宝复礼参加联军的情报处，他画的军用地图详细标明村庄、道路河流及清军、义和团的驻地、人数、炮位等等，自诩这张地图相当于大海航行中的导航图。八国联军刚到北京，不了解情况，两眼一抹黑，全靠传教士的指引和出谋划策。

八国联军在北京大肆抢劫，传教士积极参与这一暴行。美国传教士都春圃发现一处王府，抢了许多绸缎、皮货和珍宝，在大街上拍卖。另一美国传教士梅子明在一座蒙古王府的阁楼上找到大批纹银和珠宝，他说：“我把这些东西尽快运到了美国公使馆。”法国主教樊国梁更是大抢特抢，他公开命令中国教徒到大街小巷去抢劫，凡是抢 50 两银子以下不必上交，凡抢到 50 两以上的都需上交教堂。樊国梁本人到前内务府大臣立山家中抢到 100 万两银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 1371 - 1373 号》。

子，而樊国梁只承认自己抢了二十万另四十七两。^①不管是 100 万两或 20 万两，都表明樊国梁是明火执仗的强盗。

帝国主义诬蔑义和团是杀人暴徒，真正的杀人暴徒是披着道袍的外国传教士，教堂武装屠杀的中国人不计其数。八国联军进京后，传教士指引侵略军以抓捕义和团为名到处捉人杀人。樊国梁说：“我手中已掌握义和团头目的全部名单，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逃遁的去处”，^②在他的指引下，许多中国人被捕杀害。传教士梅子明写信说：“福西士上尉带了二百名骑兵到北京东郊沙河和别的地方进行扫荡，我担任向导和翻译。我们放火烧了两个义和团总部，摧毁了一些军事设施”，^③还对中国平民严刑拷打，要他们供出义和团的去向。当时，教会提出“用人头抵人头”的口号，死一个传教士或教徒就要用几个或几十个中国平民抵命。当时北京街头有很多尸体，北京成立了治安维持会，大事之一就是“搬运大街小巷的死尸，这些死尸大多是义和团”。联军组成的巡捕队到处抓人，用白绳拴住辫子，一条绳拴五六个人，带回安民公所用刑审讯“刑法有跪炼、轧杠子、鞭背敷盐、用烧红的铁镢烙脊背、纸卷辣椒面熏鼻子、猪鬃探马眼、土井倒埋人、绞台紧纵等等，令人看之，不寒而栗”，^④约 70% 的人被活埋、绞死和枪决，一小部分用重金赎出。这批残忍成性的传教士是货真价实的杀人魔鬼。

这次罗马教廷“封圣”活动中 86 人死于义和团运动中，但当时

① 《传教杂志》1902 年 121 - 123 页。

② 《遣使会年鉴》1902 年。

③ 傅恒璋：《梅子明传》。

④ 杜如松《八国联军祸北京》。

的义和团员和中国平民被害的何啻千千万万，罗马教廷想到这一点没有？死亡的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徒中可能有无辜的、被错杀的人，在大规模的武装械斗中这种情形难以避免，那也只能算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账上，或是教堂引诱和威逼他们参加械斗而被打死的，他们也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牺牲品，而大多数被击毙的人是欺压中国人的恶霸，是一批强盗刽子手。

当年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写了一篇题为《给坐在黑暗中的人》的文章说：梅子明牧师“已为每一个被杀害者索到三百两银子，并强迫对所有被毁损的教徒财产给予充分的赔偿。他还征收了相当于赔款十三倍的罚金”。“梅子明先生从贫困的中国农民身上榨取十三倍的罚款，因此让他们，他们的妻子和无辜的孩子们势必慢慢地饿死，而可以把这样获得的杀人代价用于传播福音。他这种搜刮钱财的绝技，……正具体地表现出一种褻渎上帝的态度，其可怕与惊人，真是在这个时代或任何其他时代都是无可比拟的”。^①

英国密克的《支那教案论》中说：“中人所恶，绝不在教，而所恶之实，正当于教会、教士中寻之”。^②

列宁在 1900 年《火星报》的创刊号上写了《对华战争》一文说，当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时，“它们（侵略者）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把村庄一座座烧光，把老百姓赶进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这些基督教徒建立功勋的时候，却大叫大嚷反对野蛮的中国人，说他们竟胆敢

① 《北美评论》1901 年 2 月。

② 《支那教案论》，严复译，南洋公学译书馆印行。

触犯文明的欧洲人。”^① 列宁还写道：中国人“憎恶的是哪一种欧洲人呢？为什么要憎恶呢？中国人憎恶的不是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憎恶的是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传教伪善地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②

义和团运动中，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全世界一切正直、有良知的人们都看得一清二楚，今天梵蒂冈教廷为他们涂脂抹粉，奉为“圣人”，这种谎言决不能遮盖历史真相，决不能欺骗全世界的人民。

现在即将进入 21 世纪，中国已不是 19 世纪软弱可欺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立 51 年，我们有力量和决心保卫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任何歪曲历史、颠倒黑白、诬蔑中国、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言行必将遭到 12 亿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① 《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280 页，1995 年第 3 版

② 《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279 页，1995 年第 3 版

如何看待近代历史上的教案

章开沅 刘家峰

过去我们曾把近代基督教（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的总称，下同）在中国的传播，简单地批评为“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把外国传教士称为“帝国主义侵略的急先锋”。近 20 年来的研究又多从文化交流等层面，认识到基督教也曾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然而，基督教对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以及中外关系的影响是极其复杂的，比如，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播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教案的频频发生，据统计，到辛亥革命前，全国大大小小的教案约 500 起以上，最终酿成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山

教案引发的中外交涉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其影响可谓至深且巨。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教案呢？

教案并不是到近代才有，可以说自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之后不久就有了民教冲突。儒生和僧道是反对天主教的主力，明万历年间（1616 年）曾发生过南京教案。到清代康熙年间，天主教因反对中国教徒祭祖祭孔，兴起礼仪之争，雍正下诏禁教，驱逐外国传教士。此后乾隆、嘉庆两朝，中国官方对天主教的态度并没有改变，禁止西洋人入境传教被写进大清律法。但近代教案则是随着西方殖民主义侵略中国而发生的，其发生原因、性质和影响都具有不同于以往历史上的特点。为弄清这些特点，必须先理解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大背景。

清代严禁传教的政策一直持续到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在这之前，虽然仍有外国传教士秘密潜入境内传教，但从法理上讲是非法的，清政府也严惩不贷，不是驱逐出境就是处死。鸦片战争，中国惨败，被迫签订中英《江宁条约》，开放沿海五口通商，允许外国人居住，1844 年中美《望厦条约》签订，第 17 款规定，美国人可在贸易港口租地自行修建教堂；同年，中法《黄埔条约》第 22 款规定，如有中国人把法国教堂、坟地毁坏，地方官要照例严惩。这是允许外国人在华设堂传教最初的法律根据。同年，两广总督耆英在法国公使拉萼尼的要求下，奏请道光皇帝弛禁天主教。1846 年道光帝正式颁布上谕，不但准免查禁天主教，还同意发还以前没收的天主堂。这是清廷对天主教政策的一个重大改变，从此，被查禁长达 120 年的基督教传布，从秘密非法转而成为公开合法。不过当时允许外国传教士活动的区域只限于五处通商口岸，并未准许他们

进入内地传教。1858年英法联军北上侵犯，清政府被迫同俄、美、英、法四国签订《天津条约》，所有条约全都列有容许外国传教士在内地自由传教的所谓“宽容条款”。1860年英法联军再度向北京进犯，清政府又被迫与英法俄等国签订《北京条约》，除重新肯定《天津条约》中规定的内地传教的权利外，还做了进一步的扩充，中法《北京条约》的中文本里塞进了“任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条款。根据不平等条约最惠国待遇的规定，各国对这些传教特权也都“一体均沾”。

通过这些条约，外国传教士不但可以进入各省传教，且因本身具有各国公民的身份，还同样享有领事裁判权和治外法权。依据条约，中国政府对基督教不但不能查禁，对于隶属中国的教民也不能依法处置。这可说是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中千年未有的一大变局，外国传教士由非法变为中外条约保护下的合法，中国政府由主动变为被动。然而，外国传教士没有料到，由于当时中国人对西方和基督教的认识有限和早已有之的反教情绪，每项条约权利的实施都会招致无数错综复杂的问题，中外政府之间、官民与外国传教士之间、平民与教民之间都会发生无穷无尽的误解和纠纷。事实上，在《北京条约》实施后，教案一直是有增无减，在1899年之前的40年间，仅控诸官府而有文献可寻的教案就有200起以上。

我们考察教案发生的原因，固然可以从儒家传统和基督教教义、礼仪的捍卫处着手。但据台湾著名专家吕实强教授的研究，在造成近代教案频繁发生的原因中，这一方面并不占重要地位，而关键性的原因需要在宗教以外的层面中寻找。

首先是查还旧堂所造成的纠纷即占很大的比重。因天主教曾

在全国三十多个城镇和许多乡村建有教堂，雍正禁教之后，教堂大多被没收充公。到咸同年间，这些房产有的早已翻拆改建，挪作他用，有的则是多次易手，查还已相当困难，但外国传教士仗着清廷上谕和法国公使的权威，往往不顾实际情况，任意索要绅民所尊崇的公所、会馆、书院、庙宇等，迫令退还，到后来发展到强迫买卖山地、低价勒索甚至霸占田地，此类冲突持续不断，愈演愈烈，许多教案遂由此产生。

其次是一些外国传教士强行干预词讼和地方公事。由于天主教在华传教事务得到法国保护，其传教士在这方面较新教传教士尤甚。每当教民与平民发生纠纷，往往不论谁是谁非，逼迫地方官作出有利于教民的裁定，对涉事的非教民还经常滥行诬指，向中国地方官控告，或请法国公使向总理衙门交涉。备受教案困扰的曾国藩在奏折中写道：“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群思一逞。”曾出使欧洲且思想极为开明的郭嵩焘也在 1877 年明确指出：“天主教以护教为名，恃其权利，以纵庇之。于是作奸犯科，一依教堂为抗官之具。至有身犯重罪入教以求庇者，有与人为仇依附教士以逞其毒者。府、县、厅、镇凡建天主堂者，地方则不能安其生。”^①

再如，有些外国传教士不尊重中国的礼制，滥用中国官吏的仪卫舆服，与中国官员打交道时往往肆无忌惮，骄横以至于流于狂妄。如贵州法国主教胡缚理，1861 年收到依据《天津条约》而获得

^① 《清季外交史料》卷 10。

的传教护照，决定大肆庆祝，组织外国传教士和教徒举行大规模的游行，并乘坐中国巡抚专用的紫呢大轿，前往拜会贵州巡抚和其他高级官吏。这种举动自然引起中国官绅的极大反感，连法国公使都认为这样会“伤害当局者的自尊心”。许多外国传教士还要求在公文往来和会晤礼节方面与中国官员平行，1895年法国公使要求对待主教“均与省垣头品大吏平等，待传教士，亦如敬重有德望之先达”，这样的要求显然只会使地方官员更加厌恶外国传教士。但天主教会却一意孤行，直到1899年，主教樊国梁还要求总理衙门制定“地方官接待教士章程”，准许总主教或主教得以平行之礼见督抚，摄位司铎与大司铎准其以平行之礼见司道，其余司铎均可以平行之礼见府厅州县。

毫无疑问，外国传教士有很多人确实是抱着良善动机来华布道，但其中良莠不齐，流品不一，固然有道德高尚、行为善良的君子，也有道德卑下的伪善之徒。有的外国传教士参与侵华战争，或参与不平等条约的制定，或干预民间诉讼。中法《北京条约》的法国传教士翻译，居然用欺骗手段，擅自在中文本增加“任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山地，建造自便”的条款，导致中国权益的丧失，他们的所作所为不配称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还有的外国传教士自觉不自觉地怀着西方文化优越的心态，歧视、贬低中国和中国文化。教民同样也良莠不齐，许多人是为了真正的信仰而入教，有些人则是为了得到外国传教士对其世俗事务的保护而入教，这类人往往被称为“吃教徒”，更有不法教徒依靠外国传教士的包庇，藐视地方官员，逃避差役，跋扈乡里，也是导致民教相仇的原因之一。所以，连天主教内一些正直的传教士也极端不满于这种恶劣现象。早在

1848年，泰嘴啤神父(Joseph Gabet)出版《中国教会一览》，即已痛心疾首地指出：“教会变成了外国机构，是敌人侵略应用的手段。教友在殖民主义压迫下成为不知目的的秘密组织分子。”

当然，教案的发生也有一些其他原因，但这并非大多数教案发生的根本原因。如果对这些发生教案的直接原因追本溯源，就会发现根本症结还是在于西方列强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正是这些条约，赋予了外国传教士许多特权，使传教士和教民成为独立于中国主权和司法之外的特权阶层。保护传教的条款列入了西方列强依靠炮舰得到的不平等条约之中，这体现出传教利益和西方列强在华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同一性，政教不分使基督教在华传播呈现出侵略性的一面。外国传教士与西方列强在处理教案中形成了一种紧密的关系：外国传教士依赖各国炮舰政策的支持和保护，而各国政府则利用教案进行交涉，从中谋求更多的侵略权益。这才是教案频仍的根本原因。在这种背景下，传教就不再单纯是宗教事务，近代反对基督教运动的性质也主要不是宗教的，而是政治的，这一点连许多外国传教士都承认。英国传教士必克(Alexander Michie)在《支那教案论》中论到：“以武力强迫中国弛禁基督教，使基督徒与佛回两种外来宗教的信徒，立于不同的基础上。因为佛回二教之所以不受迫害，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基督教的传布，则与中国的国耻相联系，在当代中国人的记忆中，创痛仍深。”

近代一些外国传教士把传教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为克服传教道路上的障碍，他们不是用和平手段，直接诉诸于中国人对其教义的领悟；也不是凭借自己对上帝的虔诚，而是依靠炮舰，叫嚣“只有战争才能开放中国给基督”。中国人从这些外国传教士的言行中

看不到他们所宣扬的“仁爱”与“宽容”，与近代基督教自己所标榜的“政教分离”、“宗教自由”正好南辕而北辙！这是基督教在中国的不幸，也是基督教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污点。由教案引起的战争和中外交涉中，中国政府被迫签定不平等的条约，出让更多的权益，不仅要付出巨额赔款，还要按外国传教士的旨意处罚涉事的中国人，包括很多高官被迫辞职或外调，甚至流放、处死，给中国人带来极大的耻辱与隐痛。在两个世纪交接的年代里，正是义和团运动这次全国最大的教案，引发了八国联军对中国的疯狂侵略，成千上万中国平民被屠杀，巨额财富被掠夺，使中国进一步走向痛苦的深渊。

但教案同样也给教会自身带来很大的痛苦，不是教堂被毁，就是外国传教士和教民被杀，在所谓“庚子教难”中，天主教堂被毁为数最大，天主教共有 44 名外国传教士和 1 万 8 千多教徒被害，新教有 186 名外国传教士及其亲属被害，传教事业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历次教案中死难的外国传教士和教民，很多是民愤极大的卑劣之徒，也有若干是由于群众性运动的盲目性而殃及无辜。外国传教士在义和团之后做了深刻反思，态度有所收敛，并改变了以前的传教策略和方法，以缓和民教冲突。在义和团运动中，英国人戴德生创立的内地会有 58 人被害，此外还有 21 名儿童。但在运动之后的索赔过程中，戴德生主动放弃赔偿要求，即使中国政府情愿赔偿，也不接受，以示与不平等条约划清界限。很多教案是由于外国传教士喜欢包揽词讼引起的，不仅传教士认识到这是错误的做法，连英国政府都在 1903 年也向在华外国传教士发出通报，禁止外国传教士直接找中国官府为教徒进行诉讼干预。其实，早在

1871 年总理衙门就曾拟具《传教章程》，其中一条规定“教士不得干涉词讼”，在 1892 年李鸿章的《酌拟教堂禁约十条》中也有这样一条，但当时都遭到拒绝。法国直到 1906 年才被迫放弃对他国在华天主教的保护权。

中国地方官绅也从惨痛的义和团运动中汲取教训，不再轻易与外国传教士较力。庚子之后，教案明显减少。民初反教运动与以前教案相比，最明显的是作为反抗主力的社会阶层与教育背景改变了，反教的途径也改变了。反教者是知识分子，其言论是说理的，态度是理性的，方法是温和的，把争论上升到文化层面，具有学术研究的精神，而扬弃了义和团运动时的盲目排外性。

从近代之所以发生众多教案的原因来看，在华外国传教士的确又有着许多不光彩之处，因教案而引起的列强对我国政治、经济的侵略加深，也是不争的事实。近代基督教一直有着“洋教”的丑号，除了因为它是来自域外，主要是因为基督教在华传播过程与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紧密相连。今天，没有人再把基督教视为洋教，因为它早已摆脱了洋人的羁绊，成为中国人自治、自养、自传的爱国教会。现在，国外一些传教机构和基督徒仍不愿正视历史上存在的这些问题，甚至对教案中死亡的外国传教士不分良莠，狂热地为之唱赞歌，尊之为神圣，这只能进一步伤害中国人的民族感情，不利于中外教会的对话与交流。

基督教和其他各种正当宗教一样，受到国人应有的尊重和爱护。我国宪法早已明确规定信仰自由。我们珍惜这些来之不易的社会进步，深愿基督教与非基督教公民友好相处，也愿意与一切尊重中国主权与民族尊严的外国教会组织友好相处。我们本不愿再

次揭开这处历史疮疤，重新勾起不愉快的回忆，而宁可共同书写光明灿烂的历史新页，但面对海外某些反华势力的无理挑衅，我们不能不起而捍卫历史的真实，维护民族的尊严，对我国人民曾经遭受严重伤害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所谓“教案”问题，作出必要的客观分析。

义和团运动是 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

金冲及

义和团运动离开现在已经整整 100 年了。在新的世纪之交到来的时候，回顾 100 年前的上一个世纪之交，确实会使人引起沧海桑田的无穷感慨。那时候，中华民族正处在十分悲惨的境地。国家濒临灭亡的边缘。西方列强把种种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一些傲慢的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享有种种特权，耀武扬威地为所欲为，并且受到封建官府的保护。中国人被人蔑视，被看作“劣等民族”，遭受冤屈也没有地方申诉。周围的状况一天天坏下去。老

百姓中间弥漫着一股怨恨不平的强烈情绪，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义和团运动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它是西方列强对华侵略的产物，是一次有着广泛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自然，产生这样一场运动的原因决不是单一的，还有众多因素在起作用，这些都应该被看到。但如果离开前面所说的那个人背景，离开它的深层次原因，只是从文化的冲突、宗教的冲突、清政府对外政策中存在的矛盾等等来考察，是很难把义和团为什么会在此时此刻动员起如此规模的力量、以疾风暴雨之势席卷整个华北这件事解释清楚。

为了把义和团运动镇压下去，八国联军向中国发动了武装进攻，并且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北京。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列强联合起来，向一个落后国家发动武装进攻，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不曾有过先例。这件事反过来又教育了中国人民。90年后，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朋友时还说到：“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可见这件事对中国人刺激之深。

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在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解放的历史进程中建立的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它给全世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一些外国侵略者也开始觉得不能太小看中国人了。亲身经历过这场事变的孙中山，在《民权主义》的演讲中说道：“像庚子

年发生义和团，他们的始意是要排除欧美势力的。因为他们要排除欧美势力，所以和八国联军打仗。”他们“用大刀、肉体和联军相搏，虽然被联军打死了几万人，伤亡枕藉，还是前仆后继，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这段话是说得中肯的。中国在那样险恶的局势下终于避免了遭受瓜分的噩运，不能不说同这种宁死不屈的民气有着直接的关系。

当然，事情是复杂的，充满矛盾的。大家都知道：义和团运动也有很严重的消极落后方面，如笼统排外、愚昧迷信、组织松散、成分复杂、以至被清政府所利用等等。这些都是清清楚楚的事实，不必回避，更不能把它美化。我们不能因为它是爱国行动就不指出那些消极落后、甚至愚昧荒唐的东西，正如不能因为它存在那些消极落后的方面便不敢肯定它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一样。

它的这些消极落后、以至愚昧荒唐的东西是怎么来的？归根到底，是因为当时中国经济文化还十分落后，缺乏先进社会力量的领导。群众性的、特别是起自下层的反抗斗争处在自发的状态，很难不同时带有许多愚昧落后的因素。这是当时只能达到的水平。不成熟的社会必然会产生不成熟的运动。在中国北方表现得尤其突出。我们总不能因为中国的经济文化落后便得出结论：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即使受到忍无可忍的外来压迫，也不应该起来反抗，以免弄出那么多荒唐可笑的东西来。这种看法，恐怕不能说是一种“理性的思考”，也并不符合历史主义的原则。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近 20 年来海内外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工作已取得长足的进步：整理出版了许多有关义和团运动的珍贵档

案资料，翻译介绍了许多外文资料，继续进行有关的社会历史调查，对问题的探讨也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大大深入了，使义和团的真实情况更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这方面比较多地运用社会学研究的方法，把重大历史事件放在当时社会结构、民间习俗、群众心态、地域特点、自然灾害等环境中来考察，深化了我们对许多问题的认识。

经过大家的相互切磋、共同探讨，一定能够把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又向前推进一步。

丑恶的表演 严重的挑衅

王汝丰

梵蒂冈不顾中国政府和天主教会
的强烈反对,搞了一幕所谓“封圣”的丑恶表演,将中国近代史上一些横行不法、劣迹斑斑、犯下种种罪行的外国传教士及其追随者封为所谓“圣人”。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其敌视中国的立场暴露无遗。作为一个历史研究工作者,我对梵蒂冈肆意篡改历史、精心策划的这一严重事件极为愤慨。我完全拥护和支持我国外交部以及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就此一事件发表的严正声明。

梵蒂冈以为演出这样一幕“封圣”丑剧,就

可以随心所欲地歪曲和篡改历史，掩盖那些外国传教士在近代中国极不光彩的历史污迹，这当然是徒劳的。以 1840 年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为起点的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西方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中国的历史，许多外国传教士是紧随侵略者的炮舰，在一系列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涌入中国的。那些在中国犯下种种罪行的传教士，其所作所为，都记录在帝国主义侵华史上，是涂抹不掉的。

在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中，外国传教士扮演了可耻的角色。1842 年英国强加给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其起草人和中文稿的翻译者都是传教士。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中美望厦条约的美国使团的三个中文秘书也都是传教士，三人之中的伯驾 (Parker, P.) 因此还当上了美国驻华公使。也正是此人，上任后便猖狂地鼓吹和策划由美国来占领中国的台湾。传教士在侵华战争中为侵略者出谋划策，提供情报，直接参与侵略活动的事实不胜枚举。西方学者诺尔斯认为，在西方殖民扩张罪恶史上，外国传教士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写道：“事实证明，传教士是英帝国了不起的尖兵”；“在扩大英国殖民地方面，有一个团体比其他任何人有更多的贡献，那就是传教士”。1855 至 1898 年任美国驻华公使的田贝 (Denby, C.) 也承认外国传教士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先锋队。他说：“这些先锋队所搜集的有关(中国的)民族、语言、地理、历史、商业以及一般文化的情报……对于美国的贡献是很大的。”1900 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英国传教士宝复礼 (Frederick Brown) 更直接当上了英国侵略军情报处的情报官。在英军司令为其颁发的第 102 号委任状上清清楚楚写着：“自本月(1900 年 7 月)20 日

起，宝复礼牧师编入本军，隶属情报处。”德国天主教传教士安治泰（Anzer）同样是一个为八国联军出谋划策，提供情报的间谍。德皇威廉二世曾说：“在华的天主教会无时不受到我的支持，天主教士安治泰回到柏林，时常做我的宾客，他以中国的各项重要事情报告我。”此前，在 1897 年，正是这个安治泰跑回柏林，向德国政府建议以山东发生的巨野教案为借口占领胶州湾作为德国的侵华据点。当年年底，德国调动军舰，将胶州湾占领，由此掀起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中国近代史上，帝国主义列强一次又一次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中国的主权被侵犯，领土被割占，财富被掠夺，人民遭屠杀，传教士在这些侵略战争中充当了急先锋，成为侵略者的同伙和帮凶，在帝国主义侵华史上写下了一笔又一笔罪恶史。

外国传教士不仅充当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急先锋，而且依仗从不平等条约中攫取的侵略特权，非法进入中国内地，在大小城镇、以至穷乡僻壤横行不法，胡作非为，成为一方恶霸。他们强占田产，摊派差役，私收租税，欺凌百姓，作恶多端。更有甚者，竟然蔑视中国法令，包揽词讼，庇护坏人，私设公堂，非法组织武装，残杀无辜。例如 1869 年四川酉阳州天主教堂非法建造炮台寨堡，组织武装对各地反抗教会暴行的群众疯狂报复，惨遭杀害和受伤的中国老百姓达 800 多人，房屋被焚达百余所，制造了血腥暴行。如此种种，举不胜举。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数百起“教案”，几乎没有一件是由于单纯宗教原因引起的，而是由于不堪忍受传教士的暴虐压迫和欺凌激起的反抗斗争，其反侵略反压迫的正义性昭然于世。

对近代中国来华传教士作出评价不能脱离中华民族百年来遭

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历史环境。那些作恶多端的传教士的罪恶活动，与帝国主义的侵略紧密相连。传教士需要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支持和庇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则需要传教士为其工具和帮凶。鸦片战争以来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罪恶史，是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组成部分，这是难以分开也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梵蒂冈声称其演出的“封圣”丑剧“不适于对这一历史时期作出评价”，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谎言。历史是一定时空条件下的客观存在，从来就没有超越历史时空条件而存在的人和事，又怎么能够脱离历史去加以审视和评价。将中国近代史上那些充当帝国主义侵略者帮凶，在中国土地上为非作歹，罪行累累的传教士封之为“圣人”，其实质就是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百年历史的肯定，也是对中国人民百年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否定，目的无非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借以演出新的反华丑剧。这种颠倒是非，倒行逆施的手法，是老牌殖民主义侵略者所惯用的伎俩。1856年，在中国广西省西林县，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神甫马赖（Auguste Chapdelaine）因为非法潜入内地，鱼肉乡民，作恶多端，罪行累累，被当地政府依法处死。法国遂以此为借口，勾结英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侵略中国。当时的英国驻法大使考莱（Cowly）在向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说：“瓦爾斯基（法国外交部长）在昨天的会谈中曾提起一个法国在华传教士的凶杀事件”。“他们（法国）已下定决心要从这次残忍的凶杀事件中得到充分的补偿，……为遭受惨杀的无辜基督教徒复仇。”这份报告中所说的传教士就是马赖，也就是现在被梵蒂冈封为“圣人”的马赖，把罪有应得的罪犯说成是无辜的受害者，这是西方殖民侵略者的强盗逻辑，也是西方殖民主义史观的强权理论。

时至今日，梵蒂冈又把罪犯封为“圣人”，我们又听到了与当年侵略者同声同调的鼓噪，早已为一切正直的历史学家所鄙弃的殖民主义史观，又在梵蒂冈的“封圣”表演中老调重弹。这不能不激起中国人民强烈的义愤和抗议。

殖民主义史观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美化侵略，鼓吹侵略有理。今天，正当屹立世界东方的新中国迈着前所未有的雄健步伐从事着日新月异的社会主义建设之时，当世界潮流正迎着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奔腾向前之时，梵蒂冈逆历史潮流而动，硬想把历史前进的车轮拉回到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华大地上称王称霸的时代，这当然枉费心机。把一些历史罪人封之为“圣人”，梵蒂冈自以为十分光彩，其实极其愚蠢。任何“圣洁”的面纱，却遮掩不了那些罪犯的真实面目。“封圣”丑剧并不能为梵蒂冈添光加彩，而只能又多加一笔难以洗刷的历史污迹。

历史不容篡改

童 轩

从基督教形成之初，就有传教士的活动，如使徒时代的保罗、巴拿巴等人在基督教的发源地小亚细亚传教。但形成大规模、有组织、跨洲际的群众性传教活动还是在 15、16 世纪以后，当时欧洲处于封建制度衰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时期。地理大发现一方面使欧洲经济强国找到了海外资源和新的市场，同时也为更大范围的传教提供了历史的机遇。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纷纷向北美、非洲和亚洲拓展殖民地，传教运动也就是在这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殖民主义的扩张而开始的。近

代以前的一些传教士如利玛窦（P. Matteo Ricci）、汤若望（Joh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等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贡献。鸦片战争后，尽管外国传教士来中国的动机确有出于传教热忱，也有为中国人民做了些好事的，但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大背景中，在其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与中国人民发生冲突时，一些传教士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上，为本国政府效力，客观上充当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先锋、后盾和军师。尤为甚者，一些传教士为殖民主义扩张效力，直接参与了侵略活动，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这些传教士的劣迹，是无法掩盖和抹杀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承认，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与其说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的原因。”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甚至鼓吹“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美国传教士伯驾、裨治文和卫三畏（S. Wells Williams）等知名传教士，都是免费乘坐贩运鸦片的船并接受其资助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郎怀仁（Adrien Lanquillat. S. J.）等五位耶稣会修士是乘法国军舰来华的。传教士与鸦片贸易及侵华战争、传教运动与西方列强的对华侵略之间的确结有不解之缘。马克思早在 1843 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宗教是“压制殖民地的工具”。

参与贩卖鸦片

在鸦片战争前的几十年间，以英国人为主的外国商人一年比一年多地向中国贩卖鸦片。英国从 1767 年的二百箱到 1837 年的

三万九千箱，总计在鸦片战争前四十年间，共偷运进中国的鸦片不下四十二万七千箱，从中国掠夺走了三至四亿银元。沙俄、美国商人也从中亚向中国贩运鸦片。鸦片商人从中获得高额利润，而中国人却从中深受其害。西方学者摩利生在《马萨诸塞州海运史》一书中指出的，对于英美政府和英美商人经营毒害人民的鸦片贸易，当时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都不反对这种贸易，他们乘坐贩运鸦片的飞剪船到中国去，他们还从贩运鸦片的公司和商人的手中接受捐款。他们都说，鸦片对中国人是无害的，就像酒对美国人是无害的一样。”他们认为只要中国人接受了基督，鸦片的危害也就自然会消失。一些传教士不仅乘鸦片贸易船只来华的，接受鸦片商人的资助，更有甚者，有的传教士还直接参与了罪恶的鸦片贸易。传教士们邀请大鸦片商人充当对中国传播基督教的宗教团体的头面人物。如在广州的“马礼逊教育会”，就让大鸦片商颠地任会长，另一大鸦片商查顿任司库，传教士裨治文任秘书。1838年2月21日在贩卖鸦片的垄断组织东印度公司的倡议下成立了“中华医药传教会”，传教士伯驾为副会长，大鸦片商颠地、查顿为终身董事。

第一个进入中国大陆传教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从到中国的第二年起，就与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接触，从1809年到1834年该公司被取消垄断权时为止，直接受聘该公司，任秘书兼翻译员。1825年11月，马礼逊写信给伦敦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我在中国漫长的十五年里，依照你们在那里的职员们的要求，常常冒着个人生命的危险和痛苦，忠心耿耿地为贵公司的利益服务，整个公司以及广州当地的商人可以证明。”由于他对该公司精诚效力，其年薪很快即从五百英镑升至一千英镑。

德国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充当鸦片贩子的翻译,并直接参与了鸦片的推销活动。他曾多次出入中国沿海,参与大规模的鸦片走私活动,同时刺探情报。1832年他到澳门时,许多鸦片商人都争着请他带路到中国沿海去推销鸦片,待遇十分优厚。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里保存的英国鸦片公司1833年档案中有两封公司老板夸奖郭实腊的信,其中提到:“郭实腊博士给我很大的帮助。现在生意越开展,他的帮助越需要了。他的热情是无限的,但未免大胆,太敢干了。”信中描述郭实腊对付中国官员检查的情景时说,“郭实腊穿上最讲究的衣服,带领两只小船,装出神气十足的样子,迎上前去,对中国官吏大声威吓,喝令从速离去,若敢再来,就将他们毁灭。”鸦片战争前,郭实腊还为当时的英国驻粤领事义律就鸦片的销路出谋划策。

由于外国传教士与鸦片贸易有着利益相关的密切关系,他们对于清政府的禁烟政策和举措十分关注。1839年初,清政府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传教士们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林则徐的身上,通过各种办法,尽力刺探林则徐的禁烟措施,搜集中国官方的动态。1839年9月,裨治文在虎门与中方代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告诉林则徐的代表,英国如何强大,中国是打不过它的,力图从思想上动摇林则徐禁烟的决心。林则徐的代表用“打仗不怕”铿锵四个字作为回答,令裨治文十分恼火。

为了保护肮脏的鸦片走私,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毛主席指出,“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传教士在鸦片战争中,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参与收集情报及侵略战争

当时在华的许多传教士都认为，要使中国人接受基督，惟一的办法就是战争，要使鸦片战争“成为将耶稣介绍到中国的一种手段。”西方教会出版的书籍中关于传教士对殖民侵略的作用直言不讳：“一个传教士抵得上一营军队”。“与其设立九个军事据点，不如设立九个教堂更为有效。”事实正是如此。西方列强从侵入中国始，就把传教士作为其侵略、掠夺的工具。传教士受差会派遣，要将自己在中国内地的所见所闻汇报回国去，这就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帝国主义的情报员和帮凶。

传教士郭实腊与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是英国政府的官方翻译，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他们为英军提供情报、出谋划策，成为举足轻重的“侵华谋士”。林则徐认为郭实腊是个“危险人物”，“小马礼逊(马儒翰)最坏”。英军打进长江时，马儒翰就在英军司令璞鼎查的军舰上。璞鼎查在镇江遇到强力抵抗，心里胆怯，打算后撤，马儒翰力劝璞鼎查继续进攻，打到南京。璞接受了马的建议，果然打到南京，清廷被迫投降。

传教士郭实腊从 1831 年到 1838 年间，曾十次侦察中国沿海，搜集到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这成为他参与鸦片战争和起草《南京条约》的资本。在战争期间，郭实腊穿起了军装，随军到各地强征粮草军需。1842 年 6 月当英军进攻上海时，对上海早已了如指掌的郭实腊，充当海军司令的向导，协助指挥作战。7 月间英军攻至镇江，又是这个郭实腊带路，冲进城后一路沿街烧屋和实行

屠杀掳掠。郭实腊先后于 1840 年担任定海县长，1841 年担任宁波县长，1842 年任镇江行政长官。

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时是美国领事的助手。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刚打响后，他就匆匆忙忙由华返美，向总统、国务院和国会竭力鼓吹美国应乘此时机参与对华作战，主张派专使来华签订不平等条约。当时的美国总统、国务卿、国会都十分重视他的这次回国，他见到了即将离任的总统和国务卿、新上任的总统和国务卿。不久，美国派了加尼海军司令率两艘战舰到中国给英军助威。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担任了加尼司令的翻译和助手。

鸦片战争期间，当英国侵略军打到上海时，天主教南京主教法国人罗伯济(Louis de Best)多次乔装成中国人，夜间乘舢板船到“皇后”号军舰去见英军司令璞鼎查(Henry Pottinger)，向他报告南京教区及中国的军事、政治情报。

美国传教士雅禅理(David Abeel)和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及其他两名传教士参与了英军在厦门的侵略活动。英国传教士、医生维魏林(William Lockhart)跟随第一批英军到定海，传教士米怜的儿子米威怜(William Milne Jr.)随后也到了定海。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被派到舟山，在英军司令部里任翻译。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的军舰与美、俄共同进攻我国。1858 年 4 月下旬，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第十三届领班修士大司祭巴拉第赶到舰队停靠的渤海，向俄国公使普提雅廷汇报清政府的动态。5 月间，巴拉第又到大沽向先期到达的俄国公使报告清军在大沽口的设防情报，并向英军司令报告了当时北

京缺粮情况、皇室逃跑计划、京津之间军事部署、白河已被封锁的地方，以及大沽设防等情报。

1858年，英、法、美、俄四国专使率领兵舰联合北上，进驻白河口，直逼天津。联军决定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之前，美国冒充调解人，商定派传教士卫三畏和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去同直隶布政司钱忻举行谈判，制造假象。5月20日，联军出其不意地向大沽炮台发动了猛烈进攻。大沽失陷后，帝国主义的兵舰和专使们都云集天津，当时卫三畏在复给美国的信中竟然宣称：“我认为这匹国的兵舰和公使汇集在中国京城附近，是我们对中国进行传教工作的一部分。”公然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作掩护，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看成其传教事业的一部分。美国公使列威廉向其政府报告说，“若没有他（卫三畏）的帮助，我就不能进一步执行我的职务。”

1860年，英法联军再度向北京进攻时，俄国东正教在北京的传教士又给联军提供北京的地图，博得了英国人的高度评价。英法联军从大沽出发，经通州直抵北京。10月13日，英法联军占领安定门控制北京后，对北京城进行了野蛮的洗劫，特别是对西北郊的圆明园，更是洗劫一空。圆明园是清皇室的一座行宫，综合中西建筑，聚古今艺术品而建成的壮丽宫苑，当时已经经营了100多年。宫内藏有各种无价珍宝，罕见的典籍，著名的历史文物。侵略者供认，它是“世界最宏伟美丽的宫殿”，“他们不能再抵抗物品的诱惑力，军官和士卒们都成伙打群冲上前去抢劫，纪律毫无。”“行宫内抢劫的事，今天（10月8日）简直作到极点，令人惊骇了。”为了消灭其掠夺罪证，这些强盗们又纵火焚烧圆明园，大火三天三夜不

熄，壮丽的宫苑变成一片焦土。他们描绘焚烧圆明园的情景说，“火光熊熊的烧着，仿佛一张幔子，……蜿蜒蜒到了北京，黑云压城，日光淹没，看起来仿佛像一个长期的日蚀。”这座壮丽的宫殿和园林，就是这样在英法联军的暴行下变成了废墟。法国人文学家雨果 1861 年写道，“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在我们眼中，中国人是野蛮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对野蛮人干了些什么！”“在两个胜利者瓜分赃物的条件下，圆明园大规模地遭到了蹂躏。”“政府有时会做强盗，但人民永不做强盗的。”

参与不平等条约的制定

1842 年鸦片战争失败后，满清皇帝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威胁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南京条约》是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也是开创了 100 多年以来帝国主义把基督教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的先例，使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会。此后，又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和掠夺打开了畅通之路。在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过程中，各国传教士不仅积极参与，而且为了其本国的利益与中国讨价还价，乃至武力讹诈。

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的英方全权代表是率舰攻进长江打到南京的英军司令璞鼎查。在谈判过程中，他的四个得力助手郭实腊、马儒翰、英国圣公会的李太郭 (George Tradseent Lay) 和英国伦敦会的麦华陀 (Walter Henry Medhurst Jr.) 都是传教士。郭实腊和马儒翰不仅是谈判的主要代表，而且包办了条约的起草工作，

多次就条约的具体内容与中方代表讨价还价。他们对中方代表极尽勒索讹诈之能事，取得了比原定计划更多的特权和赔款。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也是得力于传教士。在传教士伯驾、裨治文和卫三畏的协助下，中国政府被迫接受了比《南京条约》更为苛刻的中美《望厦条约》，为美国取得了“最惠国”待遇的特权。美国史学家泰勒·丹涅在他的《美国人在东亚》一书中写道：“美国人虽然在美国国内颇重视政教的完全分离，可是在中国，议定《望厦条约》时却有裨治文、伯驾和卫三畏，参加外交工作并升任到最高官阶的则有伯驾”。伯驾于 1855 年被任命为美国第一个传教士驻华公使。法国传教士在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过程中，也是“功不可没”。他们强迫清政府于 1844 年 10 月 24 日在停泊于黄埔的一艘法国兵舰上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法《黄埔条约》。法国除取得中英、中美条约中规定的全部特权外，还在第二十二款中规定法国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这样，清朝政府就被迫负起了保护法国人在中国传教的责任。从此，法国传教士在华的活动更加猖狂，肆无忌惮。中国近代史上的教案多系法国传教士肇事而起。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传教士们在签订 1858 年的《天津条约》以及 1860 年的《北京条约》的过程中，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卫三畏使用威吓手段，在中美《天津条约》中塞进“宽容条款”，赋予外国传教士及中国信徒以特权，享受“治外法权”，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宽容条款”使中国的教会成为国中之国，中国信徒成了一批享有特权的教民，他们犯了法，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因此，许多地痞流氓也混入教会，横行乡里。许多教案由此产生。

泰勒·丹涅说：“中美《天津条约》的实际谈判是由卫三畏博士和丁韪良牧师经办的，……美国传教士存心得寸进尺，以图强迫帝国开放的情形是昭昭在人耳目的。”

法国传教士参加了 1860 年中法《北京条约》的谈判，担任法国代表团的翻译和文件起草人。在《北京条约》的起草过程中，在中文本里擅自增加了“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又将强令“给还旧址”写进了条约。这一句话使外国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任何地方租买土地和盖房的特权，为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霸占地产，遍设教堂提供了条约根据和护身符，并成为后来各地发生民教纠纷及引起教案的严重隐患。诚如后来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Tohm Griffith 1831—1912 年）写给英国差会的信中说的那样：“这个国家事实上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一切早已在中国的传教士和各自国内的差会，如果他们不去占领这块土地，不在十八个省的每一个中心取得永久立足的地方，那将是有罪的。”

由于《北京条约》取消了《南京条约》和《黄埔条约》对传教活动只限于五口通商地方的限制，使其传教更加肆无忌惮。

参与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

前驻上海的美国领事介尼甘（Hon. T. R. Jeruegan）说：“如果没有传教士供给情报，中国大陆上的许多地方到今天还关闭着呢！他们商品的销路也只取胜于较狭窄的范围。应该记住：商务的旗帜紧随着十字架的旗帜接踵而来。谁若打掉了执着十字架旗帜的手，谁就损害商业的利益。”

自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大批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霸占土地、干涉内政和包庇教民。特别是 1860 年法国传教士在《北京条约》中加入“归还旧址”以后,天主教在华传教士更是强行勒索房地产,大量霸占田地,扩展教会势力。天主教修会的经费来源逐渐由依靠国外转而直接从中国占有的土地、房产及发放高利贷和经营其他商业活动获取。历次教案发生后也索到大量的赔款,使在华天主教修会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遍布中国农村的天主堂一般都有大量土地,农民称之为地主堂。

1861 年恭亲王奕訢奏:“传教士每以民间琐事前来干预,致奉教与不奉教之人诉讼不休。……奉教者必因此倚恃教众,欺侮良民……为地方官者,又或以甫定和给,惟恐滋生事端,遂一切以迁就了事,则奉教之计愈得,而不奉教者之心愈不能甘。”

天主教传教士们在江苏、江西、广东、湖北、四川、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奉天等十几个省区进行勒索,以还堂名义非法强占房地产。仅在直隶一省,传教士就任意提出所谓的旧址七十二处,强行要求归还。在江南一带,传教士甚至连处所也不提,只提十五个县府名称,强令地方当局勘址归还。在山东济南,传教士煽动教徒用暴力驱逐旧址大批居民,所强占的房屋地产,全部不给钱。在山西绛州,传教士根本提不出任何证据,却强令归还东雍书院旧址,法国使臣竟跑到总理衙门讹诈:“书院本非天主堂及各项庙宇时应诵经祭献者可比;士子读书,随地皆可,何必拘定此处?”地方当局迫于压力,一块占地四十三亩的校址就被传教士占领了。此类案例俯拾皆是。

美国传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于 1887 年在山东盗买了一片

土地，当时业主尚在狱中。他不经地方官的同意，亲自带了一帮人，于 11 月 28 日强行冲入该址把原住户驱走，占领了那块地方。后来山业主家属上诉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竟出面干涉，终于在 1889 年迫使地方官将济南城外一块比李佳白强占的产业更大的土地拨给他作为补偿交换。

正如当时广东东莞县朱教士颁布的布告中所指出的：“一经号称教民，动辄依势横行，大则鱼肉乡里，欺压良懦；种种弊端，弗胜枚举。”正是由于传教士及在其庇护下的追随者的种种劣迹，从而引起教案 500 余起，并引发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

参与八国联军的侵略及抢劫

当义和团从山东起事时，山东的外国传教士们纷纷向各国公使要求迫使清政府镇压义和团。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 2 月 17 日在《字林西报》发表长篇介绍义和团的文章，结论是：“应该坦白地告诉北京政府，单单讲好话的时期肯定是已经过去了，今后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整个中国，南起黄河，北到长城，甚至长城以北，都将暴动四起，烽火遍地，把外国人在内地所有的事业彻底摧毁，并且在不难预测的情况下，将每一个外国人从北京天津都驱逐出境。很久以来，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发生这种变乱的危险。除非现在就采取强硬的和一致的对策，变乱一定会发生，正像任何势必发生的事情一样。关心防止变乱的有关人士，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 1900 年到美国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及纽约州等地发表演说，会见美国要

人，请求美国干涉正在中国兴起的义和团运动，为美国出兵到处游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叫嚣，“把势力伸展到中国的好机会到了，上帝不允许我们放过这个机会。”在华外国传教士为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摇旗呐喊。

为了镇压义和团运动，扩大对华侵略，英、美、法、德、俄、日、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对我国发动了武装进攻。在向北京进军时，联军网罗了不少传教士充当向导、翻译、情报官等，在京的教会成了军事据点和堡垒。

有的传教士还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侵略军的行动。任美军情报官的天津卫理公会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wn**）是穿军装的八国联军的情报官，还有委任状，写有“宝复礼牧师编入本军，隶属情报处”的字样。他引导联军顺利地攻进北京城。联军总司令赞赏他说：“我非常感谢你，我在这次进军中得到你的帮助。你对中国的知识是最有用的。”传教士们还以高价诱使教徒为他们从被围的使馆向外面侵略军送信。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李佳白（**Gilbert Reid**）在联军镇压义和团时充当侵略军的翻译。在义和团包围使馆时，丁韪良搬进了英国公使大院，领了毛瑟枪，参与巡逻和枪杀义和团。明恩溥也借华北公理会举行年会之时，跑到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与丁韪良等一起荷枪实弹地镇压义和团。

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西什库法国天主教总堂主教）樊国梁（**Pierre - Marie - Alphonse Favier**）在给巴黎遣使会总院白登卜的报告中说：“我们在京城有一所中法学堂，为法国远征军提供了 50 多名翻译官，其中有八名是精通中国话的传教士，被最高将领委任为连队长……这是为了提供给军队将领们所需要的情报，这些情报

对他们来说是很有用处的，他们都受到将军们的感谢和致意。在此我还要向你报告，我手中已掌握义和团头目的全部名单，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逃遁的去处。”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侵略军进入北京后，就像一样强盗在被他们打开的宝库面前一样。整个北京城都遭到了洗劫。除了军官和士兵外，传教士也参加了掠夺。当时法国报纸记载一个回国士兵的回忆说，“我们奉命在城中为所欲为三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教士们做我们的向导。”以天主教北京主教樊国梁为首的传教士们，在法国公使的同意下，不但自己参与抢劫，还下令教徒抢劫，从8月16日开始，连续抢劫了八天。樊在同巴黎时报记者谈话中也承认“我应该不应该下令抢劫呢？我于是去会见法国公使，……公使认为这个请求是合理的，就立刻准我所请。”后来樊自己报称的抢劫数字是“二十万三千零四十七两又五十文”。但据美国《纽约先驱报》1901年1月9日报道称，樊仅在一处王府家里就抢去财物珍宝约值100万两银子。传教士丁魁良说：“假若让这座城（北京）被抢光、烧光也是应得的惩罚。”传教士仁慈的虚假面目背后的残忍暴露无遗。

镇压义和团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Alfred von Waldersee）在他的《拳乱笔记》中说，“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他论到传教士时说，“关于英美传教事业，余实不能详细批评，但余却深信……美国方面，常有一种巨大错误……即委任之牧师，往往其人德性方面既不相称，职务方面亦未经训练，此类常以服务

教会为纯粹面包问题，凡认为可以赚钱之业务，无不兼营并进。……余更熟知许多牧师，兼作他项营业（如买卖土地、投机事业），实与所任职务全不相称，此所以牧师地位因为之降低。……彼辈之所以被人搜捕者，其原因由于牧师者甚少，由于外国人关系者实多。中国人对于宗教一事通常极能相容。”传教士之贪婪、丑陋形象跃然纸上。

2000年，是第一次鸦片战争160周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100周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20周年，中国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50周年。值此世纪更迭、各国人民寻求理解、对话和平之际，梵蒂冈却在台湾所谓天主教主教团的鼓动下，别有用心地在中国人民举国欢庆新中国成立51周年的大喜日子里搞所谓“封圣”，企图否定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历史，否定中国人民在近代史上的反帝爱国运动。我们不纠缠历史，但绝不等于我们能够忘记历史。对于任何借翻历史旧案为其反华政治目的服务，中国人民是绝不答应、绝不容忍的。

揭开所谓“圣人”的面目

史 岩

10月1日,罗马教廷把所谓“在中国致命”的120名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徒册封为“圣人”。那么,这些所谓的“圣人”到底是些什么人?为什么梵蒂冈不顾中国政府和中国天主教会的强烈反对,执意要把他们封为“圣人”呢?

这120名所谓“圣人”,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作为近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工具的外国传教士;一类是作为那些劣迹斑斑的外国传教士的帮凶和追随者的中国教徒;还有一类是在由于外国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规

定的特权，横行乡里，欺凌百姓，激起人民反抗中死于非命，而成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殉难者和殖民地教会势力的牺牲品的中国教徒。具体地说，这些所谓“圣人”中 17 人是在清朝“禁教”期间因违犯禁令被处死的，15 人死于鸦片战争至 1900 年期间的一些教案，86 人死于义和团运动，2 人死于 1930 年。其中外籍传教士 33 人，中国籍教徒 87 人。

历史是任何人都无法掩盖和篡改的。让我们先来剖析几个所谓“圣人”中的外国传教士的典型案列。

案列之一 —— 马赖 (Auguste Chapdelaine, 1814 - 1856 年)，又名马奥斯汀，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甫。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传教士可以在中国五个通商口岸进行传教，但不准私人内地活动。1852 年，马赖擅自潜入中国内地湖南、贵州等地活动，1855 年又潜入广西西部偏僻地区西林县进行非法传教活动。在传教中，马赖破坏当地风俗，勾结贪官强盗，勾引奸淫妇女，留下斑斑劣迹。广西自治区许多历史档案中都有记述。马赖视祀奉祖先的风俗为异端，严令受洗的教徒拆除家中的祖先神位，不准上坟拜祖，还规定教徒及教徒子女必须娶嫁教徒，因而造成许多家庭和宗族的纠纷。为扩展教会势力，马赖曾多次潜往贵州，通过当地教徒与黔桂边境的上匪拉关系，利用他们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左右地方士绅及官员。为收买上匪为自己卖命，马神甫通过贿赂地方官，强行干预司法，将杀人凶手土匪林某无罪开释。西林定安等地群众揭发，马赖违反天主教戒律，常带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寡妇曹某传教，名义上是帮助传播福音，实际上是他的姘妇。此外马还千方百计引诱长相较好的妇女入教，时常单独和这些妇女在一起鬼混。

教徒结婚时都是由他做结婚弥撒，而他就利用这种机会奸污新娘。

1856年，由于马赖的种种恶行引起当地百姓的强烈愤慨，将他告到官府，新任知县张鸣凤秉公执法，将马赖处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西林教案”，法国借此勾结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更深重的灾难。

案例之二——郭西德(Albericus Crescitelli 1863 - 1900 年)，意大利传教士。至今提起郭西德此人，陕西燕子砭一带的百姓仍然是义愤填膺。1898年郭西德到燕子砭地区传教，他欺压百姓，霸占田产，强迫捐献，掠夺财富，生活淫荡，无恶不作。为了扩充教会势力，郭不仅大量拉拢吸收当地恶霸、地痞、流氓之流入教，还强行霸占临近土地和民房建教堂，并强迫教民给教会交租、服差役。郭西德还规定教民之女出嫁前必须到教堂去“领洗”，犹如西欧中世纪的“初夜权”一样，凡去者，皆遭他蹂躏奸污。当地教徒潘长官、郑干仁、举人杨海等人的妻子在出嫁时均遭郭西德的奸污。1898年，燕子砭一带遭到特大水灾，清政府拨出一批赈灾款，委派天主教汉中教区拔上林主教进行救济，拔上林购买粮盐等物品后送燕子砭交郭西德向灾民发放，郭却借机放高利贷，收买农民土地，并以入教者可多得救济粮来劝民入教。1900年夏，年景稍有好转，郭西德及其爪牙李占鳌等就为收回借贷，放纵一些无赖教徒在农民田地里抢收小麦、豌豆。当地村民姜凤翔对教会及教士的劣迹十分痛恨，便在教堂墙上写了几句骂教士的话，郭就勾结地方官，硬逼姜把十五岁的女儿送到教堂去作“修女”。在郭西德的长期奴役下，燕子砭地区广大群众终于在光绪二十六年某日傍晚，自发地组织起来，将罪恶累累的郭西德杀死，百姓闻之大快人心。

案例之三——刘方济(Franciscus de Capillas 1607 - 1648 年)，全名方济各嘉彼来，西班牙人，1641 年到中国，先在台湾后到福建传教。刘为扩大教会势力，采用欺骗、卑鄙的手段发展教徒，特别卑劣的是，他有意发展年轻女教徒，造成许多家庭不和，夫妻离散。福安下邳村有位已订婚的女青年教徒陈某，刘要发展其为“守贞女”，就诱骗她不要出嫁，威逼其未婚夫写了退婚书，随后他便无耻地把陈某拐带外逃。当地群众还反映，刘方济生活糜烂，违反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基本行为准则，与当地一位寡妇通奸，并生下一私生女。刘方济的恶劣行径，激起当地群众的公愤，纷纷起来揭发刘利用传教为非作歹的丑恶罪行，并联名向官府控告。接到群众举报后，清政府遂于 1647 年（顺治四年）11 月 13 日以“专事宣传邪道，煽惑良民，外装守贞不娶，其实拐骗妇女，放荡无耻，曾和城外某寡妇通奸，并且有了私生女”，将刘方济捉获归案，并于 1648 年处死。

至于罗马教廷在“封圣”时提到的曾在山西太原活动的富格拉主教(S. Franciscus Fogolla)，他在中国曾搜刮了很多“礼物”，有铜像和银器，并曾经带着四十箱珍贵的古董物品到意大利。一个传教士聚敛和带走了这么多中国文物，还用此“换了不少银钱”。他是在利用传教盗卖中国文物。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几位所谓“圣人”中的中国教徒的劣迹。所谓“圣人”吴国盛(1768 - 1814 年)，贵州遵义龙坪人。为了向其主子献媚，他依仗着洋人和教会的势力，大耍淫威，强迫他人入教。但凡他认识的人，只要经过他家门口，被其看见，皆被强迫进屋念经学道，无一幸免，连三尺小童亦不放过。由于他用威势逼人入教，遭至反感而引起了龙坪场一方百姓的痛恨。被梵蒂冈列在“圣

人”第一位的赵荣(1746-1815年)，贵州务川县人。他加入天主教后，为向洋主子献功，把佛道教等其他一些宗教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断进行谩骂和攻击。有一次赵荣路过一佛教寺庙，见到殿堂里供奉的佛像，便认为是触犯了天主教不拜偶像的戒律，是对天主至上的挑战，于是大怒，不由分说几棒就把佛像砸碎了。庙里的和尚认出他是个有洋人撑腰的天主教神甫，敢怒而不敢言。当地百姓见到赵荣也像见到阎王一样躲避他。所谓“圣人”罗廷荫(1825-1861年)，贵阳人。罗廷荫入教后以为自己不再是中国人了，连当地的民族风俗也横加干涉，气焰十分嚣张。某日，贵阳郊外青岩地方民众按当地习俗，纷纷走出家门上街“游百病”(“踏青”)，适逢一群小孩高唱民谣经过天主教修院门口，罗廷荫和当时在场的4个传教士见状无端怀疑此举有辱天主教，便仰仗自己有修道院院长法国传教士伯多禄为后盾，竟然对这群不懂事的孩子大打出手，致使多人受伤，引起当地群众的愤怒。

在中国人民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有一些中国教徒丢掉了性命，成为“牺牲品”。但是若干教民被杀，总是引起了外国侵略者更疯狂的报复，造成更多的中国民众被杀，中国民众为之付出了惨重代价。最大的受害者始终是中国人民。

翻开中国近代史，依仗不平等条约的“治外法权”为非作歹的外国传教士，罪行累累，历历在目。梵蒂冈非但不就此向中国人民忏悔，反而歪曲历史，对其丑恶行径进行美化，为他们树碑立传。尽管梵蒂冈口口声声说“封圣”是向中国人民表示“敬意”，但是，再动听的言词也掩盖不住梵蒂冈借翻历史定案、借宗教问题为反华政治目的服务，企图重新控制中国的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利用宗

教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相反，只能更加暴露其虚伪性。这种无力的辩白，完全是自欺欺人，欲盖弥彰。梵蒂冈借“封圣”搞反华的行径，必然受到世界上一切善良和正义的人们的鄙夷。

闻罗马教廷 册封“圣人”有感

任延黎

近 闻罗马教廷把几个世纪以来在中国死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冲突中的 120 名天主教传教士和教徒册封为所谓“圣人”，心中不免把此举与罗马教廷近期的另一行动，即罗马教廷为反省罗马天主教会历史上所犯的敌视或歧视其他宗教和民族的错误而于今年春天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进行一番联想和对比。两相对照的结果是其反差之大、互相间的不和谐甚至自相矛盾，令我感到十分诧异，陷入了对历史和现实的沉思，感慨良多。

罗马教廷对历史进行自我批判式的反思并非自今日始，而是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已走过近 40 年的历程。回首历史，60 年代初罗马教廷召开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简称梵二会议），掀起了罗马天主教会在当代的改革开放运动，一方面对天主教进行包括神学、礼仪、组织和规章制度等方面的全面革新，另一方面则开展同全世界“一切有良好意愿的人”的普遍对话。回顾中世纪的教会史，罗马天主教会一向奉行“教会之外无救赎”的信条，惟我独尊，这是众所周知的天主教完满主义传统立场。而在梵二会议上，罗马天主教会在教会 2000 年的历史上首次对它一贯敌视的其他宗教给予积极评价。在仍然坚持罗马天主教会享有完满的天主真理和充分的耶稣救恩的前提下，认为耶稣的救恩是普世性的、对所有人的，其他宗教也有真理之光，也是通往救赎的道路。在会议发表的文件中，罗马天主教会首次明确谴责为犹太人遭受长期迫害提供“理论”依据的反闪族主义，为基督徒分裂成不同教会的事实承担“历史的罪责”。

国际舆论一致承认，宗教间普遍对话开创了不同信仰之间关系的新纪元，对世界政治的新格局和新秩序的形成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无疑为世界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有鉴于此，尽管梵二会议给我们留下仍有许多缺憾的印象，例如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会议只限于不点名地肯定了以开创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的耶稣会上利玛窦为代表的尊重本地传统文化和习俗的传教方针，从而为长达 200 年的“中国礼仪之争”这一历史公案划了句号，并未言及其他值得检讨的方面，等等，然而梵二会议仍然使我们由衷地相信以这次会议为发端的改革开放使罗马教会的面貌发生了向现代宗

教转化的重大变化，并有理由期待随着时间的推移，罗马教廷会逐渐把梵二会议的改革开放精神全面落实在对待中国的态度和行动上，从而改善中梵关系。但是梵二会议后近 40 年的历史中除增加了不少人为的新冲突外，并没有发生使人感到欣慰的变化，不免令人失望。

2000 年适逢罗马天主教会纪年的圣年，罗马教廷采取了反省自身的新一轮重要行动，据说是为使罗马天主教会“净化记忆”，以便迎接基督教历史的第三个千年之始。2000 年 3 月 7 日，在天主教四旬节前夕，罗马教廷公布文件，题为“记忆与修和：教会和过去的错误”，从神学理论的深度对教会昔日的错误进行总结并请求宽恕。在此前后罗马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连续出访了埃及、约旦和耶路撒冷等地并发布文告，向罗马天主教会在历史上曾经伤害过的其他基督教会的基督徒、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全体穆斯林以及全世界各地的所有犹太人道歉，祈求宽恕与和解。此外，教廷把 3 月 12 日即四旬节的首主日定为“求恕日”，提醒天主教徒要为过错寻求天主宽恕。罗马教宗于是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教堂与多位教廷高官一起，面对祭台方向的耶稣苦像举行求恕仪式，向天主忏悔和祈求宽恕。这次礼仪受到国际社会和传媒的广泛关注。罗马教廷的一系列反省自身的行动无论从其规模之大还是从其规格之高的方面看，亦或就其达到的神学理论的深度以及涵盖的广度而言，都可谓具备世纪之交的风范，它们得到其他宗教团体的领袖普遍的然而又是审慎的欢迎。

罗马教廷公布的这个文件是由罗马教廷信理部国际神学委员会下辖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受教宗委托起草的。该特别委员会的领

导人、意大利著名神学家布鲁诺·福尔特教授是笔者的朋友。1997年春他在北京告诉我，他正在主持这项研究工作。同年秋在那坡里见面时他又说，正在对传统神学进行严格审查，以便清除其中对犹太民族不利的教义。

我们完全明白，罗马教廷的道歉和请求宽恕，实质上是国际间正义呼声的伟大胜利。由于罗马教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面对德国纳粹对犹太民族施行种族灭绝性的大屠杀的暴行沉默不语，所以战后世界舆论对罗马教廷的暧昧态度同声谴责，并逐渐形成对所谓“天主的沉默”的抗议浪潮。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罗马教廷先是在梵二会议上对包括犹太教在内的其他宗教作出积极评价并明确谴责反闪族主义，进而在今年年初从神学上清除成为迫害犹太民族的理论根基的反闪族主义，同时请求犹太民族的宽恕。天主教与犹太教之间的积怨已有近 2000 年的历史，如今罗马教廷洗心革面，顷刻间化干戈为玉帛，历史与现实两相对照之鲜明，令人感慨唏嘘不已。

然而愈是感叹罗马教廷在对待犹太民族等所犯下的错误的悔悟之心情之切切，愈是有一种为我中华民族鸣不平的情绪陡然增长，时常萦绕心头挥之不去，成为胸中块垒，犹如鱼鲠在喉，不吐不快。

在罗马教廷于天主教 2000 年圣年进行的重大学悔活动中，中国再次成为被“遗忘”的土地。难道罗马教廷果真没有什么对中国可说的吗？非也！想当初，天主教传教士于 16 世纪末即明末清初来华传教之始直至 19 世纪初叶，因东西文化的隔阂等原因而步履维艰，没有取得多少成就。只是在西方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列

强依仗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天主教依靠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势力，才开始在中国有较大的发展。但是直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天主教会的领导权一直由外国传教士把持，中国神职人员长期处于被轻视的地位，这一事实使中国天主教会带有浓重的殖民地色彩。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与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华之间有密切联系，这不仅是海内外一切有识之士的共识，甚至也是许多有良知的西方天主教学者所承认的历史事实。

20 世纪上半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始，狼子野心初露端倪便是扶植伪满洲国。1934 年罗马教宗庇护十一世匆忙宣布承认伪满洲国，还特意将东北从中国传教区划出，单独成立与伪满洲国版图相符的东北传教区，同时任命东北传教区主教、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高德惠为驻伪满洲国的宗座代表。此后，罗马教廷与伪满洲国之间礼仪酬酢的函电往来频繁。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 年 9 月底庇护十一世在梵蒂冈接见教廷驻满洲国特使团。梵蒂冈驻中国的宗座代表、意大利人蔡宁于 1939 年 3 月发布公函，要求面对日本侵略者的中国天主教神职人员和教徒“保持超然态度，不左不右”。整个抗战期间，罗马教廷指使把持中国天主教会领导权的外国神职人员禁止中国天主教徒反抗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政府和抗日军民争取国际支持、谋求与梵蒂冈建交的呼声日渐高涨之时，罗马教廷却置同盟国的劝阻和反对于不顾，抢先与正在侵华的日本建交，然后才和中国于 1943 年建交。同年中国即派遣驻梵蒂冈公使到达任所就任，罗马教廷却迟迟不派其外交代表来华。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的 1946 年，梵蒂冈第一任驻华公使、意大利人黎培

里才姗姗来迟。罗马教廷的这些行为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对比犹太人问题，罗马教廷因在德国纳粹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期间态度暧昧、没有明确反对纳粹的暴行而在战后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这个压力成为罗马教廷悔过的重要因素。罗马教廷对中国人民犯下了如此严重的历史错误，却至今未见有任何自责和忏悔的表示，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难道对德国纳粹应该予以谴责，而对日本军国主义就不应该唾弃吗？更何况战后德国政府承担了道义责任，多次向受害的犹太民族道歉，而日本一些政界人物却对侵华罪行百般诿赖，日本军国主义死而未僵，因此罗马教廷为对待抗战中的中国民众的历史表现进行一番检讨性反思就更显得必要。

正当我们为罗马教廷对中国犯下的历史错误采取回避的态度而遗憾之际，却传来罗马教廷册封在中国“致命”的传教士和教徒为所谓“圣人”的消息，使我感到十分震惊。罗马教廷今年春天通过请求宽恕的一系列行动而树立的谦卑形象还未及细细品味，立刻被初秋的一副蛮横面孔所取代。事实告诉我们，罗马教廷通过“批发”这 120 个“圣人”的举动，不仅要美化在华传教与帝国主义侵华密切联系的不光彩历史，还鼓励今天的中外天主教神职人员和教徒以这些“圣人”为“楷模”，为了“勇敢地信仰作见证”而不惜站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对立面和违反中国的法律。

结论只能是，罗马教廷有着强烈的“冷战意识”，太过于着眼意识形态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斗争，却触犯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民族矛盾，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这是非常不明智的。这不能不激起中国人民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的痛苦历史的回忆，却发现罗马教廷现在的所作所为与它留给中国人记忆中

的形象，倒是在逻辑上保持着惊人的一致。看来，罗马教廷历来习惯说的“尊重伟大的中国人民”“愿意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以及“鼓励中国教徒作好教徒同时作好公民”等等如此这般，都是缺乏诚意的。

传教士与教案

童仲文

今年，是第一次鸦片战争 160 周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 100 周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 50 周年，中国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 50 周年。值此世纪更迭、各国人民寻求理解、对话和平之际，梵蒂冈却在台湾所谓天主教主教团的鼓动下，别有用心地在中国人民举国欢庆新中国成立 51 周年的大喜日子里搞所谓“封圣”，企图否定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历史，否定传教士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做的劣迹，否定中国人民在近代史上的反帝爱国运动。这是中国人民决不答应的。这次教皇册

封的“圣人”有不少是在教案中被杀的。所谓教案，通常是指 17 世纪至 20 世纪初西方列强利用宗教干涉中国内政、引起中国人民反抗而酿成的案件。其实质是中国人民反抗西方列强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及奴役。教案反映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捍卫民族尊严，坚决反抗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的爱国主义觉悟。梵蒂冈却视而不见历史的真实，把这些“教案”视为“教难”，把“教案”中死去的传教士及其追随者看成是为“信仰”而献身的“英雄”。1900 年、1909 年、1946 年和 1955 年，教廷曾先后四次为 120 余位在“教难”中去世的“英雄”册封为“中华真福”。这次竟将 120 位“中华真福”册封为“圣人”，向全世界“展示”他们作为“人类凝聚力和忠诚的范例”。

让我们看看在中国近代史上，教案是怎样发生的？传教士与教案究竟是什么关系？

教案发生的历史背景

15、16 世纪的欧洲处于封建制度衰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时期。地理大发现一方面使欧洲经济强国找到了海外资源和新的市场，同时也为更大范围的传教提供了历史的机遇。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纷纷向北美、非洲和亚洲拓展殖民地，传教运动也就是在这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殖民主义的扩张而开始的。尽管外国传教士来中国的动机确有出于传教热忱，也有为中国人民做了些好事的，但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大背景中，在其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与中国人民发生冲突时，一些传教士自觉或不

自觉地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上，为本国政府效力，客观上充当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先锋、后盾和军师。尤为甚者，一些传教士为殖民主义扩张效力，直接参与了侵略活动，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我们不排除教案中存在东西文化冲突的因素，但中国近代史上教案发生的更深刻、更基本的原因，是由于一些外国传教士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种种罪恶。

传教士参与贩卖鸦片 与中国的鸦片贸易是西方殖民主义贸易史中最丑陋的一页。而当时在华的传教士不反对这种肮脏的贸易，他们不仅乘鸦片贸易船只来华，接受鸦片商人的资助，更有甚者，有的传教士还直接参与了罪恶的鸦片贸易。与鸦片贩子沆瀣一气，为其出谋划策。

传教士参与收集情报及侵略战争 当时在华的许多传教士都认为，要使中国人接受基督，唯一的办法就是战争，要使战争“成为将耶稣介绍到中国的一种手段。”西方列强从侵入中国始，就把传教士作为其侵略、掠夺的工具。传教士一方面充当列强的情报员、翻译官、谋士，另一方面则借助列强的军事实力，篡取传教及政治、经济特权。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因法国传教士马赖被杀而发。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对北京城进行了野蛮的洗劫，特别是对西北郊的圆明园，更是洗劫一空。并纵火焚烧圆明园，大火三天三夜不熄，这座壮丽的宫苑在英法联军的暴行下变成了废墟。

传教士参与不平等条约的制定 从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到《望厦条约》、《黄埔条约》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传教士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传教士在中美《天津条约》中塞进“宽容条款”，不仅赋予外国传教士

以特权，而且使中国教会成为国中之国，中国信徒成了一批享有特权的教民，许多地痞流氓也混入教会，横行乡里。许多教案由此产生。法国传教士在中法《北京条约》中文本里擅自增加了“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又将强令“归还旧址”写进了条约，使外国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任何地方租买土地和盖房的特权，为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霸占地产，遍设教堂提供了条约根据和护身符，并成为后来各地发生民教纠纷及引起教案的严重隐患。由于《北京条约》取消了《南京条约》和《黄埔条约》对传教活动只限于五口通商地方的限制，使其传教更加肆无忌惮。

参与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 自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大批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霸占土地、干涉内政和包庇教民。特别是 1860 年法国传教士在《北京条约》中加入“归还旧址”以后，天主教在华传教士更是强行勒索房地产，大量霸占田地，扩展教会势力。天主教修会的经费来源逐渐由依靠国外转而直接从中国占有的土地、房产及发放高利贷和经营其他商业活动获取。历次教案发生后也索到大量的赔款，使在华天主教修会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遍布中国农村的天主堂一般都有大量土地，农民称之为地主堂。

参与八国联军的侵略及抢劫 当义和团从山东起事时，山东的外国传教士们纷纷向各国公使要求迫使清政府镇压义和团。为了镇压义和团运动，扩大对华侵略，英、美、法、德、俄、日、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对我国发动了武装进攻。在向北京进军时，联军网罗了不少传教士充当向导、翻译、情报官等，在京的教会成了军事据点和堡垒。有的传教士还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侵略军的行动。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侵略军进入北京后，就像一群强盗在被他们打开的宝库面前一样，整个北京城都遭到了洗劫。除了军官和士兵外，传教士也参加了掠夺。

正是西方列强及外国传教士的强取豪夺，导致中华大地教案此起彼伏。

我国近代史上的几起重大教案

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我国共发生大小教案五百多起，为了弄清教案的来龙去脉及其传教士在其中充当的角色，我们将其中较大的教案做一简要介绍。

青浦教案(1848年)这是早期教案中的典型。英国传教士麦都思、雒魏林和慕非法进入离上海九十里外的江苏青浦县传教。他们在城隍庙一带传教和散发宣道小册子，引起了大批乡民和水手争相索取，混乱中，雒魏林举起手中拐杖在几个水手头上乱击，激起众愤，水手们还击了几下，致使几个传教士受有轻伤。当时的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乘机小题大做，要求“惩凶”赔偿，并向中国当局宣布，所有英国船只进出口的货物一概不付税；所有装载贡米准备出海运往北京的一千四百艘运输船队，一律不准驶离港口；停泊在船队下游的英国军舰“契尔顿”号处在最有效的位置上，封锁港口、禁止船只出入，进行武力威胁。这样，仅装了十门小钢炮的双桅船，就把一千四百艘粮船挡住不能出口。青浦水手一万三千余人参加了这次反洋冲突。阿礼国使用的讹诈手段使清廷就范，清政府被迫把当时的苏松太道咸龄革职，将十名水手逮捕枷号

示众，赔款三百银两。中国地方官还亲赴英舰和传教士寓所“拜访道歉”。

西林教案(1856年) 西林教案的主角是这次被封为“圣人”的法国外方传教会教士马赖。1853年，他违约非法从广州潜入广西西林县，利用传教名义，勾结知县等官吏，欺压人民，强奸妇女，作恶多端。他纵容包庇一些地痞教民无故在乡间挑衅起事，抢掠奸淫，引起极大民愤。1856年，当时新上任的西林县知县张鸣凤根据村民的控告，调查属实后，将马赖逮捕并处死。法国政府借此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攻入北京，把我国上百年的圆明园抢劫一空，焚烧了三天三夜，并迫使清政府订立《天津条约》，赔偿白银二百万两。

西阳教案 1865年，法国传教士玛弼乐因在西阳支持教徒欺压百姓，被群众击毙。法国公使以派兵到四川相威胁，迫使清政府处死民众一人，赔款八万银两。1868年，因法国传教士李国在西阳组织教堂武装，修筑工事，奴役人民，激起公愤。民众于次年年初焚毁教堂并杀死李国。教堂武装借机报复，杀死民众145人，伤700余人，民房被焚毁100余户。法国公使罗淑亚与清政府谈判，主凶竟逃回法国。结果清政府处死民众二人，徒刑10人，赔款三万银两。

天津教案(1870年) 天津教案源于天主教育婴堂内大量婴儿因流行传染病而死亡。人群多次围集在教堂附近，要求把孩子放出来。经育婴堂的负责修女同意后，天津民众派五位代表到堂内检查。正当代表进堂时，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亲自赶到育婴堂，无理指责民众代表，并把他们轰出堂外。第二天，丰大业持枪去见北

洋通商大臣崇厚，在谈判尚未开始时，就开枪进行恫吓。丰大业又在回去的路上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击伤随从一人。法国官员的强盗行径激起了民众极大愤怒，当场把丰大业打死。这本是咎由自取，但法国侵略者对领事丰大业的挑衅行为非但不进行自省，反而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进行军事威胁，并联合英、美、俄、德、比、西七国提出所谓“抗议”，各国军舰聚集天津海口示威，强令清政府屠杀爱国群众和惩办地方官员。法国海军司令威胁说：“十数日内再无切实办法，定将津郡化为焦土。”天津人民气愤异常，仅从当时天津曾出售了好几万把印有人民英勇杀敌国画的扇子即可见一斑。结果是天津知府和知县革职充军，爱国民众被当作凶手惩办，判处死刑二十人，流放二十五人，并赔款四十九万七千二百八十五银两，北洋通商大臣崇厚赴法国道歉。被处死的民众毫无惧色的走向刑场，无数群众簇拥着他们前进，充分显示了天津人民不畏强暴的英勇气概。天津教案后，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利用宗教损害中国主权和人民利益的斗争如火如荼遍及全国。

巨野教案(1897年)德传教士在山东依仗不平等条约的庇护，唆使教徒压迫人民，激起民众公愤。1897年11月，巨野县的农民杀死张家庄德传教士两人，济宁、寿张、单县、武城各县群众和农民在大刀会的号召下，纷纷响应。德国早已觊觎山东胶州湾地区，巨野教案发生后，给了德派军舰侵占胶州湾的机会。他们当即电令驻扎在上海的德国舰队在海军少将齐德黎率领下迅速启程，日夜兼程至胶州湾强行登陆，以武力威胁向清政府提出要求赔偿的无理要求。结果山东巡抚李秉衡被革职，民众二人被处死，三人被判刑，赔款二十二万五千银两，清廷被迫降谕保护在华德国传教

上。

重庆教案 1886年7月，英美教会强行在重庆建堂，激起公愤，武生罢考，商人罢市，民众焚毁教堂和传教士住宅。传教士竟令教堂武装开火，杀伤民众三十余人，致使三千余民众焚毁城内外的教堂并捣毁英国领事馆。事发后，英、美、法三国公使向清政府提出要挟。结果民众被处死二人，赔款二十三万五千银两。

宜昌教案 1891年9月，湖北宜昌因法国天主教圣母堂拐卖儿童而引起民教冲突。儿童家属到教堂寻找，居民群集堂外要求检查。隔壁美国圣公会的传教士竟向民众开枪，击伤一人，激起民愤。数千民众焚毁教堂，打伤传教士。事件发生后，英、法、美等九国公使联合向清政府威胁，各国军舰开至汉口、宜昌进行武力恫吓。湖广总督张之洞以判处民众十二人徒刑，赔款十七万五千七百七十一银两结案。

以上教案，仅仅是从数百例教案中拈来的几例。下面，我们再看看罗马教廷所封的这些在教案中死去的“圣人”，究竟有什么样的“圣迹”。

所谓圣人的劣迹

“圣人”劣迹，难以罄书。我们只能简要介绍几位“圣人”。

马赖 (Auguste Chapdelaine 1814 ~ 1856 年)，又名马奥斯多，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甫。1852年，马赖神甫依仗帝国主义主子的撑腰，不顾中国政府禁令，违反《黄埔条约》关于法国人只准在五个通商口岸传教，而不准私人内地活动的规定，擅自潜入中国内地湖

南、贵州、广西等地活动，1855年又潜入广西西部偏僻地区西林县进行非法传教活动。不仅如此，他在传教中还破坏当地风俗，勾结贪官强盗，勾引奸淫妇女。广西自治区许多历史档案中都记述了马赖神甫的斑斑劣迹。如破坏民俗，干涉婚姻。马赖视祀奉祖先的风俗为异端，严令受洗的教徒拆除家中的祖先神位，不准上坟拜祖，还规定教徒及教徒子女必须娶嫁教徒，因而造成许多家庭和宗族的纠纷。又如，为扩展教会势力，马赖曾多次不辞辛苦前往贵州，通过当地教徒与黔桂边境的“绿林”拉关系，想方设法利用“绿林”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左右地方绅士及官员。又如，强行干预司法。为收买土匪为自己卖命，马神甫通过贿赂地方官，将杀人凶手土匪林某无罪开释。再如，西林定安等地群众揭发，马先生违反天主教戒律，常带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寡妇曹某传教，名义上是帮助传教福音，实际上是他的姘妇；此外马还千方百计引诱长相较好的妇女入教，时常单独和这些妇女在一起鬼混并趁机奸污女教徒；教徒结婚时都是由他做结婚弥撒，而他往往利用这种机会奸污新娘。1856年，由于马赖的种种恶行引起当地百姓的强烈愤慨，将他告到官府，新任知县张鸣凤秉公执法，将马赖处死。

郭西德(Albericus Crescitelli 1863 - 1900 年)，意大利传教士。至今提起郭西德神甫，陕西燕子砭一带的人民仍然是义愤填膺。1988年郭西德到燕子砭地区传教。在传教过程中，郭西德欺压百姓，霸占田产，强迫捐献，掠夺财富，生活淫荡，无恶不作。为了扩充教会势力，郭不仅大量拉拢吸收当地恶霸、地痞、流氓之流入教，还强行霸占临近土地和民房建盖教堂，并强迫教民给教会交租、服役。郭西德还规定教民之女出嫁前必须到教堂去“领洗”，犹如西

欧中世纪的“初夜权”一样，凡去者，皆遭蹂躏奸污。当地教徒潘长富、郑干仁、举人杨海等人的妻子在出嫁时均遭郭西德的奸污。1898年，燕子砭一带遭到特大水灾，清政府拨出一批赈灾款，委派天主教汉中教区拔士林主教进行救济，拔士林购买粮盐等物品后送燕子砭交郭西德向灾民发放，郭却借机，放高利贷，收买农民土地，并以入教者可多得救济粮米劝民入教。1900年夏，年景稍有好转，郭西德及其爪牙李占鳌等就为收回借贷，放纵一些无赖教徒在农民口地里抢收小麦、豌豆。当地村民姜凤翔对教会及教士的劣迹十分痛恨，便在教堂墙上写了几句骂教士的话，郭就勾结地方官，硬逼姜把十五岁的女儿送到教堂去作“修女”。在郭西德的长期奴役下，燕子砭地区广大群众终于在光绪二十六年某日傍晚，自发地组织起来，将罪恶累累的郭西德杀死。

刘方济(Franciscus de Capillas 1607-1648年)，全名方济各嘉彼来，西班牙人，1641年到中国传教。他先在台湾传教，1642年到福建，为便于工作，方济各嘉彼来改名为刘方济。当时正值天主教“礼仪之争”发端，刘为不断扩大本教派势力范围，排斥其他教派，在传教中采用欺骗、卑鄙的手段发展教徒。刘在当地拉拢、引诱当地农民入教时，大量发展年轻女教徒，造成许多家庭不和，夫妻离散。福安下邳村有位已订婚的青年教徒陈某，刘要发展其为“守贞女”，就诱骗她不要出嫁，威逼其未婚夫写了退婚书，硬是破坏了一桩美满的婚姻。之后，他竟无耻地把陈某人拐带外逃。当地群众还反映，刘神甫生活糜烂，违反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基本行为准则，与当地一位寡妇通奸，并生下一私生女。刘方济的恶劣行径，激起当地群众的公愤，纷纷起来揭发刘利用传教为非作歹的丑恶罪行，

并联名向官府控告。接到群众举报后，清政府遂于 1647 年(顺治四年)11 月 13 日以“专事宣传邪道，煽惑良民，外装守贞不娶，其实拐骗妇女，放荡无耻，曾和城外某寡妇通奸，并且有了私生女”，将刘方济捉获归案，并于 1648 年处死。

吴国盛(1768 - 1814 年)，贵州遵义龙坪人。身为中国人，信仰天主教后本应做一个好教民，但他并不安分守己。为了向其主子献媚，依仗着洋人和教会的势力，人耍地痞流氓的淫威，强迫他人入教。但凡他认识的人，只要经过他家门口，被其看见，皆被强迫进屋念经学道，无一幸免，连三尺小童亦不放过，其行径令人发指。由于他用威势逼使数百人入教，遭至反感而引起了龙坪场一方百姓的痛恨，称天主教为“真王教”。

罗廷荫(1825 - 1861 年)，贵阳人。罗廷荫本身是少数民族，入了洋教以为自己再不是中国人了，连当地的民族风俗也横加干涉。欺压当地百姓，气焰十分嚣张。某日，贵阳郊外青岩地方民众按当地习俗，纷纷走出家门上街“游百病”(“踏青”)，适逢一群小孩高唱民谣经过天主教修院门口，罗廷荫和当时在场的 4 个传教士见状无端怀疑此举有辱天主教，便仰仗自己有修道院院长法国传教士伯多禄为后盾，无理谩骂和驱赶这群孩子，并不问青红皂白，对这群不懂事的孩子大打出手，致使多人受伤，在世人面前表现了一回他们言必称博爱的真实面孔。

赵荣(1746 - 1815 年)，贵州务川县人。天主教传入中国之前，佛教和道教等其他一些宗教早有存在，但一些天主教传教士却把其他宗教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对无宗教信仰者更是歧视，赵荣便是其中“佼佼者”。赵荣唯我独尊，仇视他教，深恐别人抢了他的饭

碗。有一次赵荣路过一佛教寺庙，见到殿堂里供奉的佛像，便认为是触犯了天主教不拜偶像的戒律，是对天主至上的挑战，于是大怒，不分分说几棒就把佛像砸碎了。庙里的和尚认出他是个有洋人撑腰的天主教神甫，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历史已经过去 100 多年了，但是，当我们翻开历史，一些依仗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特权而为非作歹的传教士在中国的劣迹，依然历历在目。今天，当罗马教廷册封这些恶徒为“圣人”时，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怎能不义愤填膺？！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更不能容忍借翻历史定案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图谋。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我们决不允许上个世纪的国耻再现。

文化冲突还是主权之争

——三论天津教案的起因与性质

朱东安

关于近代教案的性质，本来是很明确的，至少建国以来，史学界普遍认为是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其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也不外如此，笔者与不少学者都曾做过有根有据的论证。不意近年骤兴新潮，隐瞒历史真相，歪曲事件的性质，为曾国藩与外国侵略者翻案，使天津爱国民众再度冤沉海底。当我再次澄清历史事实，为天津民众伸张正义的时候，有人却大感惊疑：现在都兴说文化冲突，怎么你还讲什么侵略被侵略的问题。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深思。

难道这真的只是一场文化冲突，中国人民以自己的落后文化反抗西方先进文化吗？难道 100 多年来，西方列强带给中国人民的仅仅是先进文化，而没有沉重的灾难？这显然是对近代史的严重歪曲！为此，笔者不得不仍以天津教案为例，谈点自己的看法，且略申前文未尽之意，以就教于学术界的诸师友。

自鸦片战争以来，以教会为代表的西方侵略势力，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实施文化侵略的主要工具，他们妄图从精神上征服中国，让中国人民心甘情愿地接受他们的殖民主义统治，以达到船炮和金元所无法达到的目的。在外国传教士中，的确有虔诚的基督徒，但他们却在自觉不自觉地执行着这种使命，充当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的工具。西方教会在中国办医院、办学校，传播文化知识，的确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与它们的罪行相比不成比例，更不能改变其文化侵略的本质，也无法抵偿中国人民所遭受的巨大伤害。所以，中国人民对他们的抵制是理所当然的，其革命性和进步性是不容否定的。

不过，这并非触发近代史上一系列教案的直接原因。因为中国人民当时还没有这种觉悟，还没有这样高的认识。他们只有在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之后，才有可能认清西方侵略者在华传教的真实意图，得出上述科学结论。而当时反对洋教的广大民众，对它们的认识还只是直观的和感性的，还没有认清它们的反动本质，只是从切身体验中感受到它可恶、可恨。中西文化之间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有差别就有矛盾，但这只是思想认识上的不同，决不会触发有如天津教案那样大规模的社会冲突。中国人民是讲道理的，决不会因为洋人和教民不拜玉皇大帝而就向他们施

以暴力。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就可证明这一点。况且，洋教在中国势焰熏天，有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后盾，处处挟官府压人，动辄以炮舰相威胁。在他们面前，中国人处于劣势，属于弱者，若非万不得已，怎会以自己的身家性命做赌注，与他们一争高下？为了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发动一场战争，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如果在人类历史上果有其事的话，那是在欧洲，在中世纪，历时近二百年的十字军东征，即为此例。然而，这却是一场骗局。不过是当时的反动统治者，利用欧洲人民对上帝的信仰，用罗马教皇的名义，向东地中海沿岸地区发动的几次侵略战争而已。因为支配人们从事社会活动的最终驱动力，不是理念，而是实际物质利益，理念不过是告诉人们，如何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可以叫做观察和研究历史的“利益原则”。以此观察和认识问题，就不易为假象所迷惑，较易抓住事物的本质。

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导致近代教案的直接原因，并不在文化方面，而在此之外。这是因为西方帝国主义将教会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对中国实施文化侵略，不只使用文化手段，尤其当他们的传教活动受到人们思想上的抵制的时候，他们就动用政治、经济、司法、军事等手段。这样，教会的活动就不仅仅限于文化侵略，而是将之扩大到政治、司法、财政、军事等方面，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实际利益，引发出种种社会问题。

西方教会对中国实行文化侵略的途径，并非仅限于文化宣传，展现其文化上的优越性，让人们只是仰慕他们的文化，虽然这一点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更主要是在中国发展教徒，扩充宗教组织，使更多的中国人入教，听命于外国教会。然而，中国却是一

个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的国家，人们的宗教观念很弱，而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很深。儒家文化是二元的，即可引出有神论，也可引出无神论，且有家族组织作依托，足可取代西方教会的社会功能。这样，它们就很难在中国得到大的发展。为了突破这种思想上的藩篱，他们就采取利诱手段，给予教民种种特权，致使加入洋教的中国人多属为事势所迫或实利所诱，真为上帝而来者很少。于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各种不法之徒加入其中。而危害尤烈者，则是来华传教士的情形也与之颇为相似。由于中国穷困落后，一般神职人员多不愿来。而各国政府又急于扩充教会势力，大量征发传教士，这就使很多品行不端、甚而根本不是神职人员的冒险家混杂进来。例如天津法国天主堂的主教谢福音，本来就是一个以杀人为业的军官。他们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抢男霸女，侵吞田产，作奸犯科，无所不为。如此以来，必然引发和激化教民与平民间的矛盾。如有的地方教民拒绝向政府交粮纳税，地方官既不敢向他们收取，又不肯减少收入，于是就强迫邻村平民代交。有的教民欲娶平民之女为媳，平民不许，往往就去强抢。至于巧取豪夺，侵吞房地产业者，则例子也不少。而更易激起民愤的，则是拐卖人口、虐害幼童、剪人发辫等违反人道之事。前者曾激起不少小规模民教冲突，而后者则往往酿成命案，引发大规模冲突，如江西教案、皖南教案、天津教案，皆由此而起。

不过，这只是诸多教案的起因，而民教冲突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则是帝国主义超越条约的侵害和清政府的严重失职。也就是帝国主义超越不平等条约进一步侵犯中国的主权，而清政府步步退让，遂使局势失去控制。为了诱人入教，壮大教会势力，外国

传教上一味宽纵和包庇教民，外国使、领人员一味宽纵和包庇教会。他们打着保护教民、保护信教自由的旗号，肆意干涉中国的司法行政，借清政府之手压迫平民。遇有教民犯罪，被官府捉去，教士就将他们要出。遇有民教纠纷，辄强迫地方官袒护教民，打击平民。地方官如不听话，教会就通过清政府将其革职，甚至充军流放。例如，四川总督刘秉璋，就因违抗教会之命、坚持对民教双方公平判决而被革职。天津道、府、县官员周家勋、张光藻、刘杰因核查教民参与迷拐幼童一案而被皆革职，张、刘二人还被发往黑龙江充军。因不满于江南教案的处理，外国侵略者还曾带兵轮赴南京两江总督衙门威逼吵闹，吓得曾国藩连大气都不敢出。这些中国官员所以受到惩办，无非因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主权；受到百姓爱戴，则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司法公正和民众的合法利益，尽了一个国家官员的应尽之责。此亦可见人民冤抑之深，教会为害之烈。而近代以来，民教冲突所以愈演愈烈，就是因为西方殖民主义者坚持以教会为侵略工具，向中国步步进逼，而清政府却软弱退让，严重失职。总之就是因为中国主权丧失越来越多，以致中国政府事事不能自主。例如，外国人在中国享受治外法权，已经是对中国主权的破坏。而教民犯罪中国官员不能惩治，实际上也享受治外法权，这就更加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主权。近如京师、省会，远至穷乡僻壤，到处充满这种特权人物，百姓岂可安居，中国岂有宁日！当时曾国藩已经看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如此下去，必然酿成更大的“祸乱”。他在天津教案办结之后，曾与李鸿章、丁日昌联名上奏，称教会已为“国中之国”，教民遂成“编外之民”，并拟定数条措施，以稍抑教会日益膨胀的势焰。不料各国

对总理衙门的照会不予理睬，清政府也只好不了了之。结果，不幸为曾国藩所言中，终于在帝国主义瓜分狂潮的激发下，发生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

天津教案的起因与性质，和其他教案略有不同。其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主权之争更为突出。只是长期被人忽略，似乎除顽固派之外，谁都不想扯出这个问题。曾国藩和清政府都企图回避矛盾，强调其民教之争的一面。尽管他们在洋人面前卑躬屈膝，但却仍然装腔作势，摆出一副凌驾于洋人与国人之上的虚伪姿态。故虽然已经强烈感到该案的发生和处理都涉及国家主权问题，如认为该案的触发点是丰大业枪打刘杰，三员论抵事关国体，惩办天津府县后果严重，破解之法即由地方官接管教会等，但却始终不肯说破此事。他自己最后所以弄得身败名裂，“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也是因为没有维护中国起码的主权与自尊，将之办成典型的屈辱外交。研究者的情况则与之不同。马列主义学者旨在突出人民群众在近代史上的主导地位，不愿承认天津民众毆毙丰大业的直接动机，是为了维护朝廷命官，为刘杰抱打不平，即所谓“帮打”。新潮学者则着意淡化这场冲突的尖锐性，抹煞其侵略与反侵略的本质，极力将政治问题扯到文化上，当然就更不愿没事找事了。只有那些不识时务的顽固派，竭力强调津民舍命护官，不知身已犯法，一下子将天津地方官推到这场冲突的前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当时的客观事实，但因不符合人们的口味，故谁都不予理睬。笔者《再论》一文虽已涉及此意，但未及展开，此文当略补前失。

从总体上看，由于西方在华传教之权源于不平等条约，是用战争手段强迫清政府接受的，其本身就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而其

实行文化侵略的最终目的，则更是为了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由掠夺部分主权到全部主权。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一切抵制洋教在华传播，一切反洋教、反侵略的斗争都带有争取民族独立，争取国家主权的意义。天津教案当然也是如此。但若从总个发展过程上看，其不同发展阶段，在表现程度上又有所不同。就此而言，天津教案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从发现天津法国天主教教育婴堂幼童大批不正常死亡和有人拐卖幼童到将拐犯武兰珍扭送天津县衙为第一阶段，从中国官员接办武兰珍拐卖幼童案到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为第二阶段，自殴毙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起为第三阶段。从主观意图上看，在第一阶段，天津民众向教会的斗争主要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他们认为教堂收买和虐杀中国幼童，怀疑天津府县袒护教堂不敢认真查办。于是，就自己动手捉拿拐匪，定要抓住真凭实据，消除这一祸患。其时只是要制止教堂的这一犯罪活动，并没有想将其连根拔除。故尚未超出民教冲突和不平等条约所允许的范围。第二阶段主要表现为中法两国官员间的矛盾和冲突，民众则退居次位。由于民众斗争的压力和鼓舞，中国官员一改事事屈从洋人的常态，坚持查办武兰珍案，尤其拒绝无理逮捕同观教堂的中国民众后，同法国的矛盾骤然加剧。丰大业对此痛恨已极。如果说隐匿王三只是包庇犯罪教民、掩盖教堂罪行的话，鞭打和污辱奉命处理民教纠纷的中国官员，则属对中国的疯狂反攻。在这种场合，这些官员无论职位高低都代表着中国政府。他拒绝捕人，不仅是在维护人民的正当权益，也是维护国家主权，一个中国官员不能听命于外国人。何况，一个教堂的杂役人员，俗称仆人或“鬼奴”者，有什么资格令他捕人！更何况

平民无罪，仅一时与教民口角争斗，且已奉劝散去，并未冲击教堂。其遭到拒绝是理所当然的。不料丰大业竟为此发疯。这样，他所鞭打和污辱的也就不仅是这儿名官弁，而是中国主权和中华民族的尊严，每个血性男儿都不能不为此感到愤怒！及其三次向中国官员开枪，则不仅是这种侵犯的升级，且已超出和平交涉的范围，简直有点像不宣而战。无怪乎会由此引出中法开战的误传。这就是说，在天津民众看来，这不仅仅是丰大业个人向崇厚个人开枪，而是法国向中国开枪。所以，当丰大业打响第一枪之后，民间消防组织水会就立即鸣锣聚众，人们亦势如潮水，从四面八方涌向商署“帮打”，即帮助官府打仗。不过，当时群众的态度还是非常克制的，还在静观事态的发展。当丰大业两次向崇厚开枪，愤然冲出三口通商大臣衙门时，围观群众仍然强忍怒气，主动给他让出通道。其后若不是他枪打刘杰，重伤亲兵，以后的事情完全可以避免。因为这次丰大业是在二人面谈之际，并无争执的情况下突然开枪，若非高升舍命相救，刘杰必死无疑。这也是外交史上极为罕见的丑恶事件。第二阶段则天津民众由二线冲到一线，由护官到越俎代庖，已经超出民教冲突和不平等条约的范围，斗争方式也由和平的变为暴力的。他们所要维护的已不仅限于个人的实际利益和某个个别官员，而是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其行动也不再限于制止洋人超越条约的侵害，而直欲将一切在华侵略势力连根拔起。也就是说，不仅要维护不平等条约所限定的主权不再受到侵犯，还要将因清政府签定不平等条约所丧失的主权也一起收回。在这方面，同义和团运动略有相似。但当时的清政府根本就不想这样做，他们自己也无力担当这场战争。故其盲目性是不言而喻的。且因

事起仓猝,群龙无首,人员混杂,其政策、策略云云,就更无从谈起了。

总之,西方殖民主义者强行在中国传教,就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而教会及其主子的一系列罪恶活动,则进一步破坏了中国主权,给中国广大民众带来沉重的灾难。故一切反洋教斗争,都程度不同地带有反抗外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性质,而天津教案则尤为突出。其最初起因虽为拐卖幼童一案,但引发这场冲突的关键性一击,还是丰大业枪打刘杰一事。民众的最初动机虽为维护自身利益,但其最后出手的动机,还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若非丰大业接连三次向中国官员开枪,或天津民众始终袖手旁观,这件事就不会发生。

一部近代教案史,就是中国人民受压迫、受欺凌的历史,读来令人痛心。可以说,幕幕皆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制造的人间悲剧。他们为了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强行在中国传教,硬生生的将中国民众一分为二,并将教民置于平民乃至清政府之上,使之成为凌驾一切的特殊社会群体,张扬跋扈不知自敛。如果有什么灾难降临到他们头上,也只应怨恨那些别有用心的洋人,何况这些灾难远不如平民沉重。教民平民都是骨肉同胞,身上流的都是中华民族的血,若非外国侵略者的挑动,何以结怨日深,长期仇杀?在这方面,平民多是被动的,多属自卫的性质,最终付出的代价也是极为沉重的。他们既遭洋人打击,又被清政府所出卖。解放后,驱逐了外国侵略势力,实行宗教自传、自管,再没有发生民教仇杀之事,就可证明这一论断。

此外,清政府的严重失职,也是导致民教冲突愈演愈烈的一个

重要原因。如果它能顶住洋人的压力，主持司法公正，教会就不会那么嚣张，平民也不会冤抑太甚。它若能在洋人面前挺得住，丰大业再形疯狂，也不劳津民从旁出手。到头来，天津人民不仅遭洋人打击，还被清政府所出卖，付出了过分高昂的代价。所以，他们的贸然一试，无论多么英勇悲壮，无论得到后世多么崇高的历史评价，都不如根本没有发生。更何况时代变迁，沉浮无常，言人人殊！

综观近代教案史，其最大的教训，就是一切宗教必须由政府管理。宗教权也是国家主权，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掌握，不能落入外人手中。中国人曾为此吃尽了苦头，这个历史的教训不应忘记。必须严禁外国教会及其代理人到中国传教。驱逐宗教界中的外国侵略势力，坚持宗教自传，是民主革命的一项重要成果，胜利来之不易，不能付之东流。梵蒂冈的“封圣”活动，不只是向中国人民的挑衅，也是妄图卷土重来的公开宣言，一定要粉碎它的阴谋。中国人民是酷爱自由的，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的自由，尤其坚持宗教自传、自管。一切外国教会及其代理人在中国的传教活动，都是非法的，都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是绝不允许的。信不信教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劳外人插手，也休想用什么中国没有信教自由的帽子压人。中国人不信邪，不怕压，也不上这个当！

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外国传教士

王晓秋

2000 年是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侵略中国，1860 年打进北京，洗劫焚烧圆明园，并逼签《北京条约》的 140 周年，在中国近代史上被称为“庚中国耻”，是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国耻大辱。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抢劫和焚烧了被誉为“万园之园”的世界园林艺术典范、珍宝文物宝库圆明园，连侵略者英国军官戈登自己也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这方面的滔天罪行已有许多论著揭露，本文着重揭露西方传教士与第

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与签约的关系及其扮演的不光彩角色。

西方列强虽然通过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美望厦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割地赔款、五口通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侵略利益和特权，但这还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野心和贪欲。因此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又不断要求“修约”以扩大侵华权益，特别是企图取得开放中国内地市场、贩卖鸦片合法化以及进入内地传教等特权，但屡次遭到清政府拒绝。因此英法等国政府一直处心积虑阴谋策划一场新的侵华战争，并千方百计寻找挑起战争的借口。

在鸦片战争后 1844 年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黄埔条约》中，虽然允许法国人在通商口岸建造教堂和房屋、坟地等，道光皇帝也于 1846 年公开下令不再查禁天主教，但在《黄埔条约》23 款中也明确规定法国人只准在上海、广州等五个通商口岸传教，而不准私入内地活动。条约上写“法兰西无论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拿”。但是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马赖神甫（又名马奥斯多 *Chapde Laine Auguste* 1814—1856 年）却明知故犯，擅自潜入中国内地湖南、贵州、广西等地活动。他在 1855 年潜入广西西部偏僻地区西林县进行非法活动，并贿赂当地官员，勾结庇护地痞教民，与当地官民发生冲突。加之当时太平天国正以拜上帝教为号召发动农民起义打击清政府统治，使清朝官员对基督教更产生敌对情绪。因此 1856 年 2 月西林县知县张鸣凤以马赖勾结地痞林八、马子农等教民，“妖言惑众，结伙拜会，并且奸淫妇女，抢劫村寨”等罪名，将法国传教士马赖，及教徒曹桂英、白小

满等逮捕、审讯后处死。

马神甫事件的消息传到法国，当时执政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第二竭力推行对外侵略扩张的海外殖民政策，而在亚洲的主要侵略对象就是中国。19世纪50年代初，法国因克里米亚战争，无力在亚洲用兵，而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法英联盟战胜俄国，拿破仑第二蓄意找寻借口再与英国合伙侵略中国，并以此转移国内人民反对他的独裁暴政的视线。因此便抓住马神甫事件为借口，打出保护圣教的旗号挑起战端，并希望此举既能进行海外殖民扩张又能获得国内天主教派的支持。1856年9月法国外交大臣瓦爾斯基会见英国驻法公使考莱，密谋策划侵华战争。据考莱9月28日给英国外交大臣的报告中说：“瓦爾斯基在昨天会谈的过程中，曾提起一个法国在华传教士被杀的事件。他说法国政府已经下定决心，要从这次凶杀事件中得到充分的补偿，倘若法国驻华代办谈判失败，并见他手头没有足够兵力的话，法国政府就打算从法国本土派一支远征军到中国去。瓦爾斯基表示深信，倘若一旦必须对华采取军事压迫手段时，英、美两国政府一定会和他们联合一致，为遭杀害的基督教徒复仇。”^①英国政府对法国的侵略计划立即表示支持，愿意“同法国政府一起，索取这种赔偿”，并建议“远征军可以在长江取得一个据点，以便形成一种对中国更直接、更有效的压力”。后来英国也制造了一个“亚罗号事件”为挑衅借口，终于在1856年10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年10月英国远征军舰队在法国特使葛罗率领下到达中国沿海，英法联

^①摘自英国《蓝皮书·关于在华受辱事件，1857年》第122页。

军发动了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1857年12月占领广州，1858年5月攻击大沽口，6月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1859年6月英法联军再次进攻大沽口遭清军抗击，英法两国再次调兵遣将增兵，于1860年8月攻占大沽口与天津。10月上旬攻占并抢劫、焚烧北京郊外皇帝行宫圆明园，10月下旬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除了西方传教士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曾为英法联军提供重要情报，侵略建议以及参与迫签不平等条件的谈判、翻译等行为外，这里还要揭露法国传教士孟振生如何在中法《北京条约》中擅自塞进传教士可在各省租买山地的内容。

孟振生(Mouly Joseph Martial1807—1868年)原名穆列·约瑟夫·马夏尔)法国遣使会传教士，1835年来华，1840年当选内蒙古教区第一任主教，1846年任北京教区管理人，1856年为直隶主教，1860年他参加了中法《北京条约》的谈判，担任法国代表团翻译和文件起草人，在中法《北京条约》的起草过程中，他玩了一个花招，在条约中文本中私自添加允许传教士租买田地的文字。中法《北京条约》(又称《续增条约》)于1860年10月25日签订，中法双方商定以法文本为标准文本，其中第六款原文是“按照1846年3月20日道光皇帝发的上谕，凡在禁教中被没收之基督教徒的宗教和慈善事业，均应通过法国驻华公使发还业主，中国政府应将它们连同其他附属建筑一并交给法国公使”。孟振生利用担任文件起草与翻译之机，在条约中文本上除将上面文字译为“又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莹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以后，又擅自添

加了一句法文本上没有的关键性文字，即“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①这一句话使外国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任何地方租买土地和盖房的特权，为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霸占地产，遍设教堂提供了条约根据和护身符，并成为后来各地发生民教纠纷及引起教案的严重隐患，而实际上根据国际法，一方在条约中采用欺骗手段不经过双方同意私自塞进的内容，不仅是无效的，而且是违法的，理应追究责任加以惩处。而当时腐败的清政府的官员们竟然没有察觉，据老一辈外交家顾维钧先生的《外人在华地位》一书中指出：“差不多十年以来，人们把这一增添的语句看作和条约中的其余规定一般，丝毫没有怀疑到它的真实性，直到 1869 年才发现它是伪造的”。此时清政府想要纠正已经来不及了。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又名杨笃、杨约翰 Tohm Griffith 1831—1912 年）写给英国差会的信中甚至宣称：“这个国家事实上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一切早已在中国的传教士和各自国内的差会，如果他们不去占领这块土地，不在十八个省的每一个中心取得永久立足的地方，那将是有罪的。”^②可见这个条文的影响及西方传教士的野心。

^①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 147 页。

^②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 66 页。

马赖与第二次鸦片战争

甄 实

梵蒂冈此次宣封的所谓“圣人”中，有一个名叫马赖的人。中国人民对马赖此人记忆犹新，他就是著名的“西林教案”主角，而正是西林教案，引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造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段屈辱的经历。

1、违反清朝的禁令，潜入内地传教

马赖 (Auguste Chapdelaine 1814 ~ 1856 年)，又名马奥斯多，是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甫。1844年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黄埔条约》中，

虽允许法国人在通商口岸建造教堂和房屋、坟地等，但条约也明确规定法国人只准在上海、广州等五个通商口岸传教，而不准私人内地活动。条约规定“法兰西无论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拿”。但就是这位马神甫，依仗帝国主义主子的撑腰，不顾中国政府禁令，于 1852 年擅自潜入中国内地湖南、贵州、广西等地活动。1855 年又潜入广西西部偏僻地区西林县进行非法传教活动。

2、破坏当地风俗、干涉教徒婚姻

西林县的各族群众都有祀奉祖先的风俗，马赖却视此为异端来加以反对，严令受洗的教徒拆除家中的祖先神位，不准上坟拜祖，因而造成许多家庭、宗族纠纷。新人教的农民白三，受洗后奉命回家拆除祖先神位，遭到父母及族中长辈指责，自己也觉得不能忘本，提出退教，又受马赖的斥责和压制。西林是民族聚居地区，各族男女青年有较多的婚姻自由权利，马赖却借“教规”加以限制，规定教徒及教徒子女必须娶嫁教徒，如果对方不是教徒，必须等受洗入教之后才准结婚。

3、勾结贪官强盗，扩展教会势力

马赖在西林白山寨、常井住定后，曾多次前往贵州，所经之处多为“绿林”出没之区。马赖便通过当地教徒与黔桂边境的“绿林”拉关系，想方设法利用“绿林”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左右地方绅士及

官员,而“绿林”们也想依靠这位洋大人的庇护。一次,一伙土匪在拦路行劫时杀死一个妇女。事发后,凶手林某经审问供认杀人不讳,判刑斩首。“绿林”们以林某等出狱后无条件为马赖卖命为条件叫林某的妻子串通教徒去向马赖求情,马赖即备厚礼去见姓陶的县官,经过几次讨价还价,终于成交,将林犯无罪开释。

4.违反天主教戒律,勾引奸淫妇女

天主教徒伦理生活的基本准则——“十诫”中第六诫明示:毋行邪淫。据西林定安等地的群众揭发:马神父对女人有特殊的爱好,他从贵州带来一个年轻漂亮的寡妇曹某,名义上是帮助传教,实际上是他的姘妇;此外马先生还千方百计引诱长相较好的妇女入教,时常单独和这些妇女在一起鬼混并趁机奸污女教徒;教徒结婚时都是由他做结婚弥撒,而他往往利用这种机会奸污新娘。

1856年,由于马赖的种种恶行引起当地百姓的强烈愤慨,将他告到官府,新任知县张鸣凤秉公执法,将马赖处死。法国以马赖事件为借口,打出保护圣教的旗号挑起战端,并希望此举既能进行海外殖民扩张又能获得国内天主教派的支持。英国政府也不甘示弱,制造了一个“亚罗号事件”为挑衅借口,终于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6月英法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该不平等条约,首次规定“天主教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便利了外国教会在华活动。1859年6月英法联军再次进攻大沽口遭清军抗击,英法两国再次调兵遣将增兵,于1860年8月攻占大沽口与天津。10月上旬攻占并抢劫、焚烧北京郊外皇帝行宫圆明园,10月下旬强迫清政府签订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北京条约》起草过程中,时任北京教区管理人的法国遣使会传教士孟振生利用其为法国代表团担任翻译和文件起草人的机会,又擅自塞进传教士可在各省租买田地的内容,借助不平等条约为其扩大宗教势力范围服务。孟振生(Mouly Joseph Martial 原名穆列·约瑟夫·马夏尔,1807-1868年),1835年来华,曾任内蒙古教区第一任主教,1860年他参加了中法《北京条约》的谈判。中法《北京条约》于1860年10月25日签订,中法双方商定以法文本为标准文本,其中第六款原文是“按照1846年3月20日道光皇帝发的上谕凡在禁教中被没收之基督教徒的宗教和慈善事业,均应通过法国驻华公使发还业主,中国政府应将它们连同其他附属建筑一并交给法国公使”。孟振生在条约中文本上将上面文字译为“又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莹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以后,又擅自添加了一句法文本上没有的关键性文字,即“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①这一句话使外国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任何地方租买土地和盖房的特权,为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霸占地产,遍设教堂提供了条约根据和护身符,并成为后来各地发生民教纠纷及引起教案的严重隐患。

外国教士与西方列强由于利益的一致而结成了一种紧密的关系,即传教士利用炮舰下订立的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为非作歹,西方列强则利用“教案”进行交涉以攫取更多的侵略权益。历史事实说明,马赖绝不是什么“圣人”,而是地地道道的罪人。

^①三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147页。

从衡州教案看近代 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

郑 义

在近代中国史上,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将中国开放给西方列强后,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不断地把侵略矛头伸入内地,中华民族由此掀起了广泛的爱国反帝运动。这一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及不同的人群中以不同的方式体现出来,在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至 20 世纪初则以反洋教斗争为线索将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串起。在清末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的特定背景下,传教士作为传

播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急先锋，妄图紧随列强武力征服中国的步伐，疯狂叫嚣：“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① 他们坚信“上帝的荣光一定要在中国显现，龙要被废止，在这个辽阔的帝国里，基督将成为惟一的王和崇拜的对象。”^② 为达此目的，入华传教士们纷纷将传教活动与列强的殖民侵略相结合，凭借不平等条约所攫取的特权争取教民，加快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由此，大批传教士把传教区从沿海向内地辐射，至 19 世纪 60 年代，传教士的身影便已遍及中国的各个通都大邑和穷乡僻壤。随着各地传教事业的蓬勃发展，传教士倚仗列强势力对当地百姓的剥削与压迫使民教磨擦益趋频繁。中国人民为抗击教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展开了波澜起伏的反教斗争，在清末百余年的历史上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爱国赞歌。

关于近代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性质，近年来学者们仁智互见，提出各自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评析这段历史必须与时代背景相联系，传教士与教会的劣迹是教案发生的前提，而民众的反帝爱国动机则是教案爆发的催化剂。本文拟以 19 世纪湖南衡州发生的教案为例，分析其爆发的背景原因，过程，议结情形，期于对近代反洋教斗争与爱国反帝关系的探讨，有所裨益。

^①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4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2版。

^② 《中国丛报》1982年8月，140页。转引自唐毅《从反洋教斗争看近代中西文化冲突》，29页，《文史杂志》，1997年第5期。

基督教传入衡州概况和衡州人民的反洋教斗争

衡州可以说是外国传教士在湖南南部的大本营，外国传教士的踪迹很早就出现在这里。最早传入湖南的教派是天主教方济各会。早在康熙年间，方济各派的传教士累佐拉提就由广东进入湖南地区传教，1700年在衡州府属衡阳县北门外建立了天主教堂。19世纪70年代，法国传教士里奇霍芬(Von Richtofen)在湖南游历，发现有天主教徒2200余人，都是雍正以前天主教徒的子孙。^①可见在雍正禁教以前，天主教就已在湖南拥有相当的基础。禁教以后，朝廷虽屡次严申禁令，不少传教士却于犯国法，非法潜入湖南传教。19世纪初，方济各会神父蓝月旺^②(Fr. Francesco Maria Lantrua)即不顾我国律令，潜入衡阳传教，并赁屋私设教堂。蓝月旺无视我国主权的非法活动使其于1815年在衡州被捕，1819年于长沙处以绞刑。鸦片战争后，传教士藉《中美望厦条约》取得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的特权。此时，外国传教士进入内地传教虽属违法，但是传教士擅入内地传教的情形已不鲜见。1845年，复有两班牙籍传教士陆怀仁非法来到衡阳，设立道友堂，长期留驻衡阳传教。随着湖南教务的拓展，湖南于1856年从南京教区独立出来，成为独立的教区，陆怀仁忝为主教。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主教与基督新教正式获得了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特权。从此，湖南与其他省一样，各

^①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P321, New York, 1929.

^② 蓝月旺于1990年5月27日被列为真福品。

国传教士踵至纷来，教务日益发达，意大利、法国等国的天主教士和稍后英国的新教教士均先后汇集衡阳，大力拓展传教事业。1879年，罗马教皇划分湖南为南北两教区，北境教区设主教府于澧州，属奥古斯丁派范围；南境教区以衡州为主教府，势力包括湘南、湘东南的醴陵、耒阳、安仁各县，仍属方济各会统辖。这样，在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衡阳成了外国宗教势力在湖南南部的传教中心。

基督教会衡州的传教事业与西方列强在这里的殖民扩张是步调一致的。急于归化中国人民的传教士们乐于接受帝国主义势力对传教活动的渗透与支持，有些传教士甚至鼓励这种渗透的加强，因为传教活动的成功最终有赖于外国帝国主义列强的潜在势力，民教纠纷也只有外国领事的有力干预下才获“圆满解决”。同时，传教士因其与列强的特殊关系而在不同程度上充当了列强侵略中国的先遣队。这一点在衡州教士身上表现更为突出。尽管传教士们一向标榜所谓“劝人为善”的传教动机，然而，他们所从事的种种活动无不凸显出烙印在他们身上的侵略色彩。近代衡州人民迫于教会势力的咄咄进逼，在反帝爱国情感的支配下，奋起与教会抗争，由此揭开了衡州人民反洋教斗争的序幕。近代湖南衡州爆发的教案中，其中三件值得探讨。

一、1855年衡州人民捣毁道友堂的斗争

这是近代衡州人民首次较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有关资料虽不多见，但经过仔细梳理，可以再现此次衡州民众反帝爱国运动的概况。教案发生的原因是传教士破坏衡州人民的礼仪风俗，诋毁中国的文化传统。当地民众出于维护本土文化的目的，被迫与教

会进行坚决的斗争。当时一位教民娶亲，女方不是天主教民，传教士却要求他们按照天主教的礼仪方式来完成婚礼，遭到女方及其亲属的强烈反对。当时在衡阳主持道友堂的教士陆怀仁不顾当事人的反对和地方舆论，仍然坚持按教会仪式举行婚礼，并以种种方法相要挟，激起民愤。于是以女方亲戚朋友为主，附近的乡邻居民行动起来，将陆怀仁驱逐出境，并将道友堂彻底捣毁。^①这次教案的爆发标志着近代衡州人民反教斗争的开始，它也是近代湖南人民第一次捣毁教堂，驱逐传教士的反帝爱国斗争。

二、1861 - 1862 年衡州教案

1856 年，传教士陆怀仁重回衡阳主持教务，要求官府对 1855 年被毁的道友堂予以补偿，但牵延几年而无结果。1860 年《北京条约》签订后，传教士自恃有约可凭，要挟衡永郴桂道黄文琛清丈土地，赔偿 1855 年焚毁教堂的损失。重建道友堂，并变本加厉地剥削、压迫当地民众，鱼肉乡里。一些地方上的地痞无赖也见风使舵，加入天主教会，借洋势力的支持横行乡里，为祸一方。教士教民的倒行逆施激起了衡州人民的强烈愤慨，民教间的冲突处于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正当衡州人民隐忍待发之际，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的消息传到湖南，大大激发了衡州人民的民族危机感，一场民教冲突迫在眉睫。

教民们的为非作歹活动首先成为这次反洋教斗争的攻击目标。1861 年 3 月，在民众的强烈要求下，衡永郴桂道冯崑和衡阳

^①王继平《近代衡州人民反洋教斗争述论》，86 页，《衡阳师专学报》1985 年第一期。

知县刘凤仪，清泉知县陈宝善，将一贯为害乡里的教民张道荣逮捕拘禁。延至 1962 年初，湖南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开始走向高潮。3 月，“忽有湖南闾省公檄二纸，痛诋该教不敬祖宗，不分男女，甚且有采生折割等事，遍贴街市”。^① 揭帖揭露了教士教民的罪行，给衡州人民以很大的鼓舞。5 月 1 日，正值衡阳童生县试，童生们乘机与群众一道，一举捣毁道友堂，接着又四布乡下，拆毁那些为非作歹的教民的房屋。在这次反洋教斗争中，“衡州有一座主教府邸，两座教堂，一所育婴堂，以及六十户教民住宅遭民众焚毁”。^②

三、1900 年衡州教案

近代衡州人民反洋教斗争中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是 1900 年在义和团运动影响下爆发的衡州教案。

1862 年衡州人民的反洋教斗争结束后，衡州的天主教势力又有了较大发展，到 1900 年教案爆发前夕，湖南南境“教友五千七百余，住堂十、会所六十三、公堂十三、小堂三十五”。^③ 主教总堂设于离衡州府城四里之遥的黄沙湾，这里共有八个西教士、七个本籍教士，建有一所修院，七所男女小学堂，三所育婴堂。

随着教会势力的膨胀，一些教士教民的活动越来越背离“劝人为善”的本旨。如总堂神父董哲西（Fr. Cesidiogiaco - mantionio），1889 年初到衡州时，“即在黄沙湾圈占十五姓居民菜土、竹林十多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27 页。

②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P321, New York, 1929.

③ 《拳祸记》，389 页，391 页。

前。”^① 教民在传教士的纵容下表现更为嚣张，每每倚仗洋势欺压乡里。如衡州地方恶霸彭兰生、富绅王吉仁被福音堂英国牧师明德收买为学教士，代为传教。彭、王二人有了帝国主义的暗中撑腰，狐假虎威，经常乘坐官轿出入州县，在衡阳，清泉二县划区治事。衡阳在商，清泉在北，于是彭兰生自称“南老爷”，王吉仁自称“北老爷”。当时民间迭次发生丛殴、勒索、强借、强贷、逼奸、诈婚、谋财害命等案件数十起，“无不由于外国教士指使教民中的败类从中兴风作浪所致”。^②

1900年6月，义和团向津京地区迅猛发展，八国联军开始大举侵华。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局势对当时衡州的民教双方产生重大影响。传教士董哲西在联军侵华浪潮的鼓动下，认为正是趁火打劫的大好时机，遂诱使彭兰生贿赂州、县官，借口扩充教堂、培植果园，企图霸占江东岸一带淤洲，勒令当地农民、渔民、船户等数百人限期迁徙。居住在江东岸的众多劳动人民生活遭到威胁，无不切齿痛恨传教士的胡作非为。

6月下旬，津沽开战的消息传至湖南，长期忍受教会欺凌的广大民众深受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战争的鼓励，一时民心浮动，“众思一逞”，酝酿着一场新的反洋教斗争。6月底，“黄沙湾总堂传教士董哲西引诱衡阳县署钱漕马迪庵家中妇女入教，前往江东岸僻静处洗沐”。^③ 衡州人民知情后益增反感愤怒，社会上出现董哲西

① 杨世骥《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63—6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② 杨世骥《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63—6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③ 刘洪洪《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湖南衡州教案》，134—135页，《求索》，1991年第一期。

“江边设帐，白昼裸淫”以及“现有上谕到衡，务将城内教堂一律封闭”一类的传言。7月1日，衡清两县官府屈从传教士的旨意，以严办“伪造上谕之匪”为由，逮捕了江东岸不愿迁徙的居民100余人。^①消息传出，犹如厝火积薪，群众的怒火像火山般爆发出来。3月，愤怒的群众首先捣毁南门外的英国福音堂。第二天午刻，3万余群众涌向黄沙湾，包围了法国天主教总堂。当时在教堂的有意大利籍传教士任德高和法国传教士董哲西。他们见教堂外民众群情汹涌，慌忙隐匿楼上房中，不久被发现。民众破门而入，将传教士扭到院中，任德高遭拳打石击，倒地佯死，后经教徒抢救出堂，舁往北乡，潜伏于农民家中一月，六易其居，终于逃过一劫。董哲西民愤最大，群众将其擒获，矛刺棒击，重创后拽于堂外，“裹以絮被，灌以火油，活烧致死，全体归灰”。^②此时湘南主教范怀德（BP, Antonino Fantosati）与司铎安守仁^③（Fr. Giuseppe Maria Gambaro）正在耒阳杉木桥监造教堂，接到任德高的告急信，于5日搭船下驶，打算逼勒地方官加以弹压报复。7日，船抵清泉县境港子口江东岸厘卡，被行人发现，愤怒的群众群集而至。被迫迁徙的船户们愤怒更甚，渔船、划子、渡舟等将洋教士团团围住，掳获上岸，将二人痛殴致死，尸身毁弃无存。此外，“耒阳、衡山、常宁等县之礼拜所亦有损毁”，^④但未伤及外国传教士。

^①刘洪洪《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湖南衡州教案》，134—135页，《求索》，1991年第3期。

^②《拳祸记》，389页，391页。

^③董哲西、范怀德、安守仁于1946年11月24日被列为真福品。

^④《清末教案》（二），942页，中华书局，1998年10月版。

近代衡州民众反洋教斗争的启示

近代衡州人民波澜壮阔的反洋教斗争构成了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叙述民众起而反抗列强借教会侵略中国的同时，控诉了不少传教士倚仗特权欺凌、压迫中国人民的罪行，揭示出在近代中国，基督教在中国得以突进式的发展正是因其以帝国主义武力为后盾的畸形产物。

一、教会与教士民的劣迹是民教冲突产生的重要前提

具有几千年悠久文明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兼容并蓄的开放体系。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传入中国的不同宗教都得到了中国人民不同程度的接纳，并在中华民族的大熔炉中经过不断的拒斥与融合，最终发展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分子。只有在宗教严重影响中央与地方行政权力的实施，或破坏了国家经济与财政税收时，国家政府才会以行政命令强迫禁教。如唐武宗时，佛教的超限制膨胀造成国家税收的不足与劳动丁口的缺乏，威胁到以皇帝为代表的世俗地主利益，才会有“武宗灭佛”之举。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国传播时，也同样得到了我国政府的允准。而罗马教皇无视我国主权，下令禁止中国教民祭祖尊孔，粗暴干涉我国内政，才引发了康熙以后的百年禁教。清末基督教在清政府弛禁之初即遭到中国人民的普遍排斥，究其原因，与基督教在列强支持下的传播及某些教士教民的恃势为非有密切关系。我们在近代衡州教案上可以找到很好的例证。

近代来衡的许多传教士的所作所为与他们的身份极不相称。他们搜集情报，直接参与列强对华军事、政治、经济的侵略；他们干预诉讼，插手内政，欺压百姓；他们强租房地产，经营土地，开设店铺，残酷剥削中国人民；他们还吸收“市井无赖齐民不齿之徒入教”，并加以庇护，使之成为“凌轹乡里”，为恶一方的邪恶势力。在 1862 年衡州教案爆发后，衡阳清泉两县绅民贴出《湖南逐异类公呈》，列数了传教士在衡州犯下的滔天罪行：

“北门有十字街，嫌触其忌讳，聚众毁民房，易街道，一市大哗，相持数月始罢。又教门发引，有小儿戏于径，偶扬灰如十字形，辄系小儿父兄。生员萧方规劝解，并遭毒毆，且葬棺入儿屋以瘞，邻里为醮金顿首谢始解。又遣其党四出鬻糖饼，设店称施药，误服食之者，小儿多泄泻死，大人必发狂，思入其教。又下关有米雁塔，教门引夷目数人悄登其上，用远镜俯瞰（瞰）城内外形势，绘图以去。又素有不法之张道荣，案发收系，一投彼教，即有夷目来扛护，官府即释，不敢问。又教门有船只数十，终年往来载运，每月数回，每船木桶数百，收发于城外之香水庵，而封识甚固，不知为何物。”^①

上录《公呈》中揭露了教会破坏中国主权、测量衡州地形，一直到包庇败类，借故骚扰，甚至直接运销鸦片和商品的罪恶行径。为了争取乡民入教，教会不惜花费巨金收买人心。在衡阳，传教士对入教的平民每人赠送白银十两，生监以上入教者，按不同级别加倍给予白银，以此扩大势力。对于入教的教民，传教士纵容和唆使他们为非作歹，如果地方官加以干涉，他们则投函干预诉讼，利用特

① 王明伦《反洋教文书揭帖选》，98-99 页，齐鲁书社，1984 年 6 月版。

权迫使地方官屈从。在洋势力的支持下，一些入教之人俨然成了化外之民，似乎他们也秉承了洋主子所享有的治外法权，当时衡州的情形正如时人所揭露的那样，教民“一人入教，一家都可犯法；朋辈吃教，党羽均可作奸。”^①这样，以传教士为主子，以教徒为属民，在衡州形成了一个新的地方势力集团。为了加快教会的传播，他们频频主动出击，与地方官绅争夺乡社领导权，中国传统的礼法治国在教士教民的干预下几乎陷于瘫痪。然而，当时的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表现软弱，自身处于苟延残喘的内外交困局面，无力对传教士的进攻作出有效反应。在这种情况下，素怀爱国之心的衡州民众挺身而出，开展了一系列的反洋教斗争，对于抵制帝国主义借教会进行殖民入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传教士与教民在地方犯下的罪行，就不会有反洋教斗争的发生。教士教民的劣迹是酿成教案的重要前提。

二、教案议结时传教士的疯狂

报复是帝国主义借教会侵略中国的铁证

在中国近代史上，每一次教案的议结无不经过中国政府与外国领事不厌其烦的交涉与磋商。软弱的清政府在列强咄咄逼人的威势面前屈服认错，列强借此机会向清政府索要新的侵略权益，传教士们则乘机扩大教务，并对中国人民进行疯狂的报复。1897年德国政府借口两名传教士被杀，出兵占领胶州湾，代表了帝国主义

^① 《贺金声遗集》卷上。

势力与教会事业的“完美结合”。衡州教案爆发后帝国主义列强和教会也不失时机地向清政府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将侵略魔爪伸向衡州的各个领域。

1、1861 - 1862 年衡州教案发生后，湖南主教方安之即刻北上京师与法国公使哥士耆商议报复事宜，并声明该案“一日不结，一日不归”。哥士耆接到方安之的报告后，亲赴总理衙门，并开列出议结此案的七条建议：（一）总理衙门印发行文，“严切咨照两湖总督官、湖南巡抚……饬禁所属官员及士民人等，以后不得仍蹈前辙，否则惟该省督抚是问”。

（二）方安之主教回湘时，两湖总督及湖南巡抚应以礼接待，并派兵护送。

（三）将衡州大道上所嵌十字架起除，并贴告示示禁。

（四）赔偿教堂损失白银 4 万余两，重建天主堂公所，“于被难教民中，择其年高品正者二人，给与顶带，以示矜恤。”

（五）查明送还康熙乾隆年间的衡州旧天主堂，或另行赔偿。

（六）在长沙城内择其空闲庙宇公所，“须得房屋整洁者，约地十五亩上下，送归方主教为教中公业。”

（七）将衡永道冯崑革职查办，永不叙用。^①

法使的七条建议中，由总督与巡抚接待教士，助长了反动传教士的气焰；归还旧堂，则将引发新的纠纷；建议撤销地方官，干涉了我国的内政。然而，在列强势力的胁迫下，卖国的清政府不顾衡州人民的反抗，将衡阳、清泉二县知县及衡永彬桂道冯崑革职，并赔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23 - 25 页。

款教堂损失。衡州人民对教会势力得寸进尺的要求表示了极度的忧虑，“在衡人方恨未尽覆其巢穴，一旦官为修复，凶焰再张，其所以鱼肉我衡人者，将来不知更作何状？”^①

2、1900年衡州教案爆发前夕，传来湘潭县毁堂伤人的消息，对洋人秉性极为了解的两湖总督张之洞不胜惶急。且当时北方战况未明，西方列强正欲多派军队参战，“湘鄂若稍滋事端，彼族必更藉口，更难收拾”，于是张之洞要求巡抚俞廉三“务祈严饬各属，认真弹压，多派兵役，将所有教堂，实力保护。”^②这也是张之洞迫不得已采取的办法，他深知“此时毁堂易，将来赔款难”^③的道理。

衡州教案爆发后，衡永彬桂道隆文，衡州知府裕庆等出于平时对教会所作所为的痛恨，严密封锁消息，向上方禀告“由县细查，绝无一洋人被杀被捉”，力图掩饰案情。7月14日，有华教士二人由衡州逃至武汉，向法国驻汉口领事面报衡州教案的简况：“衡州教堂初十被匪焚毁，堂内洋教士男女九人，目击意大利国教士二人被杀，有二人闻在他处遇害，二人被匪掳捉，其女教士三人不知下落。”^④法领问报大惊，即日向江汉关道提出救护教士、收交被害洋教士尸身、保护被难教民三项要求。湖南地方官员包括巡抚俞廉三、衡永彬桂道隆文、衡州知府裕庆等意存观望，对法领提出的

①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98-99页，齐鲁书社，1984年6月版。

②王树编《张文襄公（之洞）全集（电版）》，11498页、11785页、11627页、11861页、11880页、11881页。见中国近代史料丛刊446集。

③王树编《张文襄公（之洞）全集（电版）》，11498页、11785页、11627页、11861页、11880页、11881页。见中国近代史料丛刊446集。

④王树编《张文襄公（之洞）全集（电版）》，11498页、11785页、11627页、11861页、11880页、11881页。见中国近代史料丛刊446集。

要求迟迟不作回复。9月中旬，英法领事见地方官对衡州教案不仅不肯“拿究办理”，竟还贴出告示劝教民悔教，提出将此教案并入京师议和大局中办理。张之洞慌忙致电俞廉三，指出其在办结教案上的原则性错误，“时局艰危如此，乃该道府事，前不善防维，事后三月毫无办法，且竟出此等告示，玩其词意，一若教堂被毁，洋人被杀，可不追究，从此教士可不回衡，教民尽勒令悔教者，糊涂荒谬极矣”^①

9月21日，英法领事面见张之洞，催办教案，“语意甚急”，并提出刻下应立即执行四条：“一、严饬将告示即日全数撕净；二、另出保护告示，安抚教民，令其回家安业，不得逼令悔教；三、将道府分别撤参；四、速拿焚杀首要惩办。”^②法国在与官方议和妥办之时，为胁迫地方官屈从列强旨意，派出兵船，“云系为保护教堂而来，此案若不速了，难免不开往岳州”。^③

在帝国主义的武力催逼下，湖南巡抚俞廉三加紧了衡州教案的善后处理。1901年4月9日，俞廉三为议结事上奏朝廷：“业经严饬文武员弁，缉获焚毁福音天主两堂匪徒，及戕害洋人凶手周信鹅、李淋、周传志、冯时海、李禾尚、刘振卿六名，复续获周振才、邓得民、杨泽漳、杨彩于四名，共计十名。研讯明确，均属情真罪当，

^①王树编《张文襄公（之洞）全集（电子版）》，11498页、11785页、11627页、11861页、11880页、11881页。见中国近代史料丛刊446集。

^②王树编《张文襄公（之洞）全集（电子版）》，11498页、11785页、11627页、11861页、11880页、11881页。见中国近代史料丛刊446集。

^③王树编《张文襄公（之洞）全集（电子版）》，11498页、11785页、11627页、11861页、11880页、11881页。见中国近代史料丛刊446集。

先后批饬就地正法。其余从犯，仍饬严拿。”^①对英国福音堂及教民的损失赔银一万六千两。在与法国的洽商上，签订《衡州法国天主教案议结合同》，共十款，主要内容为：一、除已缉获斩决的六名首犯外，其余人犯须设法拿获，按律惩办；二、在范、董二教士致命处建碑“旌表其名，以垂永久”，并补建总堂一座。三、赔偿教堂损失银两三十八万两，四个月内付清；四、追还所有教堂教民的田房约据，毁失的由官府赔补；五、教民奉行教规，族谱不得削名，免派迎神赛会捐；六、今后有来湘教士应由地方官府妥为保护。^②

对地方官员的惩处也同时进行。衡永彬柱道隆文、衡州知府裕庆因“保护不力”被革职，永不叙用。甚至连地方大吏俞廉三也难免受到牵累，因“办理此案不免迟缓，……著革职留任。”^③

此外，贪婪的侵略者并不因此而满足。1901年6月，奕劻李鸿章等在协议《辛丑和约》的过程中，各国使节提出：“湖南省之衡州府，应停止文武考试五年。”为此，6月16日，俞廉三致电奕、李等，请求“专停府学及衡阳、清泉两县文武考试五年。”其余教案情形均不甚重，各县免停。后经再三磋商，允准“衡州府属考试，概免停止，惟五年内不可在府城开考，即借邻棚举行。”^④

从以上两次衡州教案的议结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教会与列强借教案来进一步索取侵略权益的一副贪得无厌的丑恶嘴脸。教士教民的被杀，引了更多中国人民的流血牺牲；教堂与教民的损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1019页、1204页、1231页。

② 《赔订教案汇编》卷五，2-3页。

③ 《清末教案》(二)，47页，中华书局，1998年10月版。

④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1019页、1204页、1231页。

失，更要中国人民以天文数字般的巨额赔款来偿还。因此，近代教案议结时传教士的疯狂报复是帝国主义借教会侵略中国的铁证。

三、近代反洋教斗争

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精神

近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殖民侵略包括政治侵略，经济侵略与文化侵略。这三个方面不是彼此孤立，单独进行的，而是相互交织成一个侵略网，对中国实行全方位的渗透，一步步地将中国逼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在列强的文化侵略中负有重要使命的基督教会，自然也遭到了中国人民的拒斥，一幕幕风起云涌的反洋教斗争向世人表明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勇于抗争的反帝爱国精神。关于群众凝聚在反洋教斗争中的这种真挚的爱国情感，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分析得出。

首先，19世纪列强的侵略是广大民众进行反帝爱国的反洋教斗争的前提。我们不妨与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概况相比较。明末清初天主教东传，传教士来华的主要目的是要归化广大的中国民众，但是他们在客观上却起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载体作用。特别是在中西和平交往，无任何特权可供依靠的情况下，传教士们在对待传教中所遇到的民教纠纷及中西文化分歧时，采取纯文化上的求同存异，以求得争端的解决。到了19世纪，伴随着鸦片、商品和大炮，刚刚闯进中国人门的传教士们，更想继续用征服中国军队的暴力手段来征服中国民众的精神，千方百计地企图在

中国的“每一个山头 and 每一个山谷中都设立起光辉的十字架”。^①传教士倚仗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收买信徒，干涉诉讼，妄图在乡社中树立起基督教的绝对权威。结果适得其反，传教士的所作所为更引起了中国民众的普遍不满，这正如叔本华所言：“信仰犹如爱慕，它不能被强制。任何强制的爱，都必会变成恨。”^②中国民众被压迫与剥削的卑屈，在反帝爱国情感的激励下，渐次汇聚为滚滚洪流，将传教士们吞没。1861—1862年衡州教案的催化剂是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咸丰皇帝避往热河的消息南传。平素饱受教会欺凌的民众本来久已郁积着的满腔怒火，一下子找到了突破口。1900年衡州教案爆发的导火索，则是总堂教士董哲西在八国联军大举侵华的刺激下想要趁火打劫，逼迫江东岸一带劳动人民全部限期迁徙。衡州民众在义和团“顺清灭洋”旗帜的鼓舞下，奋起抵抗教会的倒行逆施。

其次，反洋教斗争中的文化冲突，也是列强侵略的一个必然产物。19世纪特定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当时的西方传教士即使是属于温和与圆通的一派，也无不怀有文化优越的傲岸，实施着超乎寻常的，以摧毁殖民地半殖民地原生文化为宗旨的文化移植。西方传教士这种企图“补救”（更确切地讲是征服）中国文化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教会（主要是天主教会）在其势力所能达到的地区，以强硬而不妥协的姿态挑起了习俗之战，锋芒直指中国人民传统的生活方式，从而将普通民众逼到了要么屈服、要么决裂的境地。如

^①胡维革、郑权《文化冲突与反洋教斗争——中国近代“教案”的文化透视》，21页，《东北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

^②叔本华《意欲与人生之间的痛苦》，117页。

1855年衢州教案中，传教士陆怀仁威逼非教民的女方必须按照天主教的仪式来举行婚礼，从而引发一场民教冲突。诸如此类的教案中表现出来的文化习俗冲突，既不是孤立的，可以和政治背景分开看待的中西文化的“冲撞”，更不是所谓封建文化对西方先进文化的“拒阻”。从本质上讲，它是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在中国乡土文化上引起的激荡，是基督教的文化征服突破了中国民间文化的容纳极限而促成的社会反弹。^①同时也是广大中国民众对于以武力为后盾的西方文明挑战所作出反应。中国民众通过传统习俗来达到反洋教的目的，在某些学者看来，似乎是张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消极成分，是愚昧落后的象征。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低估它们的反洋教斗争中的历史作用。马克思对印度的论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如果指望印度具有欧洲革命的特征，那将是可笑的误解。”^②清末，中国这个与世隔绝甚久的封建大帝国，面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坚船利炮与基督的联合进攻而别无选择，只好拿起传统的武器去对付强大的野心勃勃的西方列强，借以救亡图存，因此，其局限性与落后性是在所难免的。在这些教案上，我们找到了近代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的爱国主义和文化上的卫道精神。它也在给我们敲响警钟：民族文化必须面向时代、面向世界而代有更新，只有这样，一个民族才会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① 程淑、张鸣《晚清教案中的习俗冲突》，100页，《历史档案》1996年第4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285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民族存亡的搏斗

——中国人民抗击八国联军侵华百年祭

庄建平

光阴荏苒，岁月流逝，历史永远地过去了，但是，历史也永恒地存在着，它在当代人的血脉中流淌，令人无法忘却那些血与火、生与死交织的日子。为了今日的国泰民安与明日的更加灿烂辉煌，让我们走进历史，翻开中国军民抗击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领土上的一页，去领略那英勇悲壮的一幕。

—

1900年，中国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反对帝

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民族运动，它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呢？这是由当时的中国国情和世界局势所决定的。

自 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已由“机会均等”地争夺沿海港口改变为以武力来划分“势力范围”。他们竞相鲸吞在华更大利权，欲把中国推向殖民地的深渊。在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德国和俄国最先伸出魔爪。1897 年 11 月，德国藉口巨野教案而启衅，悍然派兵强占胶澳，继而又攫取山东利益。这一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强盗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恨。强占胶州湾事件发生以后，产生了连锁反应，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效尤。相继发生俄国攘夺旅顺、大连、北满以及内外蒙之路矿权和行政统治权；英国占据威海、九龙，划长江流域为势力范围；日本侵占台湾，划福建为势力范围；法国窃取广州湾，划桂、滇、粤为势力范围；意大利调集兵舰，图谋浙江三门湾登州庙岛等地的事件。从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渗透到中国的内陆和边陲地区，所谓的“势力范围”，实际已成为帝国主义列强所控制的领地。在中国掀起反瓜分民族运动前夕，帝国主义要求正式瓜分中国的野心膨胀，肆意宰割中国的形势继续恶化。不少爱国志士已预感到亡国的危险，他们愤慨地说：“假令各国之兵皆如此横行于我之内地，而莫敢谁何，我将何以立国耶！”1899 年 12 月 22 日，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在《支那现势地图跋》一文中写道：“感慨风云，悲愤时局，忧山河之破碎，惧种族之沦亡”，发出了“阴平穷寇非难御，如此江山坐付人”的沉痛叹息。

在武力征服的前提下，帝国主义列强又加紧进行经济和文化侵略，从帝国主义列强对华资本输出来看，这时的中国实际上已经

变成了他们的金融资本的附庸。由于贸易逆差，造成白银大量外流，国内银贵钱贱的情况更为严重。根据一项统计，清政府的外债从 1864 年—1894 年为 4000 万两，从 1895 年—1899 年则高达 37000 万两，而清政府的每年的收入只有 7500—8000 万两。这样外债剧增，整个清政府的一年财政收入只够支付借款的利息。这样，中国的经济命脉也就完全掌握在帝国主义列强的金融资本家手中。从 1895 年起至 1898 年 11 月止，英、俄、德、比、法、美诸列强，又在中国掠夺了长达 6420 英里的铁路投资权。其中，英国为 2800 英里，俄国为 1530 英里，德国为 720 英里，比利时为 650 英里，法国为 420 英里，美国为 300 英里。已经修成的几千英里铁路，名义上虽然归清政府管理，而实际上完全是由帝国主义列强把持和操纵。此外，诸如中国的海关、邮政、内河航运等，也操纵在帝国主义列强手中。铁路、航运所到之处，即列强势力所及之区。总之，在这个时期中，帝国主义列强之间许多关于中国的协定和通牒，根本不通过清朝政府，都是采用协商的方式来解决相互之间的纷争。等到列强的纷争基本解决之日，也就是中国面临着正式瓜分之时。

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下，全国经济发生动荡，不但影响城市，而且深入到广大农村，而华北受到的冲击更为严重。从 1895 年起至 1900 年，京津、京奉、芦汉、芦保、保正几段铁路相继修成后，“因铁路工役多属教民”，也因陈旧的交通工具被搁置，造成大批人员失业。那些水陆运输工人也因黄河、运河航运被帝国主义所控制，而无计谋生。至义和团运动前夕，失业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水陆运输工人、驿夫等已达数百万人。山东运河沿岸的城镇也是一片

凋敝情景，如聊城由原来“水陆云集”的景况，而变成“地面萧疏，两商俱各歇业，本地人之谋生为倍艰矣”。华北地区是我国主要的棉花产区，在洋纱棉纱布的冲击下，农村手工业纷纷破产。如山东陵县自纺自织的白粗布“销路顿形滞涩，渐至断绝”，“全县手工业无形破产。农民经济影响甚巨”。平度县“至种棉者亦锐减”。陵县和平度县农民及手工业者的破产情况，正是华北广大农村经济萧条的真实写照。清朝官员薛福成也在《强邻环伺谨陈愚计疏》中指出，洋纱洋棉入内地，使“中国之机妇机女，束手受困者，奚啻千百万人”。以上仅是华北农村状况，中国其他地区也是如此。这就造成了中国人民的自下而上危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朽，给千百万劳动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势必引起愤怒和反抗。因此，义和团运动首先在山东、河北两省发源，迅速在华北得到广泛响应，是决非偶然的。而丧失生计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成为义和团运动的基本成员和热情赞助者，则更属必然。据记载，仅顺天府所属州县的穷民、失车船店脚之利及受铁路之害者，风闻而起则约有四万余人。

众所周知，掠夺者和传教者是携手同进的。武力征服和宗教渗透都是帝国主义列强推行殖民政策的重要手段。自 1860 年以来，外国传教士依恃本国政府的炮舰政策，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打着传播所谓“福音”、“文明”的旗帜，成批的涌进中国，足迹遍布通都大邑和穷乡僻壤。传教士们拟议要在中国的十八省“每一个山头 and 每一个山谷中都设立光辉的十字架”，要用“基督教占领中国”。铁铸的事实充分说明，“紧跟在军队后面”，蜂拥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决不是“真正的基督教”的传教士，而是以传教为名的侵略

者。到 19 世纪 90 年代，在华的欧美诸国的天主教、耶稣教以及俄国的东正教教士有 3200 多人。仅山东 72 个州县就有各种教堂 1100 余处，传教士 300 多人。其中济南府属教堂有 60 余所，禹城县境内仅美国耶稣教堂就有 17 所，长清县境内也有美国教堂 17 所。当时，教堂和教士利用抵还教堂财产，就以圈占公私山亩，逼买民房田产等手段，霸占了大量土地和房产。如山东济宁教堂就拥有 15 顷土地。甚者一个教堂拥有上万亩土地。教堂掠夺土地后，“既不过割，又不输粮”，把田赋转嫁到农民头上，并采用封建的剥削方式。福森科在《瓜分中国的斗争与美国门户开放政策》一文中指出：“用苛刻的条件出租给附近农民，几乎和中国封建主一模一样”。在帝国主义压力下，清政府竭力保护教堂和教士的利益，使他们享有许多特权。教士俨然以地方行政长官自居，命令各地方官服从教堂的旨意。此外教堂还拥有武器，如山东武城县禀报：十二里庄教堂“准备枪炮，以备不虞。该教堂有……十三响洋枪三十余杆，又单响洋枪九十余杆，有事则分与教民，无事则存教堂。又有架炮十余尊，支架在教堂屋顶上”。其他教堂也置备武器弹药，仅数量多寡不等而已。“直如一国之中，有无数自专自主之敌国者”。由此以观，教堂不仅是帝国主义进行经济、文化侵略的反动堡垒，而且也是反动武装的巢穴。

教堂为扩张侵略势力，竭力网罗教民。教民的入教动机十分复杂，不能一概加以否定。教民大致可分投教者、吃教者、信教者和被逼入教者等四类，但在这四类教民中的前二类内，确实有许多人是恶霸、劣绅、讼棍、兵痞、强盗、亡命之徒，或是地方封建势力的实力派，或是向民间进行巧取豪夺者。罗德克夫称：“教士们袋子

里藏着大批的金钱，收买中国人民中间的无赖分子，来者不拒，总是临时的或经常的发给金钱。”美国传教士爱利乌德也供认：“中国人民中的恶霸分子看到每一个传教士，是有力的保护人，每一座外国教堂是得救的岩石。”由传教士和披上教民外衣的恶霸劣绅等结合成一体，形成了中国社会中的一个混合怪胎——洋恶霸，既有帝国主义的残暴性，又有封建地主的贪婪性，“作奸犯科，无所不至”，横侵人产，讹诈钱物，欺侮孤弱，强占妻女，包揽词讼，残害无辜，种种妄为，儿难尽述。到 19 世纪末，全国有教民 380 余万人。仅山东一省就有 8 万多人，山西太原县列入保甲册的教民有一万余人。这就形成了一个以教堂为中心，以教民中的一些不良分子为骨干，竭力维护殖民政策和封建秩序两者兼而有之的社会基础。从社会的经济角度来看，义和团“闹教”，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不是反对洋教本身，同时也还具有反对洋恶霸采用封建方式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内容。

清政府只知搜刮人民，对洋恶霸的妄为不仅不加干涉，反而抱住“怀柔远人，辑睦邦交”的媚外政策不放，凡遇民教争讼，“因慑于外人气焰”，“官畏教士如虎，多袒教而抑民”，甚至“见教民二字，往往徇情偏袒，不为秉公讯断”，致使“平民饮恨吞声，教民愈志得意满”。时人指出：地方官畏之愈甚，则教之欺民愈甚，民之入教者亦愈甚；抑之愈深，则民之怨教愈深，而祸之积者亦愈深。传教士入内地传教，不准干预民间词讼的规定载在条约之内，但事实正与此相反。《筹笔偶存》有这样的记载：“查东省现在教民极为横肆，动辄以微嫌细故凌轹于乡党之中。偶不遂其履求，即以抢夺攻击等情以耸教士之听。教士不察虚实，率然达于公使。公使复率然达

于督抚。一经查办，凡教民原报之案其情形毫不相关，询之则能证实者往往什不其二三。诬枉习为固然，仇隙因而愈结。”袁世凯也承认：“遇有交涉案件，但凭教民一诉或教民一言，即签派传人，纵役勒索。到案后又不分曲直，往往抑制良民，希图易结。而教民转得借官吏之势力，肆其欺凌，农民上诉亦难伸理，积怨成仇，有由然也。”光绪 23 年（1897 年），山东蒙阴县有德国教士名佛尔璞，因劝该县龙峪绅民董文明入教被拒绝，就此结怨，竟屡次借故要求地方官将董详革审押，又指使入教之刁民葛振卿控诈其财。为此，连袁世凯也觉得太过分，遂批驳说：“查教士入内地传教，并不准干预民间词讼。……即如此案，传教士挟董文明以不肯入教之嫌，遂致屡次借故函请地方官详革审押。……葛振卿刁顽之人，反得收入教内，又得代赎地亩，交山教堂收执，其恃教诈财，亦非无据。地方官甘受教士指挥，责押平民，不问案情曲直是非，但凭教士私函便可定讞。于吏治民生，大有妨碍。”洋教士对绅民尚且如此，对普通百姓之横暴就更可想见。山东如此，河北也不例外。《竹素园丛谈》说：“直隶数十州县人民平时受教民欺侮，地方官慑于外人气焰，凡民教涉讼，平民每不得直，积怨日深，以故拳匪一声呼啸，风靡全省。”以上虽然是山东、直隶两省的情况，但有其代表性。由于“民气遏抑太甚，积不能忍，以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忿”，因此各地相继发生反教斗争。关于起衅缘由，毓贤称：“平民之为教民欺侮，因而损失财物、讹诈钱财、毁家赔累、株累致死者，盖不知凡几。今日之祸，皆办理教案之不持平者有以激而成之也。”广大农民直接深受洋恶霸的沉重剥削和压迫，到义和团运动时期，人民积四十年之怨愤，终于一发不可遏止，向洋恶霸进行坚决的斗争。

据统计，从鸦片战争后一直到义和团运动期间，由于传教士引起的大小教案 400 余起，大部分是集中在 19 世纪最后 30 年，其中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爆发的重大教案，如青浦教案、天津教案、延平教案、邻水江北教案、建平教案、济南教案、呼兰教案、重庆教案、大足教案、武穴教案、南昌教案、麻城教案等等，这些教案的起因大都是传教士横行乡里，凌虐百姓、霸占田产、拐迷人口、包揽词讼、草菅人命、奸淫拷掠、无恶不作而引起的。事实胜于诡辩，也是最好的见证。以上事实证明教会和不法传教士的恶迹，这是历时最长，分布最广，次数也是最多的教案发生的根本原因。当时称为“教案”，后来称为反洋教运动。

从 19 世纪 90 年代前夕的国际形势、金融资本的侵入、教会势力的扩张、列强重兵压境以及清政府军事力量的孱弱等五个方面来看，帝国主义列强为掠夺中国利权而加紧酝酿中的第三次瓜分中国领土的危机，比起 1894 年至 1895 年甲午战争前后的第一次瓜分危机，以及 1897 年底至 1898 年的第二次瓜分危机，来得更加严重和凶险。如果第三次瓜分危机一经实现，中华大地、神州古国也就立即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

自甲午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对瓜分的爱国主义精神可以说是遍及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甚至在清政府的部分文武官员中，也不乏主张抵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瓜分的爱国人士。当时最能显示力量的有二个群体：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康有为领导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和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的反洋教力量。谁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呢？以革命派而论，他们多次起义失败，在国内受到监视和镇压，只能在世界各地华侨中唤醒爱国热

忧，在国内则不可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以维新派而论，因戊戌维新运动遭到了清政府的镇压而失败，也处于低潮。在革命派和维新派相继镇压之后，在中国形势瞬息万变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着手将如何正式瓜分中国付诸实施之际，能够同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抗争的唯有以中国农民为主体的反洋教运动力量。虽然清政府曾经遵照帝国主义列强的旨意，对各地反洋教运动进行压制和镇压，其结果不仅未能奏效，反而激起了民众更加强烈的反抗。骄横的帝国主义列强决定直接派兵到中国进行镇压。外国军队大举侵入中国，不仅促使中国人民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侵略者，就是一贯惧外的清政府也不得不为维护自己的统治权利而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反抗，暂时停止对反洋教运动的镇压，并给予合法的地位，合作抗敌。由于义和团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各地反帝爱国力量总汇在义和团的旗帜下，进行保家卫国的斗争。

自甲午战争以来，中国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斗争，从来也没有在列强势力集中的北京和天津等地直接展开。因此列强对其严重性重视不够，一直认为“可安然瓜分这个民族国家”。待到 1900 年中国民众抗争斗争在京畿地区掀起高潮，帝国主义列强在调动兵源上一时陷于被动。1900 年 5 月 31 日，护馆洋兵既来中国并进入北京城，深入堂奥。中国民众认为，洋兵在中国领土上的出现，意味着瓜分中国的战争的开始。于是中国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瓜分的中国民族运动，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并且迅速发展，很快由河北、山东蔓延到北方几个省和东北地区，并且波及到南方诸省。

二

1900年6月6日,英、美、法、德、日、意、俄、奥各国军舰指挥官在英舰“百人长”号上举行军事会议,决定八国采取一致行动,组成联军,加紧侵犯中国的军事准备。6月10日,英国将军西摩尔率领的侵略军全副武装,从天津强行西进,企图进入北京。北京是清王朝的国都,是中国的象征,从某种意义上讲,占领首都北京就意味着对全国的占领和瓜分,“能够改变历史”的进程。以对北京进行武装占领为目的的西摩尔联军于6月10日,进至廊坊,立即遭到中国民众的狙击。在连续几日中国民众与八国联军的浴血战中,迫使西摩尔于19日仓皇逃窜,直到6月26日才撤退至天津租界。

八国联军于7月14日占领天津。8月4日八国联军约18000人由天津出发,进犯北京,14日晚北京城被攻破。从此开始,这场侵华战火也就从京津两地扩大到河北、山西、山东及东北诸省。在八国联军烧杀淫掠之下,这些地区的人民蒙受了极大的灾难。对于这些事实,连侵略军统帅瓦德西也供认不讳:从大沽经过天津直到北京之路线上,“凡军队行经之路,但见其一片凄凉荒废而已。至少当有五十万人变成无屋可居,散处于附近之地。”由通州至北京城下,“只是一片荒凉毁掠之景而已,沿途房屋未经被毁者极为罕见,大都早已成为瓦砾场”。在北京,八国联军疯狂地屠杀爱国军民,仅庄王府一处,就被屠杀和烧死1700多人。“皇城之内,杀戮更惨,逢人即发枪毙之,常有十数人一户者,拉出以连环枪杀之,

以致横死满地，弃物塞途，人皆踏尸而行。”皇城以外地区的情况更为惨酷，“百家之中，所全不过十室”，街巷“尸首堆积如山”。在河北、山东、山西诸省，据史籍记载，“南至正定，北至张家口，东至山海关，均在联军势力圈内，往来逡巡，足迹踏遍。凡拳匪巢穴，无论官衙民居，遇则焚毁，往往全村遭劫。”在东北地区，俄国军队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大惨案，他们还洗劫黑河屯、火烧瑛珥城，屠戮哈尔滨。时人记载说：黑河屯经俄军屠杀焚烧后，无论哪里都看不到一个中国村民，也看不到中国房子。这个富庶的边陲重镇，顷刻之间变成了一片废墟。

八国联军在屠杀中国人民的同时，还大肆洗劫中国珍贵文物。这些珍贵文物都是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象征和体现。因此，这亦必然成为八国联军在战争中进行破坏和掠夺的目标。八国联军对北京的洗劫是中外历史上罕见的。北京城中，特别是紫禁城内各宫殿，积聚大量的前朝及有清一代的稀世文物、珍本图籍和金玉艺术品，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各国侵略者“眼热宫城似宝山，先鞭争欲夺标还”。为了抢先进入皇宫，日军与俄军乃相争相忌，不欲他人占先，还引起了相互争斗的事端。在公开抢劫的日子里，各国驻京公使、各级军官和传教士也无一例外地参与了抢劫活动。从皇宫、颐和园、三海、坛庙、陵寝、王公府第、各部衙署甚至民居店肆，都无一例外地遭到掳掠。侵略者把堆满历朝宝物的宫殿陈设盗抢一空，抢走库银 6000 万两，瓜分观象台古代天文仪器，焚毁仪奎殿，劫掠《永乐大典》等珍籍法物。经此浩劫，北京积聚的大部分法物图籍、奇珍异宝为侵略者所攫取，辗转劫持到国外。在八国联军烧杀淫掠下，北京城“已失数百年来巍负之美观，旧迹留

者，仅一二也”，“现在可只是一片罗列着萧条残物的荒野”。连侵略者也供认：“北京今已成为‘强盗世界’”。

三

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追求在华的利益，始则采用坚船利炮，继则采用血腥屠杀，镇压中国民众。这些凶残狡诈的行径，不仅没有威慑住中国民众，反而促使反侵略的斗争更加高涨起来。凡八国联军所到之处，均遭到各地民众的抗击。

在八国联军侵华之初的 6 月 14 日至 18 日，在廊坊地区，西摩尔侵略军遭到中国军民的迎头痛击，节节败退，不得不撤回天津。6 月 17 日，八国联军进攻大沽炮台，守台爱国官兵殊死抵抗，捐躯沙场。在廊坊和大沽炮台殊死之战中，仅有刀矛等原始武器而又缺乏组织的中国民众，阻挡不了拥有先进装备而组织严密的八国联军，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中国军民在八国联军的枪林弹雨之下，并没有畏惧屈服，而以血肉之躯与侵略军搏斗，发扬了革命英雄主义，也显示出中国民众中蕴藏着反侵略的伟大潜力。开战之初，侵略军就遭到沉重打击，迫使联军的统帅们在占领大沽口炮台的第三天，不得不改变对中国时局的认识，发表了《大沽宣言》，其中重要一点就在于消除中国民众对瓜分的疑虑。斯时，不是帝国主义列强不想正式瓜分中国，而是因为在军事上受到重创，所以势则不能，这是根本之点。7 月 3 日，即《大沽宣言》发布后不到二个星期，美国发表了《海约翰通牒》，向列强正式声明“保持中国领土与行政实体”，不瓜分中国的对华政策。德、俄、法等列强也相

继提出保持中华帝国的完整。由此可见，中国民众的反抗斗争，缓解了瓜分危机。

天津民众和清军爱国官兵从 6 月 17 日大沽炮台夺占开始，立即展开抗击八国联军、保卫天津城的激烈战斗。其中重大战役有三处，一是天津城南的八里台，一是海河东岸的老龙头火车站，一是河西紫竹林租界。天津的激战使八国联军不止一次地想撤退到大沽。联军在天津“战既无功，退亦为难，每日丧失，动辄不可以数计。迨至奋力进攻一次，华兵抵御亦极坚，联军总数不过八千，竟伤亡九百。连日天气极热，又无水取而御渴，但借干粮以度饥……不过联军退去后，扬子江两广一带，又从此多事耳。”可见，天津的保卫战事关全国形势的发展，中国军民的坚决抵抗阻挡了侵略者的进一步行动。

此外，山东、河北民众，装载干粮，秩序井然，赴津作战，阻止西摩尔率领的联军进犯北京。霸州民众列仗抵抗德兵，战死者 300 余人。牛庄民众手执刀矛攻击洋兵据点，蓟县人民在青山岭伏击德兵。天津东南各庄村民“十分勇敢，先是坚守阵地，后来进行肉搏战”，牺牲 400 余人。再如束鹿县旧城民众，人自为战，徒手相搏，奋不欲生，牺牲 4000 余人。在八国联军进犯保定、唐山、秦皇岛、易州、滦县、遵化、迁安、宣化、张家口，以及南皮、盐山、庆云、吴桥、沧州、青县时，均都遭到当地民众坚决抵抗，表现了中国民众英勇反帝的大无畏精神。

正当帝国主义妄诬这场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民族运动为“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的时候，列宁在《中国的战争》一文中热情讴歌义和团是“中国的起义者”；德国

《前进报》社论称赞义和团是“铁拳”。又如《柏林民报》说：“现在中国之事，可见中国人决不甘心各国瓜分……外国人至中国，无非吮华民之心，食华民之肉，此系神人共愤之事。”再如奥国报纸说：“近日中国北方之事，实因欧洲各国往往无理干预，且有意蚕食中国疆土……以脱去洋人制压之痛哉。”等等。综上所述，都认为中国民众的抗争运动是由于决不甘心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而起，乃是“民族精神的觉醒”。尽管在当时并没有也不可能寻找到一条正确的救国道路，但却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力量，遂迫使帝国主义列强由瓜分中国的政策改变为“以华制华”的政策。

综上所述，在 1900 年前夕，中国是一个已经濒临于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而尚未被瓜分的国家。由于清王朝已向腐朽没落的下坡路滑行，无法挽救中国被瓜分的命运。但是中国民众的革命行动却打乱了帝国主义列强既定的部署，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对华实行正式瓜分的迷梦。

传教士与山东义和团的爆发

陈月清

2000 年是第一次鸦片战争 160 周年，是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的 100 周年，当我们回忆起殖民强盗对中华民族侵略罪行时，是无比愤慨的。10 月 1 日梵蒂冈的罗马教廷公然把在中国犯下丑恶罪行的一些外国传教士及其追随者册封为“圣人”，这是对 12 亿中国人民的污辱和蔑视，是公开干涉我国内政的反华活动，也是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翻案，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和中华民族的尊严。但今天的中国已不是 100 多年前那个积贫积弱、任人欺凌的中国，梵

蒂冈的阴谋不会得逞。中国要统一、中国要发展，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我们有确凿的历史史实揭穿自鸦片战争以来，披着宗教外衣的传教士的伪装，露出他们侵略者的狰狞面目。下面我们仅就 19 世纪末传教士在山东的罪行来驳斥梵蒂冈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美化侵华传教士的严重挑衅。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首先兴起于山东，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极其复杂、深远的因素。甲午战争后，备受日军蹂躏的山东人民，在帝国主义阴谋瓜分中国的狂潮中首当其冲。列强疯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清政府的无情搜刮，连年不断的天灾人祸，已逐渐把人民逼到死亡线上。特别是洋教猖獗，教案频繁，地方官又不能秉公持平办理，进一步加剧了本已十分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使苦不堪言的广大群众义愤的怒火愈燃愈烈。

但山东义和团的斗争不是开始于帝国主义军事、经济势力庞大的山东半岛沿海各地，而是开始于帝国主义还没有大规模渗透的鲁西南和鲁西北地区；并且自始至终以反对外国教会为主要形式。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外国教会的入侵、洋教士作为山东社会的一种罪恶势力的存在，是促使山东义和团运动爆发的主要原因之

在中国近代，西方基督教的传入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同步进行，其规模之大、教派之多都是以往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的。殖民主义者纷纷把宗教作为他们推行侵略政策的有力工具和开路者，用传教士来实现其军事、政治和经济侵略的目的。传教士在中国凭借着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特权的保障，以及受到“自

1842 年以来就络绎不绝的外国军舰的赤裸裸的武力”的支持^①。他们已成为近代中国社会中一股特殊的势力。传教士们扬言，要在中国“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都设立起光辉的十字架”^②。在华进行宗教渗透。19 世纪末，在中国的欧美天主教、基督教、沙俄东正教等外籍传教士共有 3200 多人。据《中华归主》一书记载，截至 1900 年，山东全省 108 个州县中，已有 72 个州县有基督教会的活动，设立总堂达 27 所。山东的天主教、基督教设有教堂“共大小一千三百余处，教士一百五十余入，各洋人文牒、函电儿无日无之”^③。19 世纪末，天主教在山东分为北境、南境、东境三个教区。北境总堂设在济南，南境总堂设在兖州，东境总堂设在烟台。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到处都是传教士的足迹，遍布着帝国主义的侵略据点。这样一支庞大的教会侵略势力，积极为西方殖民主义服务，自然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外国传教士在山东各地的罪恶行径，促发了反洋教斗争的开展。

传教士在列强争夺中国势力范围的斗争中，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天主教圣言会的传教士安治泰为德国占领胶州湾竭尽全力。他搜集情报、出谋划策、制造舆论、物色基地、挑选时机、制造借口等无所不为。天主教圣言会及安治泰的劣迹和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强占胶州湾，激起群众的无比愤慨，它们直接引发了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①丹特：《美国人在东亚》。

② 1868 年葡公使团在纽约发言，见张力等编纂《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年版，第 325 页。

③ 《养力园奏议》（本刊本），卷 4。

山东原是受法国保护的天主教方济各会的教区，德国在荷兰史泰勒成立了圣言会。1879年派安治泰和福若瑟两名教士来华传教。安治泰在香港学习中国语文将近一年，就搭船前来烟台。这位“干练、伶俐、狡猾”的传教士，利用途经上海的机会，拜见了德国总领事，提出“有在中国成立一个规模较大的德国天主教的意图”^①。安治泰怀有为德国扩张势力的极大野心，在分得山东省南部曹州、济宁直隶州、兖州及沂州及其所属各县为圣言会教区以后，力图摆脱法国的保护而归附德国。此举于1891年终于得到罗马教皇的批准。安治泰在19世纪80年代获得圣言会主教教职后，一面招致大批德籍教士来山东，一面又不择手段地吸收地痞恶棍入教来扩大圣言会在山东的势力。圣言会归德国保护后，安治泰通过德国使馆向清政府要求官阶，1893年他得到了三品顶戴，第二年又获得二品顶戴^②，与中国总督、巡抚平行。

作为德国政府的忠实奴仆，安治泰对德国政府侵华野心十分清楚。他早在1896年就怂恿德国瓜分中国。他“激烈地要求政府为教会的利益做一次有力的行动”^③。他利用教士云游四方之便，多方收集情报、查勘地形、了解政情民情，积极为德国统治集团侵华出谋划策。德皇威廉二世说：“在华的天主教会，无时不受到我的支持。安治泰主教回到柏林，时常作我的座上客，他以中国的各项重要事情报告我。”^④1897年安治泰曾向德国政府“中说占领胶

① 施云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第298页。

② 《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575页。

③ 《德国外交部档案》第14卷，转引自《义和团运动史论丛》，第131页。

④ 《义和团运动史论丛》第130页。

州是个重要关键的问题，不但有关在华教会的发展，而且有关教会的存亡”^①。1897年11月巨野教案发生时，安治泰正在荷兰史泰勒，他闻讯后立即来到柏林，要求德国外交部乘机夺取胶州湾，他说：“我们现在应该利用机会占据胶州，它对我们在各方面是个最好的、最能发展的据点”。他还觐见德皇威廉二世，强调胶州湾有比上海更大的发展前途，巨野事件是德意志帝国在东亚取得属地的机会。占领胶州湾“不会使东方任何人惊异，因为一切人早已料到这件事”^②。从1895年起德国就企图夺占中国沿海一个港口作为侵华基地，但没有选定合适地点。安治泰的意见对威廉起了很大的作用。当他了解到胶州湾内有安全的停泊地，附近有煤田，气候良好宜于欧洲人居住等条件后，于是在11月底召开会议，作出用武力夺取胶州湾的决定。安治泰在觐见德皇的同时，又写信给德国外交部，拟就了巨野教案要求中国政府赔偿德国的条款三款：1、赔偿我们遭破坏的和被抢走的全部损失；2、偿还由于这个事件所产生的一切支出；3、在欧洲建筑师的领导下，建两座教堂，它们应该像济宁正在建造的教堂那样大。每个教堂都应挂有中国皇帝题词“敕建天主堂”；“以受切实保护，绝不允许再遭破坏”^③。这些条款成为1898年3月6日清政府同德国政府签订的关于巨野教案协议的蓝本。德国政府借口巨野教案强占了胶州湾。在整个过程中，安治泰起了急先锋的罪恶作用。为此他得到了德皇威廉二世和巴伐利亚摄政王路易得保德很高的评价和嘉奖，甚至得到巴

①阿耳尔：《中国的扰乱》第83页，转引自《义和团运动史论丛》第131页。

②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择》，第1卷，第154页。

③ R. Hartwich, *steiner Missionary in China 1879-1903* 年第330页。

伐利亚王室封给他贵族的称号。这正暴露了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传教士是疯狂瓜分中国领土的帝国主义分子。已故的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邵循正认为圣言会主教安治泰是“山东的太上皇、压迫人民的恶霸，造成胶澳事件的罪魁”^①。这是对安治泰狰狞而目的真实写照。

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山东驻有德国军事力量。因此传教士可以直接请求驻青岛的守军，镇压山东人民的反抗。安治泰承认，德国占领胶州湾是山东人民反教斗争显著增多的“第一个主要原因”^②。由此可见，它无疑是反教斗争的动员令。

传教士插手中国官场，干涉中国内政在 19 世纪末的中国已是司空见惯，在山东也不例外，甚至更为突出。安治泰捞得二品顶戴后，和督抚平起平坐，对总理衙门办事大臣视为书吏，对地方官吏以上司自居，公然命令山东各级地方官服从教堂指示。圣言会的不少传教士经常挟持官府，欺压人民。1899 年 3 月 4 日，清政府在传教士的压力下，为迎合列强的旨意，竟然拟定《地方官接待教士章程》，正式规定“总主教或主教其品位既与督、抚同，应准其请见督抚。……即督抚司道府厅州县各官亦按照品秩以礼相答”^③。根据这个章程，传教士在品秩上与清政府官员分别同级，这显然是助长了传教士的嚣张气焰，抬高了他们的身价。许多教堂还建立反动武装。如武城十二里庄、禹城韩庄、平阴白云峪等教堂均拥有

^① 邵循正：《19 世纪帝国主义在华天主教保护权的争夺》，载于《光明日报》1951 年 7 月 10 日。

^② J. Heeren: *On The Shantung Front*, 第 110 页。

^③ 王彦威转：《清季外交史料》第 137 卷，第 6 页。

快枪百余杆，其中有的还私藏大炮^①。东昌府有一百二十座教堂“自购军械”^②。外国传教士也不断包揽词讼，甚至私设刑庭，欺压百姓。如山东省汶上县教民在外国传教士指使下，“聚百余人捆绑平民，口称拿获红拳会，擅送济宁教堂，并有毆人勒索情事”^③。在处理教民案件的过程中，地方官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往往“袒教抑民”，以致造成普遍的“民冤不伸”和教民“理屈者不以为屈，杀人者亦不抵罪”的局面^④。传教士也强行摊派差役，“需索骚扰，片纸下乡，中业倾产”^⑤。他们又擅自收税，“山东州(邹)县西南乡教堂教士向商贾收税，苛虐异常”^⑥。传教士“至必官为护送，马夫支应，恒取于民”^⑦。传教士还勾结和扶植地主恶霸势力，以便共同鱼肉人民。如山东清平县，有左、王两族大地主，钱粮占全县之半，他们加入天主教后，不缴漕征，高利剥削平民，“官以奉教也，亦无奈之何”^⑧。

外国传教士还参与对山东人民的经济掠夺。他们强占人民的土地房屋。如 1861 年天主教教士江罗思在济南假造地契，霸占十三亩六分土地和民房三百多间，强修教堂。外国传教士们“在其道站所在地区购置田地，然后用苛刻的条件出租给附近农民，几乎和

① 《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折》，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

② 佐原笃介：《拳匪记事》。

③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

④ 《皇朝政典类纂》第 490 卷，第 9 页。

⑤ 《泰安府禀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十日到》《泰安府属剿办拳匪卷》。

⑥ 《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4 册，第 3929 页。

⑦ 《兰山县王小斋与孙蕙生书》。

⑧ 《义和团拳始乱记》，《西巡大事本末记》，卷 2。

中国封建主一模一样。^① 外国传教士还从事商业投机活动，甚至放高利贷盘剥人民。如郯县神山教堂，德国传教士戈巴德和布忍溥勾结起来，囤积大批粮食，乘粮价高时牟取暴利”^②。滕县美籍传教士放高利贷给贫苦农民，进行剥削。美国传教士郭显德在烟台市玉皇顶一带买田数十亩，“建造工厂，栽种果林”。另一传教士马茂兰在烟台设马兰公司，经营花边、发网、绒线、印刷、西药等，对中国输出资本。当时有人说：“自有花边工业以来，教会大富。”^③

干尽坏事的圣言会主教安治泰对中国人民欠下的血债是抵赖不掉的。传教士们在山东的种种罪恶行径，中国人民也是不会忘记的。正是他们的罪行，使山东人民亲眼看到和感受到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狰狞面目。于是反教会斗争就成为当时山东人民自发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要斗争形式，在此基础上，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了。

① 福森科著：《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

② 《山东省志资料》1960年第2号第96页。

③ 连警斋：《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附《山东长老会概况》第276、275页。

“庚子教难”初探

李 志

一百年前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它粉碎了帝国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其所表现的爱国热情至今仍激励着人们去反对外来的侵略。西方殖民者与教会却因部分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在义和团运动中失去性命，而把它说成是“庚子教难”对那些死去的教士、教民大加褒赏、追封为“殉道真福”，那么所谓的“庚子教难”是怎么一回事，其本质又是什么？这就是本文要探讨和回答的问题。

“庚子教难”爆发的历史背景

义和团运动实际上是一次全国性的反洋教、反侵略的斗争，是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反抗教会压迫怒火的总爆发。它与 17 世纪发生的震惊中外的大教案——“礼仪之争”具有同样深远的历史意义，却具有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性质。

“礼仪之争”时期的中国正处于康雍朝的盛世年代，堪称当时世界一大强国，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威望。当时来华的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必须经得地方官，甚至当朝皇帝的批准，才能在指定地点传教，他们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服从中国的律令。可以说，一切主动权都操纵在中国手中。当时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南怀仁等为传播福音，吸收教徒，穿儒服，讲汉语，学习中国的礼乐习俗，尊重中国崇孔祭祖的传统，受到了当朝政府的礼遇和厚待。因而，对于基督教，中国政府是能够而且可以采取包涵优容的态度的。但是，当罗马教廷和来华的部分传教士为着基督信仰的惟一性而执意做出禁止祭祀祭祖，禁止祭孔敬孔、禁止立生祠和敬城隍等诸多禁令时，立即遭到中国康熙帝的不满与反对，甚至不惜为维护中国的传统习俗和对国内居民的完整治理权而与罗马教廷针锋相对。从而进入中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禁教时期。在中国皇帝看来，祭祖敬孔是维系中华文化遗产和社会秩序的主要标志，具有强烈的政治社会意义和非宗教属性，不应将其与宗教问题联系起来。因此，他们的禁教政令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基督教对中国的入侵，维护了国家主权的统一和社会秩序的安定。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当传教士再度踏上中国领土的时候，昔年如日中天的大清帝国已经到了腐朽没落的时期，而此时的传教士亦不如利玛窦、南怀仁他们单枪匹马、闯过重重关口才能拿到来华传教的绿卡，而是在帝国列强尖船利炮的庇护下如潮水般地涌入中国，最初在五口通商口岸，而且还局限在城内，随着咸丰八年（1858年）《天津条约》的签订，中国完全解除了禁教政令，传教士的活动范围亦随之遍及全国各地的穷乡僻壤。

由于他们是在帝国主义枪炮舰船的掩护下进入中国的，因而构成了中国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群体。根据中国与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传教士享有种种特权。其一即“领事裁判权”^①，其行为不但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而且还可得到领事的保护。咸丰十年（1860年）《中法续增条约》第六款中“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②的规定又赋予了教士内地置产权。出于职业的本能，他们还“向传统文化发起了革命性挑战”，^③迫使清政府于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八日颁布圣旨，“凡基督教徒均可免除迎神赛会等费”^④。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总署又应教会的要求颁布了地方官接待主教、教士的事宜五条：“第一，总主教或主教，品

^① 参见 1843 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第十三款；1844 年《中美贸易章程》，1869 年《中英增订通商条约》第九款，1876 年《中英烟台条约》第二款第二段；1880 年《中美续约》附立条款第四款。

^②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年版，147 页。

^③（美）柯文：《中国与基督教，1860—1870 年传教运动与中国的排外暴动》哈佛人学出版，1963 年版，第一章。

^④ 转引自（德）狄德满《基督教、帝国主义与清末义和团运动的兴起》，载《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 1992 年版。

位与督抚相同，摄位司铎、大司铎与司道同级。司铎与府厅州县同级。第二，分别教中品秩与同级官吏相往来。第三，教案发生时，主教司铎转请护教国公使或领事官，同总署或地方官交涉办理，也可以直接向地主官商办。”^① 传教士因此实际上获得了清政府的品秩。传教士还“经常要求美国军舰开进非通商口岸登州，他们的意思是美国军舰可以光顾登州港，以使当地美国人与中国当局已存的感情永存”^② 甚至一些教堂本身就有武装，如梅尔思对设在江苏北部徐州府的耶稣会据点有这样的描述：“这是一座真正具有战斗力的教堂，建筑物四周建有坚固的设有城堡的城墙，角落有了望塔守卫，塔内架设着枪支，贮存着弹药。”^③ 北京美以美会总堂的“墙上有必要的地方开了枪眼，堡垒的周围掘起了一道深深的壕沟，还设立了双重有倒棘的铁丝网加强防御。凡是看见过的人都认为这所礼拜堂是一座真正的堡垒”。^④

来华的传教士们不但随心所欲地行使种种特权，如“山东传教士有擅称巡抚一事”、^⑤ 山东邹县西南“教士向商贾收税”、^⑥ 有的传教士甚至“擅用关防印信”，发照会“擅由堤塘官驿递送”，^⑦ 保

① 1896年3月28日总署致直隶纳不经额咨文。

② 钱德乐《美国旗舰布鲁克林号》，1887年9月13日，国家档案馆，转引自（德）狄德满前揭文。

③ 梅尔思《北京至上海陆地旅行记》载《英国外交部文件：外交与领事报告》，转引自（德）狄德满前揭文。

④ 《北华捷报》1900年第65卷，671-673页（英文版）

⑤ 1871年总署与各国大臣商办传教条款。

⑥ 1896年总署致直隶纳不经额咨文。

⑦ 转引自徐绪曲《教会、教民和民教冲突——山东义和团运动爆发原因初探》，载《文史哲》1983年第2期。

举官员，请撤地方官。光绪十年（1884年）六月，法国侵略越南，在华传教士竟教唆华籍教民叛国，他们对教民说：“你们奉了天主教，就是我法国人。现在大理教堂来信，我法国兵到福建、越南……叫彼此接应，将来要用你们。”^①而且传教士还利用种种特权，不择手段地吸收教民，以多为能，并把自己享有的特权延伸到中国教民身上。如直隶东南部的耶稣会只有在灾民答应皈依基督教时，才给予救济。在饥荒时，天主教传教团趁机以极低的价格购买土地，随后租给皈依的佃户，这样既可以吸收教徒，又可以增加收入。^②此外，天主教还利用更有效的手段：代表诉讼当事人参与法律过程，但当事人必须皈依天主教，以致于两名传教士被特别任命来挑出并处理辖区内有望胜诉的案件。^③在传教士的诱惑下，一些企图在其他一些非宗教事务中获得传教士保护的人也纷纷入了教，其中包括一些穷人，他们入教“只是为吃教堂供给的馍馍，或用教堂两吊钱”。^④主要还是大批社会渣滓。因为“一旦入教，即可以无所不为耳。犯法者，入教可以逃刑，报怨者，入教可以雪恨，入教以后，不但可以抗官府，免差徭，凡鱼肉乡里之事，恣其所为。”^⑤于是，有些不法教民恃教会之庇护，“或乡愚被其讹诈，或孤弱受其欺凌，或强占人妻，或侵犯人产，或租项应交业主延不清偿，或钱粮应交公庭抗不完纳，或因公事而借端推诿，或因小忿而毆毙平民，

^① 云南丽江府云州知州黄毓全等禀（光绪十年十二月），载王明伦编《反洋教书文揭帖选》345-346页。

^② （德）狄德满前揭文。

^③ （法）史式徽《中国概略》巴黎，1912年版，转引自狄德满前揭文。

^④ 《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36页。

^⑤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48-49页。

种种妄为,几难尽述”。^① 以致德国圣言会传教士安治泰说:“哪里有教民,哪里就发生词讼。”^② 在审理过程中,“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不问是非,曲庇教士”,^③ 使得“词讼无理者可以变为有理,钱债应还者可以不还。”^④ 中国地方的司法权为其破坏殆尽。

教会恶迹是“庚子教难”发生的根本原因

外国传教士这种倚恃不平等条约、种种特权,破坏中国主权、违犯中国律令的行为以及教民的恃教妄为引起了中国广大民众的极大不满,他们为维护自己的身家性命和现实权益奋起反教,酿成了一桩桩的民教冲突。如同治元年(1862年)贵州开州教案的发端缘于法国传教士文乃耳鼓动教民张天申、易贞美、吴学圣、陈显恒捣乱当地民众的传统习俗——祭龙神。同治七年(1868年)四川西阳教案缘于教士、教民横行、奸污妇女致死,而当地传教士玛弼乐竟予以支持,光绪十三年(1887年),山东济南教案由传教士李佳白大批盗卖土地而引起,光绪十七年(1891年),湖北宜昌教案系教士拐卖儿童,枪击家长而导致。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教案为帝国主义在中国扩大影响,进一步扩张其经济与政治势力提供了

①李东源《传教论》。

②转引自徐绪曲《教会、教民和民教冲突——山东义和团运动爆发原因初探》，载《文史哲》1983年第2期。

③转引自丁名枢《关于中国近代史上教案的考察》。

④江苏巡抚丁日昌《教务隐忧疏》1870年9月，载丁明伦编《反洋教书文揭帖选》345—346页。

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以此为借口，屡屡向清政府发难。咸丰六年（1856年），法国利用西林教案纠合英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获得了更多的侵略权益。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强占胶州湾。帝国主义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军事扩张的侵略本质在传教士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于是，传教士的不法行为，引起民众反教，导致民教冲突，而传教士又从民教冲突的处理中获得更多特权，加剧了民教矛盾，愈加激起人民的反抗，如此形成了民教冲突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全国范围内反洋教斗争——义和团运动的爆发。

义和团“起于山东冠县十八村”。^① 同治八年（1867年），在法国传教士梁司铎的指使下，冠县梨园屯教民拆毁玉皇庙修建教堂，引起村民的不满，激发起旷日持久的民教之争。光绪十三年（1887年），法国公使、山东公使、山东主教数次出面干涉，然均未达到在玉皇庙基地上建立教堂的目的，他们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仍时时伺机挑衅。光绪十七年（1891年），清廷慑于列强的武力胁迫，颁布了严禁焚毁教堂、保护教民的上谕，大大助长了教会侵略势力的气焰。“这谕旨的发布，在义和拳活动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便直接导致了冲突之火的再燃”。^② 法国公使利用这一时机，勒令东昌知府洪用舟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初将玉皇庙判给教民，改建天主堂。这一不公正而又伤害村民传统信仰的做法，激起了梨园屯人民的

① 《西巡大事本末记》卷 2,14 页。

② 《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3(2)。

义愤，纷纷前往教堂与教民理论。无所忌惮的教民四处“扬言必须将控争之人按名拿究，方肯干休”，^①并施放洋枪，引起械斗。

教会夺得玉皇庙，教民在教士的怂恿下，又到处寻衅滋事，扬言教会势力大，教外之人岂敢敌视。教士、教民恶意的明显的挑衅行为激起了民众的极大怒火，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该地民众首领阎书勤、赵三多举兵起义，拆毁各地教堂，伤毙教士、教民多人。义和团运动的雄雄烈火从此点燃。

综观梨园屯教案的全过程，系由教民拆庙修堂而引发。更有甚者，庙堂之争本属宗教信仰的冲突，但却在法国公使、主教的干预下演变成政治意义上的事件。他们在梨园屯发展教徒，形成教堂武装，成为地方邪恶势力的代表，“天主教会有四大会长：张德，王老再，阎老童，陈老青。他们更傲慢，说句急话也得摆席赔礼，我们（民众）连块砖也不敢动他的。神父更盛气凌人，县官来见他，还得先来个帖，神父答应接见才来，不答应，县官也就灰溜溜的走了”。^②时任山东巡抚的张汝梅也指出，义和团“原为保卫身家，防御盗贼起见，并非故与洋教为难”。^③

而各国公使、主教却认为，“骚乱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教徒与一般老百姓之间存在着恶感。”^④然而，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恶感”是如何产生的。1897~1900年间的三任山东巡抚（张汝梅、毓贤、袁世凯）均作出了相似的回答。

① 《教务教案档》（一）528页。

② 《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256页。

③ 《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24页。

④ 《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择》中华书局1980年。

张汝梅在处理完大刀会案件后指出，教民“一经入教，遂以教士为护符，凌轹乡党，欺侮平民，睚眦之仇辄寻报复。往往造言倾陷，或谓某人毁谤洋教，或指某人系大刀会匪，教士不察虚实，遂欲怵以兵威。不知教士之势愈张，则平民之愤愈甚”。^①

毓贤指出：“窃思东省民教不和，实由近来教堂收纳教民，不分良莠。奸民潜入教内，即倚教堂为护符，鱼肉良懦，凌轹乡邻……又往往造言倾陷，或谓某人将纠众滋扰教堂，或谓某人即是大刀会匪。教士不察虚实，遂开单迫令地方官指拿……百姓遂多不服”^②。

袁世凯尽管极端仇视义和团运动，然对于民教相争一节，仍不得不坦陈“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源，实由地方州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制……往往抑制良民……而教民转得借官吏之势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诉亦难伸理。积怨成仇，有由然也。”^③

孰是孰非，不言自明。

义和团运动的烈火一经点燃，立成燎原之势，迅速遍及齐鲁大地，并随即向直隶、北京一带蔓延，1896年—1900年山东、直隶、等地发生了众多的教案，现列表如下：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 13 页。

② 《山东教案史料》176 页。

③ 《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76 页。

时 间	地 点	教案原因	出 处
光绪二十二年 (1896年)	山东兖州	教士、教民恃势逞凶,民众焚烧教堂,引起中外交涉	《清德宗实录》卷 387, 14 页
	山东曹县	教民刘慈臣抢割民众庞三杰地内麦禾	廉立之,王守中编 《山东教案史料》,齐鲁书社 1980 年版,以下简称《山东教案史料》,169 页
	山东兖州	教士安治泰要求兖州地方文武官员迎接	转引自程歆《甲午战后山东教案刍议》,《历史档案》,1987(3)
	黑龙江省绥化厅	法教士擅用照会,干预诉讼	转引自程歆《甲午战后山东教案刍议》,《历史档案》,1987(3)
光绪二十三年 (1897年)	山东威海	英教士霸占民产	《山东近代史资料选集》
	山东临清	教士霸占庙产改建教堂	李文海等编著《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齐鲁书社 1986 年版(以下简称《史事要录》),7 页
	山东寿张	教会挟持官府,斯凌乡民	《史事要录》,8 页
	山东冠县	天主教会私将庙宇改作天主教堂	《史事要录》15 页
	山东巨野	教士横行乡里,鱼肉百姓	《山东教案史料》中《巨野县教案》部分
	山东东阿	法国传教士干预东阿县公事,袒护窃犯黄享年	转引自程歆《甲午战后山东教案刍议》,《历史档案》,1987(3)
	山西丰镇	法国三一教堂与平民争地,焚抢文生孟士仁等垦户数百家	同上
	奉天康平	法天主教民捆打捕役杨宝山	同上
	黑龙江巴彦 苏苏	法教堂私运木材	同上
	奉天开原	教民霸占庙产	同上
	奉天盛京	主教纪化隆代营口法领事行权,干预诉讼	同上
	吉林农安	法天主教民孙润堂恃教抗租	同上
	奉天奉化	法天主教民赴公堂抢去教民案犯	同上
	吉林伊通	法天主教民阻挠车差及讹诈平民	同上

时 间	地 点	教案原因	出 处
光绪二十四年 (1898年)	山东濮洲	教民抢占百姓房屋	山东省社科院:《近代史资料》之《有关义和团资料》。
	山东嘉祥	教中菜民煽布流言	《筹笔偶存》12-13页
	山东冠县	教民在庙堂之地建教堂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15页。
	山东金乡	德教士硬指金乡拐犯为教堂司事	转引自程歆《甲午战后山东教案争议》,《历史档案》1987年(3)。
	山东临淄	教民欲改尧王庄庙宇为英教堂	同上
	山西丰镇	法国三一教堂与口外平民争地,烧毁三成局垦户乔旺等房屋一百余家	
	吉林	法主教蓝禄业干预地方公事	同上
	直隶滦平	法教堂欠交地租	同上
	直隶保定	教士、教民强迫民众为教堂服务	《清德宗实录》,卷420,10-11页。
	山东菏泽定陶、巨野等	教民欺侮平民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39页。
	山东沂水	境内圣母家集民教相争,民人田庄太被打死	《山东近代史资料选集》
光绪二十五年 (1899年)	山东、郟城、神山	教民横行乡里、包揽词讼	《山东近代史资料》之《义和团资料》。
	山西	英教士强行低价购买百姓土地。	《清德宗实录》卷455,10页。
	直隶保定、安肃	教民反对当地人民搭棚庆祝神州。双方纠纷,教士席宾等干预	《义和团》,第1册,448页。
	直隶涞水	村民举行除夕迎神赛会,教民张才等肆行辱骂,并撕毁神像	《史事要录》39页
	山东莘县	平民屡遭教民欺侮	《筹笔偶存》,41页。
	山东平县	教民串贿差役陈德和等,捏称拳民谋变,向百姓讹诈钱财。	《史事实录》,52页。
	山东聊城	教士赵锡爵抓团民	《山东县志资料》,1960年2月编
	山东冠县	教士横行乡里	《山东时报》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十二日
	山东长清、茌平、博平等	教民屡次欺侮民人	参见《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8-9页。

时 间	地 点	教案原因	出 处
	直隶献县	民教发生武装冲突,拳民五人被杀	《史事要录》,63页。
	山东肥城	英国牧师卜克斯与民众相遇发生争执,卜克斯夺刀行凶	《史事要录》,67页。
	山东平原	乡民李长水等被教民李金榜等欺讹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41页
	山东茌平	教民乘义和团民众路过教堂之机,开枪拦阻袭击。	《山东义和团案卷》9页。
	山东泰安	圣言会副主教福约瑟等打死泰安县平民李二金	转引自程歆《甲午战后山东教案刍议》,《历史档案》,1987年(3)。
	山东平原	连年歉收,教民恃教士之财,高抬粮价,囤积居奇。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49页。
	山东汶上	教民气焰嚣张,聚百余人捆绑平民,口称拿获红拳会,擅送济宁教堂,并有毆人勒索情事。	《山东教案史料》,175页。
	直隶	神甫卜致中强迫庄民刘芳文给驴子出殡,牌位上写“显考大驴之神位”,并逼刘芳文执孝子礼。	
	直隶晋县	晋县孟家庄设场练拳时受到教民的无理干涉	《晋县志料》
	山东平原	教民诬陷民众哄抢教堂,张大其词向教士耸告	《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10页
	山东禹城	教民张哲诬控庄民诸候林等纠匪抢劫	《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243页。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	山东临清	教民倚仗教会横行乡里激起民愤	《筹笔偶存》,380页
	山东乐陵	教民倚仗教会横行乡里激起民愤	《筹笔偶存》,305页
	山东泰安	教堂司铎带教友六、七十人解围,杀义和团四、五十人。	《筹笔偶存》,405页
	热河朝阳	天主堂土匪五百多人进攻花子沟。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
	陕西靖边	传教士横行霸道。	《定边县志》,第二编,89-91页。
	陕西安边	传教士横行霸道。	同上。
	陕西定边	传教士横行霸道。	同上。
	湖北沈亚山区	老河口主教以防义和团为名命令襄阳总团组织二三千人地主武装,残害人民。	《武汉大学学报》,1978(1)。

时 间	地 点	教案原因	出 处
	直隶清苑	反动教民蓄意挑衅,开枪打死乡民一人,打伤三人。	公孙旬《义和团运动在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65页。
	山东肥城	教士卜克斯被杀,该地传教士从中鼓弄,力图扩大事端。	《山东教案史料》355页。
	直隶定兴	天主教民斯凌善良,霸占公产,官不能申理。百姓控诉无门。	《义和团》,(一),444页。
	直隶任邱	义和团民众途经该地,遭教民突袭,拳民三十余人遭害	《史事要录》,88页。
	直隶涞水	村民过年搭棚悬灯,教民仗势告官,迫全村民罚银赔礼。	《史事要录》,103页。
	直隶保定	教会武装日出寻衅,又向绅富匀粮,肆行滋扰。	《史事要录》,126页。
	山东禹城	教民谎言声称被抢,怂恿教士上告。	《山东义和团案卷》,263页
	山东陵县	天主教民樊兆右招聚邻境及直隶、宁津、景州等处教民,在该处坚筑重围,悬挂抬炮。	《山东义和团案卷》,318页

在以上我们所列举的具有代表性的六十五件教案中,无一不是因教会、教士、教民的不法行为所导致。可见,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目标并不是指向基督教信仰本身,对准的而是教会中的不法分子,正如英国人必克在《支那教案论》中指出:“中人所恶,绝不在教,而所恶之实,正当于教会、教士中寻之”。^①因而,西方教会所谓的“庚子教难”实由教会劣迹所引起,应由其本身承担后果。

我们不妨再举三个案例:

^①必克:《支那教案论》严复译南洋公学译书院印行。

一、湖南衡州教案

衡州地区绅权势力素称发达，封建传统文化影响较深，士民重“华夷之辨”，而衡州亦是湖南境内教会势力最发达的地区，因而，民教冲突一直较为尖锐。早在同治元年（1862年）就在这一地区爆发了湖南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教案。以后，大大小小的教案时有发生。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随着八国联军侵华声势的逼近，衡州的传教士更加横行霸道，肆意妄为。城北门外的法国天主教堂借口扩充教堂，培植果园，企图霸占江东岸一带的淤洲。他们贿赂县官，纵容地痞流氓，勒令当地农民、船户数百人限期迁徙。传教士董哲西等竟以“妨碍宣讲、侮渎圣母”的罪名，将前往教堂交涉的居民代表十余人捆送县衙治罪。群众愤恨万分，隐忍待发。^①6月底，传教士董哲西引诱衡阳署钱漕马迪庵家中妇女入教，前往江东岸僻静处洗沐。群众益增反感。然当江东岸不愿迁徙的居民100余人被捕的消息传出后，愤怒的群众即齐向董哲西所在黄沙湾天主教堂挺进，打死了董哲西，焚烧了教堂，后又将企图逼勒地方官加以弹压报复的外国传教士范怀德、安守仁杀死。

二、直隶朱家河第二次教案

经过第一次攻打之后，朱家河教堂又进行了加固，建筑了炮楼和掩身墙，如同一座碉堡，又配备了新式武器，充实了军火，各地教民三千余人，一半以上拥有洋式武器而且训练有素，所以教堂的防御力量是十分强大的。义和团民昼夜猛攻，尽管伤亡惨重，但仍久

^①刘洪洪：《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湖南衡州教案》载《求索》1991（1）。

攻不克。时李秉衡所属江西按察使陈泽霖率领的勤王军路过此地，当地义和团首领即向其诉说朱家河教堂的种种恶迹，正当陈泽霖对于是否助战犹豫不决时，朱家河教堂突向过路勤王清军放冷枪，其部将陈鸿遽被激怒，又为正义所动，主动要求出战，获得陈泽霖的同意，终将教堂攻破，胸怀新仇旧恨的义和团民高举刀枪，像溃堤的凶浪一般冲向教堂。除洋教士和少数教民仍负隅顽抗外，多数教民见势不妙，纷纷丢枪而逃，或举手投降，或跳水自亡。义和团随即将教堂烧毁，被杀的和投水自杀的教民有三四千人。^①

三、陕西宁强燕子砭教案

光绪十四年(1888年)，意大利籍神父郭西德奉命来燕子砭传教，他看中青岗坪一地，想在此建立据点。当地任姓家境富裕，房屋宽敞，郭西德欲购作教堂之用，任姓不允。郭西德乃放债与任姓弟子中之吸鸦片者，后遂藉词强占任姓房屋。由此教堂逐渐扩大，勾结当地上豪劣绅，收买土地，放高利贷，榨取农民血汗。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夏，全国发生旱灾，燕子砭人民生活尤其贫苦，天主教堂则利用这个机会，放高利贷，收买农民土地。次年，收成有望，郭西德为收回借贷，竟于夏禾成熟之际，放纵无赖教徒到农民山里抢收小麦，由此引起农民义愤，遂聚集了三百余人，殴杀了郭西德。^②

从以上案例我们可以看出，部分的所谓“殉道真福”只不过是平素为非作歹的不法教士、教民，虽然义和团运动中伤及了许多无

^① 公孙旬《义和团运动在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57-58 页。

^② 《宁强教案调查》载《陕西文史资料》第 16 辑 200-201 页。

关的教民，但我们也可以说，他们都是教会在华恶迹所造成后果的牺牲品，与那些不法教士、教民应加以区分，不能相提并论。

“庚子教难”的本质

由于义和团运动对西方各国的在华利益造成极大的威胁与损害，因此，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组成“八国联军”对华进行武力进攻，随着“八国联军”的步步进逼，传教士也开始了报复活动。

传教士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很早就以传教为掩护，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刺探中国情况。时机一旦成熟，马上就可以组成一支侵华别动队。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其报告中即明确说明法国天主教北京主教樊国梁为联军刺探情报等事。樊国梁也承认他办的中法学堂“为法国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这样的人去不只是为了“烧某某村庄，杀某某义和团，而是为了供给军队将领们以所需要的情报”。^① 英籍传教士宝复礼在义和团进攻天津时，曾经驱使教民为帝国主义侵略军卖命，“在我们出发之前，两个中国基督教徒学生充当了我们的探子，这两个人探听到了大炮口径和数目、战壕、水雷、地雷情况等等，回到天津向我报告”。^② 完全可以说，没有传教士的助纣为虐，八国联军不会如此轻松地攻占天津、北京。

事实上，传教士同八国联军一道，疯狂地洗劫了北京城，其滔

① 《传教杂志》1902年合订本，66页。

② 《随联军从天津到北京》163页。

天罪行罄竹难书。1900年12月14日的法国《北方醒报》，登载了某回国士兵的叙述：“从北堂我们开向皇宫，修道士们跟着我们去。……他们怂恿我们屠杀、抢劫……我们行抢都是替教士们下了……教士们作我们的向导。我们进一家就随便拿东西，我们把店铺掌柜抓了当仆役。教士们把抢来的东西，让他们背着运到北堂去了……”^①此言一出，无需再加以任何说明。巴黎遣使会总院会计白登卜也承认说，“有人指出，当士兵们肆意抢劫的时候，教士也掺杂其中，我相信是这样的”。^②

八国联军在传教士的密切配合下，血洗了京津地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其沉重的民族灾难和民族耻辱。同时也暴露了西方列强与教会的丑恶面目。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慈禧太后下令镇压义和团运动，教会势力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疯狂的报复活动。在永清“各州曾经受害之教民、结队成群，四出打家劫舍，大张旗号。声言‘奉命报复’。或罗织富民指控，逼官传办，官如不理，则相率乱哗，但一经禀传，即估家私，定索赔之多寡，是以人皆畏惧，希冀出钱免祸，动辄饱其贪囊。”^③保定的教民更加猖狂，“所指控者全系得之传闻，甚或藉报夙愿，或因其家道素丰，择肥而噬……现在清苑一县所告不下百余起，被控不下数百名，其中确有凭证者百无一二”。^④对反教最力的义和团，传教士进行了疯狂的剿杀，“控拳匪则每次单开动以百

① 《进步日报》1951年8月17日。

② 《遣史会年鉴》1902年合订本，71页。

③ 《永清庚辛纪略》载《义和团》（一）426页。

④ 《增订教案汇编》（下）卷五。

数十名计”。^① 而对平素因秉公执法而危害到传教利益的官绅，传教士亦要求开单一并惩处。如江西教案中，传教士“开具应办绅犯多至 250 余名，均指定正法，军遣罪名，并谓必须惩办定案，及将地方官参办，方能议及赔款”^② 在外国传教士的要挟之下江西教案共处死 13 人，^③ “尚有未获者一百余名，仍议明须由地方官照例拘究”，^④ 湖南教案共处死 10 人，^⑤ 湖北教案共有 44 名官民受处分，^⑥ 黑龙江教案牵涉官民亦达 43 人之多。^⑦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教案中死去的教士、教民，成了后来传教士们讨价还价，向中国任意勒索的砝码“索赔款，则每一主教动以千万数百万计。”^⑧ 为了满足他们的贪欲，他们任意增减受害教民的人数。在塔拉特旗教案中，“所称杀害教民 800 余人……与辩论，该教士初减至 230 人，复经极力研磋，以 150 人定议”。^⑨ 而在处理奉天教案中，中国政府已答应赔偿 140 万两银子，而“法传教士不但不立约完事，又添出教民人命 4 条，每人索赔百金，合银十余万两”。^⑩ 生前被教民用作侵略工具的教民，死后还要被教士用作勒索赔款的口实，身价倍增。“于是人（教民）皆怀发财之想，日肆其搜刮之术，一纸到

① 《清末教案》（三）360 页。

② 《清末教案》（三）84 页。

③ 《清末教案》（三）80—82 页。

④ 《清末教案》（三）80—82 页。

⑤ 《增订教案汇编》（下）卷五。

⑥ 《增订教案汇编》（下）卷五。

⑦ 《清末教案》（三）340 页。

⑧ 《清末教案》（三）360 页。

⑨ 《清末教案》（三）124 页。

⑩ 《清末教案》（三）558 页。

官,火釜四出。教民曰监押,则监押之,教民曰敲朴,则敲朴之。遂名索贿,官为之勒限取盈,指地建堂,官为之逼民迁徙。其畏教民如虎狼,而事之如父兄,生视百姓破产之家而莫之恤。是赔偿之外又有赔偿,无履足之心,无了结之日。”^① 1900-1902 年度中,仅北京城直隶省就赔款一千多万两,其他各省赔款数目如下:

地 点	赔 款	备 注	
湖北	8000 两	《增订教案汇编》卷五	
浙江	18 万两	《增订教案汇编》卷五	
湖南	37 万两	《增订教案汇编》卷五	
保定	144 万两	《增订教案汇编》卷五	
山西	240 万两	《清末教案》P548(三)	
顺天府	140 万两	《增订教案汇编》卷五	
直隶府	遵化	60722 两 8 钱	《增订教案汇编》卷五
	易州	26000 两	《增订教案汇编》卷五
	冀州	201560 两	《增订教案汇编》卷五
	赵州	43040 两	《增订教案汇编》卷五
	深州	236600 两	《增订教案汇编》卷五
	定州	134400 两	《增订教案汇编》卷五
保定府属	665729 两	《增订教案汇编》卷五	
永平府	187400 两	《增订教案汇编》卷五	
河间府	97966 两	《增订教案汇编》卷五	
天津府	665228 两	《增订教案汇编》卷五	
正定府	29300 两	《增订教案汇编》卷五	
顺德府	42768 两	《增订教案汇编》卷五	
广平府	201556 两	《增订教案汇编》卷五	
大名府	105975 两	《增订教案汇编》卷五	
黑龙江	165000 两	《清末教案》(三)347 页、645 页	
江西	510650 两 又 95694 元 恤银 265384 元 又 360 两 钱 3842138 文	《清末教案》(三)82 页	
塔拉特旗	37 万两	《清末教案》(三)124 页	

^① 《清末教案》(三)253 页。

地 点	赔 款	备 注
宁条梁等地	143500 两	《清末教案》(三)105 页
奉天	140 万两	《清末教案》(三)746 页
云南	15 万两	《清末教案》(三)149 页

除了所谓的“惩凶”“赔款”，传教士趁机扩大他们的地盘，要求清政府出钱为他们建立教堂。山西教案的处理中，传教士为了“报范主教未了之愿”，要求将“衡郡塘湾教堂邻近拟将地基扩充，建立总堂一座，该地须由地方官按图设法购妥”^①，在江西，传教士认为“上年护主教陶文贻曾在饶州被伤，将来建复饶建西府教堂，必须清用敕建字样，并于省城购城一区以六百方丈为度，又在饶州府城购置民房一所，以为开设学堂之用，非此则赔款万难照议。”^②

话说至此，所谓“庚子教难”的本来面目愈加清晰地显现出来。

义和团运动这一反洋教斗争是一系列由教会引发的民教冲突的总爆发，肇端于不法教士、教民的胡作非为。在运动中被杀的部分传教士实属罪有应得，其中伤及的无关教民只是教会作恶的无辜牺牲品。他们的死去并不能抹杀以义和团民众为代表的中国人民的反抗行为所具有的鲜明爱国主义性质。所谓的“庚子教难”是西方殖民者和教会为欺骗国际舆论而任意歪曲历史事实捏造出来的，所追封的“殉道真福”更加名不符实。我们应该实事求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① 《增订教案汇编》(下)卷五。

② 《清末教案》(三)81 页。

西方传教士在 1900 年

王毓华

1900 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义和团运动和残暴的八国联军入侵。至今 100 年了，还值得我们各方面追寻史实，以求明辨是非。那一年事儿多了，本文只追述一些基督教传教士的所作所为，以示一斑。

不过，事情还得有个头，那就是西方传教士如何进入中国的。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清政府不断遭受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订立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约。从而，外国差会乘机派遣一批又

一批传教士进入中国。特别是 1858 年订立《天津条约》时,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 W. William)把“传教宽容条款”塞进了条约,传教士们更以征服者趾高气扬的姿态进入中国内地。《天津条约》签订后,7月30日,著名传教士杨格非(John Griffithy)给英国差会的信中说:“这封信带给你的消息,一定会使整个基督教国家所有的差会朋友们深感兴趣。这个辽阔、古老的帝国,不管它的闭关政策,自负的傲慢,对一切外国的极度轻蔑,已经首次被迫打开它迄今不能渗入的地区,可以进行友好的交往和光荣的贸易了……就这样,中国几乎出乎意料之外地对教士、商人和学者开放了。这个国家事实上已经落在我们的手中,一切早已在中国的传教士和各自国内的差会,如果他们不去占领这块土地,不在十八个省的每一个中心取得永久立足的地方,那将是有罪的。”^① 1860年,英法联军再向北京进犯,10月又签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给传教士以进入内地置地产的特权。《教务杂志》1869年7月第51页刊载一个传教士的文章说:“我确信,全体传教士将会接受这样的心情,即不仅要追求我们的条约权利,而且如果需要,还要追求条约以外的权利……目前所签订的条约已经准许我们去,我们就可以去,而且可以正当地请求给予条约保护。如果条约过于限制我们,我们可以越过条约,而且必须要越过。如果上帝保佑给予开路并赐给我们力量去做的话。”传教士们以这种征服者的心态在中国进行为所欲为的活动,必然引发与中国人民的冲突与斗争。于是教案频起。清朝恭亲王奕訢的奏折说:“传教士每以民间琐事前来干预,致奉教

^①汤普生:《杨格非传》第79-82页。

与不奉教之人诉讼不休……奉教者必依恃教众，欺侮良民……为地方官者，又或以甫定和约，惟恐滋生事端，遂一切迁就了事，则奉教之计愈得而不奉教之心愈不能甘。”^① 外国传教士既恃强凌弱，中国政府又不能保护老百姓，人民群众不得已，群起反抗，自己保护自己，形成“反洋教斗争”，遍及全国各地。斗争形式不外乎：拆毁或烧毁教堂、殴打传教士、惩治那些作恶的教民，也惩办一些地方官吏。曾国藩在 1870 年就感到，传教士及其教民肆意欺压百姓的事，终久会激起反抗。他在奏折中说：“……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群思一逞……”^②

显然，所谓反洋教实质是反对外国的侵略和压迫。这些可以称作义和团运动的前奏曲。更大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从山东起事，1900 年初发展到天津。

对义和团的发展，传教士们既惊恐又痛恨，意欲彻底消灭这一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1899 年 12 月 4 日《字林西报》就发表社论说：“假若中国的广大群众，一旦肯定地相信，他们能够在保护清朝的名义下，用暴力把外国人的新兴事业加以扼杀，乘机除灭洋人，那么，在这个帝国之内不再会有外国人立足之地。”为了保卫帝国主义的所谓新兴事业，传教士竭力鼓吹镇压义和团运动。他们一方面向清政府施压要求镇压，另一方面煽动西方武力干涉。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 2 卷。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 76 卷，第 42 页。

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是个中国通。他极力主张镇压义和团。1900年2月6日，上海《字林西报》发表了他的新闻通讯，文章结尾说：“除非很快地采取行动加以制止，这个声势浩大而危险的运动必将使每一个外国人从这个帝国驱逐出去。这就是这个运动发起的目的。”2月17日又在《字林西报》发表长篇专论介绍了义和团的历史、目的，其结论说：“应该坦白地告诉北京政府，单单讲好听的的话的时期肯定是已经过去了，今后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整个中国，南起黄河，北到长城，甚至长城以北，都将暴动四起，烽火遍地，把外国人在内地所有的事业彻底摧毁，并且在不难预测的情况下，将每一个外国人从北京天津都驱逐出境。很久以来，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发生这种变乱的危险。除非现在就采取强硬的和一致的对策，变乱一定会发生，正像任何势必发生的事情一样。关心防止变乱的有关人士，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①

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更是奔走呼号。他在《留华四十五年》第295—297页中回忆说：“1900年初我离开中国去出席纽约的普世宣教会议……对于威胁着传教士和所有在华外国人的危险，我是那样深信不疑，所以我随身带着明恩溥的报告，准备提交大会的执行委员会……我曾力请各差会总部采取联合行动，防止势将到来的危险。”这还不够，他又到波士顿。他回忆说：“在那里有一位朋友介绍我去向‘二十世纪俱乐部’报告中国的局势。（1900年）5月5日我去作了报告。当他们感觉到形势的严重性，并看出来受到威胁的不仅是传教工作，而且是在中国的最高

^①以上两则资料摘自明恩溥：《中国在动乱中》。

利益和世界的和平，就立即决定要我去把问题向华盛顿政府提出来，并为我写了许多介绍信，使我能够到众议院到白宫的各个机构进行联系。”于是李提摩太奔赴华盛顿，“我首先把请愿书向国务卿海约翰提出，他是极表同情的。……我又谒见了参议院院长霍尔，他也极感兴趣……”

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W. A. D. Martin）叫嚣：“把势力伸展到中国的好机会到了，上帝不允许我们放过这个机会。”^① 作为传教士他竟以上帝为入侵中国的幌子。

以上资料可见，传教士们或制造舆论或奔走呼号，目的在鼓动外国政府采取行动干涉中国内政，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进一步占领中国。

西方国家先是干涉内政，进行威胁。1900年4月，英、美、德、法四国公使联合发出照会，限令清政府在“两月以内，悉将义和团‘匪’一律剿除，否则将派水陆各军驰入山东、直隶两省，代为剿平。”^② 5月28日至30日各国公使更警告清政府：“不论中国政府的态度如何，各外国公使已决定调兵来北京，我们劝告中国政府让步，以免引起意外的后果。”^③ 清政府在外国势力压迫下，竟同意侵略军进京护馆，还批准用火车运送。于是从5月底到6月初，俄、英、美、日、德、法、意等国侵略军四百余人分两批先后进入北京。同时各国兵船泊大沽口外示威。但帝国主义绝不止于威胁，17日凌晨，八国联军向大沽炮台发起进攻。

① 丁韪良：《北京被围记》。

② 《近代中国史稿》第606页。

③ 《近代中国史稿》第607页。

在侵略战争爆发的前后，传教士们积极参与军事行动。6月8日明恩溥率领70个美国人，六、七百中国教徒从通县转移到北京孝顺胡同关以美会。6月9日这里就有了军事防卫组织，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指导下，把教堂修筑成堡垒。负责这项工程的是关以美会传教士贾腓力。不久，海军陆战队接到命令，要护送传教士及家属到使馆区。但，传教士不放弃中国教徒，在这支转移队伍中“中国男子和少年组成一个大队，许多人替外国人扛着笨重的行李。……殿后的是为数不多的传教士，他们大半有来福枪或手枪，也有人两样都有。有几个中国人领到了枪，但大多数是带着中国式的长矛。他们每晚不倦地操练使用这种武器……”^①

各国传教士带着共约二、三千名中国教徒集中到使馆区后，积极投入了各项军事活动。

首先是驱使中国教徒从事修筑防御工事。《华北捷报及最高法院与领事馆公报》65卷第727-730页刊载着1900年9月传教士丁懋良在上海新天安堂作的“被围在北京使馆里”的演讲。他说：“有时有人说对中国教徒的安全过于重视了。熟悉当时情况的人所做的见证是，如果没有这些教徒就不可能把英国使馆守住。他们干了些什么呢？这些教徒提供了劳动力，他们是由传教士组织起来的劳动大军。在猛烈的炮火下，耐心地执行了防御工程的任务。”他还描述一个故事，说：“这个人是一位大学教授，有一个夜里，当他在修筑工事时，他前面一个人和后面一个人都被打死了，但他和其他人一样劳动着。”另一个传教士盈亨利（James H In-

^①明恩溥：《中国在动乱中》上卷第257-266页。

gram)在其《北京被围记》中更详细地记述：“……我们给使馆带来了一种谁也没有想到的力量……这些中国教徒是劈柴打水的人。倘若没有他们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就不可能建筑那 476 英尺的防御工程；我们就不可能建筑那 2000 多平方英尺的避弹室；我们就不可能挖掘那 912 英尺长，3 英尺宽，12-15 英尺深反地雷的坑道。这些工作全部都是中国教徒做的。”防御工程的总管是传教士贾腓力。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他受到美国公使的表扬，表扬信说：“我们之所以得到保全，得力于你的智谋和不懈的努力，比任何人都多。请接收我个人对于你的工作最热烈的赞赏和极诚恳的感激。意·赫·康格”。^①

其次是高价诱使教徒冒死送情报当信差，为他们从被围的使馆向外面侵略军送信。这样的事件有许多，现仅摘录几则。克特曼著《被围在北京城内》第 99 页说：“他若能带着信件安全通过敌人的防线就赏给他一千两银子。我们打发了无数的信差从水关或是越过城墙出去，但是未曾有一个回来。毫无疑问，他们是被捕获而遭杀害了。”明恩溥在《中国在动乱中》上卷，第 294 页记述：“……一个年青人，他是梅子明的教友，化装为乞丐，信件用油纸包着放在一只装满稀粥的油碗底下，在夜晚用绳索缒送越过城墙。”还有化装成算命先生去当间谍的。

这些被传教士驱使或诱使而丧命的教徒，以后都被传教士列入庚子年“为主殉难”的名单里。

第三项重要活动是抢劫和盗取粮食和财物：传教士率领中国

^①宝复礼：《随联军从天津到北京》第 120 页。

教徒在被围的使馆区内进行抢劫和盗取。例如，明恩溥在他的《中国在动乱中》第 263 页就记述：“为了未雨绸缪就到东交民巷的中国商店去，见到有用的东西就拿，特别是食品之类……通过这种捷足先登的办法，弄到了不少原来无处可找，最后成为无价之宝的东西。”在 273—276 页还回忆说：“……第一个步骤是立刻搜查界线以内所有的本地粮店，并吩咐中国人将粮食装入口袋，不是搬到使馆去，便是搬到肃王府去。米找到了好几吨……东交民巷和御河桥的十字路口上，发现有一家店铺，堆满了新麦子……起初是用大车或苦力（中国教徒）将原麦运到英国使馆去磨成面粉。后来发现利用粮店本身的 11 盘磨和 15 头骡子，就地磨面，每天将成品搬走……这样，这些磨几乎昼夜不停地磨了七个星期。”他们把使馆区内中国商店里的财物也都盗取到使馆，并指定传教士梅子明为专任委员全权管理。他们在网球场上设一个临时堆栈，“从这里发给了几百个中国教徒和他们的家属所急需的衣服和被褥。……不过劫物是源源而来的。外国人也大量地从这里领取东西。”^①

在使馆区传教士中还有人充当炮手，直接参与屠杀。北京基督教会至今收藏着一本相册，相片都是 1900 年在英国使馆内外拍摄的。有一张显示中国教徒修筑的防御工事，一张是一座大炮上坐着一个军人，下面立着 6 个不着军装的人。相片的说明为：“在英国领事馆。‘托克本司要塞炮台’，有挪威式快速火炮和炮手麦飞军官。照片还显示全体要塞人员。（左起）下嘉利牧师、炮台主任贾腓力牧师、纪力宝牧师、鄂方智会长、石敦豪牧师和江戴德牧

^①明恩溥：《中国在动乱中》下卷第 373 页

师。六位‘战斗的牧师’。”

如果说在使馆区的传教士，即便参与军事行动，也还没有正式穿军装，那么天津美以美会传教士宝复礼则是不折不扣的穿军装的八国联军情报官。

宝复礼自己写的《跟随联军从天津到北京》中，他还得意地发表了他的委任状和着军装照片。委任状如下：

命 令

1900年7月20日，天津委任状第120号

自本月20日起，宝复礼牧师编入本军，隶属情报处。

此证。

英国远征军司令部情报处

诺利(签字)

《跟随联军从天津到北京》中，有几段记载，使我们了解到情报官宝复礼在联军进攻北京过程中的种种恶行。

1 宝复礼唆使被骗中国青年教徒充当联军密探，多数丧命。书中记载：“在我们出发前五天，先派了两个基督徒学生去作侦察……青年侦察员们，四面了望，将炮的大小和数目都记下来。他们看见铁路旁有一条约6英尺深30英尺宽的沟……我们的侦察员就尽快地赶回来了。他们一向我报到，我就带他们到司令部去，那里有芮达上尉所领导的印度绘测处，把他们的情报都记在地图

上。”^① 又记：“有两个人穿过义和团的封锁线，到大沽将我们的迫切需要报告给海军司令。一个被捉住了扔在河里，另一个始终没有回来。”还说“派出去的人，只有极少数回来，许多人被枪毙了。有一个人把情报吞了下去才得活命。”^②

2、抓俘虏，并审问俘虏。“这时我们已捕获了不少俘虏。有些是正规军，有些是穿制服的拳匪……凡敢于逃跑的就立即枪杀……我的一部分任务就是审问这些俘虏，把所得的情报汇报给情报处”。^③

3、在进攻北京的行军计划上献策，为此宝复礼受到表扬。宝复礼在书中记述：“8月12日，参谋长巴鲁将军把我叫去……给我看一封从窦纳乐来的急件……内容是指令攻入北京城的最适宜地点，并附有一份计划……我看过之后，就对将军说，‘我很抱歉，我不能同意窦纳乐爵士的意见。’我认为他要我们从永定门打进城里的建议是错误的。首先，这样做，要使英军多走三英里路，这将浪费时间。其次，永定门要比东南城沙窝门坚固得多。我建议从沙窝门（今广渠门）打进城去。我的建议被采纳了。”^④ 由于宝复礼的计谋，英军顺利地攻进北京城。在《跟随联军从天津到北京》一书中第123—124页宝复礼感激涕零地记述他受到的表扬：“……我永远不会忘记英军司令盖斯里，他在百忙中从北京写给我一封信，信中很慷慨地称赞我。……这封信我将永远珍视着。信上说：

① 《跟随联军从天津到北京》63—64页。

② 《跟随联军从天津到北京》第65页。

③ 《跟随联军从天津到北京》第80—81页。

④ 《跟随联军从天津到北京》第101页。

“我很遗憾在你离开北京之前没有再见到你……在这次向北京进军中对于你的帮助表示非常感激。你对于这个国家的了解是极其有用的。祝你一切顺利。英国远征军司令盖斯里 1900 年 9 月 9 日于北京。”对侵略军来说,传教士是最有用的情报人员,因为他们在中国城市和乡村无处不去,情况特别熟悉。宝复礼是最好的例证。

8 月 14 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各国军队分区占领。“当各国侵略军打进北京城后,就像一群强盗在被他们打开的宝库前面一样。整个北京城,包括城市中心的皇宫和城外的颐和园,遭到了洗劫。除了军官和士兵外,还有传教士也参加了掠夺。”^①联军特许军队公开屠杀、掳掠三天,实际是抢劫不断直至联军撤走。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他的《北京使馆被围记》中对抢劫一事,不但不谴责,反而认为抢劫者是受诱惑或者是进行应该的报复。他说:“……一半以上的居民都抛弃了住所,向城外逃去。在仓惶中,他们把装满了高价皮货的衣橱丢弃不顾,地板上到处是贵重的绸缎;有些地方满地都是元宝。多么诱惑人去抢劫啊!”他还说:“老习惯(指抢劫)是军人所心爱的,没有一个国家的士兵是不参加的;很难说他们这样做到底是由于他们觉得这是对中国人应该进行的报复行为,还是由于禁止反而加强了禁果的诱惑力。”抢劫不单是侵略军士兵的个人行为,而且是列强的国家行为。丁韪良在他的记述中继续写道:“有些国家纵兵抢劫不加限制,显著的是英国将军们,禁止私自侵吞,尽可能地把各种赃物集中起来,为大家的利益公开

^①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778页。

拍卖。因此有几个星期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骡车、驴车和马车，插着英国或日本旗帜，满载着被遗弃的宝物、丝绸、皮货和谷物运往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司令部去。”

令人咋舌的是宣讲“十诫”不可偷盗教训的传教士也和侵略军的士兵一样抢劫。一个英国随军记者亨泰在他的《随军进京记》第 374 页中写道：“传教士对于掠夺财物非常活跃——他们把大部分拍卖出去——并且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说，他们所得的钱将作为重建教堂及差会住宅之用。”据丁韪良的《北京使馆被围记》第 7 章“营救与报复”131—139 页所记，他和惠志道牧师及怀定牧师有一次“小小的动掠”，“我听说在内城京师大学堂附近有一家粮店。我们到那里去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小麦、玉米和其他粮食。于是我们把这些粮食搬装到好几辆骡车上。我们运走的粮食不少于二百蒲式耳。”他又记述：“美国公理会在一处王府驻扎，都春圃牧师发现该处和附近一带房屋里有大量的皮货、绸缎和其他值钱的东西。他向军队和使馆做了广告，把这些物品拿出来公开拍卖……另一个雷思德牧师……买了四大箱皮货拟拿到纽约去转售，为的是要帮助受难的教徒……。”他在叙述了传教士的抢劫罪行后，恬不知耻地说：“关于外间控告传教士的掠夺罪行就说这么多！我很高兴在他们所蒙受的谴责中一同有份，并且承认自己与他们同样有罪，虽然我留着为自己用的只有一条山羊皮地毯。”

传教士比士兵抢劫更甚的是霸占大宅门房产，并鲸吞其中的财物。例如：

英军占领区为西单往南到宣武门大街以西一带。在使馆里当炮手的英国传教士鄂方智，从使馆出来乘机占领了象房桥（后称南

沟沿)南头刑部殷柯庭的宅院,作安立甘会会址。有近邻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记载:“殷柯庭刑部宅,洋人据之,改为安立甘教堂。”绒线胡同安立甘会的老会所旁,一座大寺庙被八国联军烧毁。这里也被安立甘会占有,后来建成崇德学校(今市立31中学)校舍及外国传教士住宅。安立甘会霸占殷宅后,压迫原房主低价出售,建成“救主堂”。

美以美会的传教士刘海澜占了清宗室英宅府院、太山行宫、真武庙、火神庙和关帝庙等,还低价强买附近的民房,迫使九百多户搬迁,建成美以美会大院。

美国公理会的传教士梅子明(又名梅堯良)和都春圃从使馆出来立即抢占其东邻贝子府(一座蒙古王公的府邸)及其东邻佟府。梅子明在1900年8月16日的信中写道:“8月14日我们被援救出来了。……我挑选了就在我们以前住处东首的那座蒙古王府。”18日又写道:“今天我在这里前主人藏财宝的阁楼中发现大量的珠宝、纹银和四只表。”梅子明将贝子府的大客厅做礼拜堂。府中古董、瓷器、绸缎、皮货以及金银珍宝,均被掠取一空。灯市口北面的端方府也被抢掠。端方是陕西巡抚,为此向公使提出抗议。梅子明只赔了五百元。他对原灯市口公理会所占地盘的四邻扬言,要他们赔偿公理会会所被烧后留下的砖瓦木料。四邻无奈,都把自己的房地产出贱价卖给公理会,离开灯市口这一地区。公理会的地基从而扩大到以灯市口为南界的三面临街的范围。在这范围内原有的东岔胡同、瓜子店胡同、一间楼胡同都没有了,都成了美国华北公理会的产业。

梅子明又多次下乡到房山、良乡、涿州、顺义、普安屯等地,向

地方政府和老百姓勒索赔款。他写的信上，自称这种行动为“讨伐”。

1900年12月24日《纽约太阳报》记者钱伯兰采访梅魁良的报道说：“美国公理会的梅子明（即梅魁良）牧师先生已从外地旅行回来了。他是去为义和团所造成的损失索取赔偿的。他不论走到哪里都要强迫中国人赔款……他已为每一个被杀害者索取到三百两银子，并强迫对所有被毁损的教徒财产给予充分的赔偿。他还征收了相当于赔款十三倍的罚金。梅子明先生声称：他所索取的罚金将全部用来宣传福音。”

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于1901年2月在《北美评论》上针对以上报道发表文章，其中谴责梅子明说：“梅子明先生为了清算别人（指义和团）的罪行，从贫困的中国农民身上榨取十三倍的罚款，因此让他们，他们的妻子和无辜的孩子们势必慢慢地饿死，而可以把这样获得的杀人代价用于传福音。他这种搜刮钱财的绝技，并不能使我心里感到意外，他的言行，总的看来，正具体化地表现出一种褻渎上帝的态度，其可怕与惊人真是在这个时代或任何其他时代都是无可比拟的。”

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清政府众官员先随西太后往西逃跑，接着很快投降。但帝国主义一方面要逼清政府彻底屈服以便取得最大的利益，另一方面又因彼此之间的纷争极端复杂，以至议和与签约一直拖延到1901年9月。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传教士们在议和期间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的言论。

首先他们绝无一向对教徒宣扬的宽容忍耐之心而极力主张惩

罚与报复。美国传教士卜舫济在他所著《中国的暴乱》一书第 116 页中写道：“必须一劳永逸地使中国彻底屈服。……中国也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使它永远不致再犯同样错误……凡发生过排外暴动的地方，讨伐军都应该深入进去，所有罪犯，都应当因为他们的野蛮残暴行为，受到应得的处罚。”

丁韪良于 1900 年 9 月在上海新天安堂的一次演讲大会上说：“假若让这座城（指北京）被抢光、烧光也是应得的惩罚。”他竟以天父的名义呼唤复仇，他说：“愿天父明鉴，凡是教徒流过血的地方都应该有一个复仇的纪念物，复仇只是公义的别名。”^①

其次在签定和约的问题上，传教士们都有其各自的政治见解，9 月 7、8 两天，在上海新天安堂召开了两次“上海教士联合会”的会议。会议由联合会会长卜舫济主持。关于是否瓜分中国的问题，总的说，传教士们大体分两种意见：一种主张瓜分中国，而且认为按原有各国势力范围的划分，瓜分早已实际存在。另一种意见反对瓜分，认为“维持中国的完整”可以保护“门户开放”保证各国贸易机会均等。会议向各国政府提出建议如下：“谨建议解决方案目标：第一，合法皇帝光绪复位；第二，履行对差会的条约义务。”^②他们要保留一个合法皇帝以利于列强在中国作太上皇。1900 年 10 月 31 日，上海基督教联合会召集各教派传教士对瓜分中国问题进一步展开辩论，大多数传教士倾向于不瓜分。概括不瓜分的理由是：“瓜分对传教士的工作将是有害的。一是因为瓜分将更加

^① 《北华捷报及最高法院与领事馆公报》65 卷第 727—730 页。

^② 传教士会议《北华捷报》65 卷第 555 页。

激起中国人排外，他们将比以往更加憎恨我们；二是基督教和政治相连的印象将无法从中国人的脑海中消除，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解除他们认为我们的目的是为瓜分和掠夺铺平道路……”^①

加拿大长老会季理斐在辩论会上的长篇发言，从政治的理由、商业的理由和传教的理由，反对瓜分。他说：“我们根据政治的理由反对瓜分。欧洲各国在分割土地上不可能达成协议。瓜分对象的幅员如此辽阔和物资如此丰富，成为和平分赃的阻碍。……你们说已经有一个大洲被欧洲和平地瓜分了，为什么中国不可能呢？但这两种情况并不完全相同……非洲大部分是不毛之地……当然应该将非洲放在文明的保护之下；即或有任何反对的话，非洲人不会作出有效的反对。可是非洲不能与中国相比，尽管说中国包含着多种民族，它仍是拥有几亿人口的统一国家，有说不尽的财富，并能在排外上团结一致，那种反抗的力量足以使西方各国在开始作这件办不到的事以前感到踌躇。即使不谈中国人的反抗，只要一两个头等强国拒绝参加这种掠夺，联合行动的时机就会过去，企图瓜分的希望也将消失……另有商业的理由反对瓜分。由于西方商人已经明文表示反对，我们不需要在这方面讲得太多。他们反对的最明显的理由是：瓜分意味着在分割了的中国大部分土地上将敲起门户开放的丧钟……但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不能忽视瓜分对中国传教事业的影响……在俄国的地区内基督教（新教）差会不能希望有长久的寿命。在法国的地区内，我们可以预料到

^① 《教务杂志》1901年1月第14页。

天主教对基督教的攻击将采取比向来更为尖锐和不容忍的方式……”^①

有些著名的有影响的传教士更是著书立说，把他们当时的意见写得淋漓尽致。

当八国联军初占领北京时，丁韪良就认为：“……战争必须进行下去，直到满清政府同意照办，并对不再发生任何类似暴行作出适当保证的时候为止。必须解除清政府的武装……有必要毁坏中国的兵工厂，并厉行禁止军火的输入。中国应被迫地走在那些‘不再学习战事’的國家的前列。”^② 清政府宣布投降后 9 月 18 日在上海天安堂发表演说中丁韪良还强调：“必须解散中国军队，接收所有的兵工厂或加以摧毁。当你抓到了这只老虎以后，就必须拔掉它的牙齿，斩掉它的爪子……”^③

丁韪良提出的改革中国的方案要维持中国一个傀儡皇帝，一切却由外国人辖制，把中国完全降为殖民地地位。他提出：“……
3 皇帝的变法维新计划应重新恢复，在列强的认可下予以推行。
4 由列强划出各自的势力范围，每个国家指派代表来管辖自己范围内各省督府的行动。对中国来说，完全独立是既不可能又不适当……”

丁韪良绝不忘为美国在中国夺取利益。他写道：“……假如让我在中国境内挑选任何地方以代替战费的赔偿，由中国割让给我们一个‘立足点’，那最好是海南岛，一个在香港与菲律宾之间的踏

① 《教务杂志》第 32 卷，第 10—14 页。

② 《北京使馆被围记》第 143 页。

③ 《北华捷报》1900 年 10 月 3 日，第 729—730 页。

脚石。……那样我们就有一个踏实的基地，使我们在有关中国前途的一切重大问题上拥有发言权……为了取得海南岛而进行谈判，也不是越理非分的侵略……”^①

英国浸礼会李提摩太的政治主张是把中国变成各列强共管的殖民地。他写道：

“既然中国现在没有一个中央政府是列强能依靠来遵守条约的……列强就不得不帮忙组织一个新的联合中央内阁，以便有可能使中国人和外国人同样得到永久的和平与繁荣。

① 这个联合内阁得由一半外国人和一半中国人共同组成。

② 凡能够派遣一万人以上的常备军（或相当于一万人的常备军）在中国维持治安的国家，在中国的新内阁中得派代表二人参加。

③ 目前应责成各省的总督和巡抚维持各自辖境的治安，停止派遣军队帮助清政府……”^②

本来在瓜分中国的问题上，各帝国主义国家早已剑拔弩张，只是在镇压义和团反帝运动中，暂时联合妥协。义和团运动被武装入侵镇压了，但各帝国主义国家还是感受到中国人民反抗力量之巨大。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说：“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和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③ 因此他们协调彼此的矛盾，一齐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最终，清政府被迫与英、俄、美、法、日、德、意、奥、西、比、荷 11 国于 1901

① 同书第 153—157 页。

② 《李提摩太通信集》第 50 号。

③ 《义和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 3 册，第 244 页。

年 9 月 7 日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条约规定清政府向各帝国主义国家认错道歉，还要严惩“得罪”帝国主义的官员；条约规定以海关税、通商口岸常关税及盐税作担保，赔款本息总数达 10 亿两白银；拆除大沽炮台及从北京到大沽沿线全部炮台，在天津周围 20 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允许在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 12 处战略要地驻扎外国军队；还禁止军火及制造军火的原料运进中国两年，必要时得延长；在北京东交民巷设使馆区，由帝国主义国家派兵把守；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任何具有反帝性质的组织，违者一律处死，凡对人民反帝斗争镇压不力的各级官员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从条约内容不难看出传教士们出谋划策的影响。

这些历史资料让我们拨开传福音的传教士头上的光环，看到他们的真面目。

传教士与八国联军

周延胜

1900年6月,英、法、美、德、日、俄、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这里,他们烧杀抢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成果遭到空前破坏,千年古都顿成人间地狱,“尸积遍地,白骨纵横”。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罕见的人类大悲剧中,某些西方传教士充当了罪恶的帮凶和直接的刽子手,他们完全背离了宗教的主旨,亵渎了“天主”的“圣灵”,是人类文明史的耻辱。在历史面前,他们难辞其咎。下面从几个侧面看看在八国联军侵

华期间，西方传教士的所为。

首先，直接参加军事行为，第一个表现就是充当军事间谍，为侵略军提供情报。在八国联军侵入天津时，英国籍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un）接受了侵略军司令部的委任，正式编入军队，隶属于军事情报局，成为“英国远征军”的成员。作为“向导”领着八国联军从天津一直打到北京。他还驱使信徒搜集军事情报，如清军大炮口径和数目，战壕、水雷和地雷情况，并在地图上标出；为侵略军修筑战壕，把自己管辖的教会馆舍让给英军当兵营，保护侵略军等。宝复礼后来还亲自著书，炫耀自己的功勋，得到了英国政府和差会的推崇。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也充当了侵略军的侦探，为联军将领出谋划策，派遣教徒加入法国军队，他控制的教会还为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八名传教士被委任为连队长。樊国梁的行为，深得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赏识，他自己也感到荣耀：

“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继续了自己的服务工作，和过去一样，得到一份军饷，并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为天主和为法国的光荣而工作。”^① 参加军事行动的第二个表现就是行凶杀人。美国传教士梅子明，在联军进京后，武装了二百多名教徒，在抢劫了一些富户以后，又疯狂地喊出“以人头抵人头”的口号，在任邱的一个村庄里，竟有 680 多名无辜百姓遭到杀害！^②

其次，传教士参与了洗劫京城的行为。就在联军攻陷北京的

① 《传教杂志》1902年。

② 《中国教案史》548页。

第二天，即 8 月 16 日，樊国梁发出布告，动员抢劫。他在布告中命令：“每户所抢财物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八天之内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 50 两银子（合 175 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要；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超过 50 两银子者，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所余之物归公；如所抢之物，不论为实物或银钱，价值超过 500 两银子（折合 1750 法郎）者，神父皆不能听其神功，为之赦罪，此赦罪之权保留于主教及副主教之手。……你们要把抢来的东西直接归公，堆放一处，由我们进行统计，以作为中国政府交来的赔款中的一部分预支。”^① 8 月 17 日，樊国梁主使教民闯入皇城根的礼王府，肆意掠夺破坏，把礼王府抢得四壁空空，所得元宝，仅樊国梁自己承认的就达 12 万两。据亲历其事的老神父和老修女作证说，樊国梁还到庆王府抢银子和宝物，还从大太监李连英的住宅抢了许多古书、花盆和玉器等物，在北堂院内堆积如山。北堂里的教民也倾巢出动，四处掠夺，教士们为士兵作向导，抓店铺掌柜当仆役，将抢来的东西背到北堂去。樊国梁的所为，不仅中国人民痛恨，甚至遭到了正直的法国国会议员的不满。

再次，传教士鼓吹瓜分中国，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义和团运动大规模兴起后，曾露骨地指出：“我们是狂热异教徒的牺牲品，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帝国瓜分了吧！这可供中国有一个新秩序的世界”。^② 他怂恿美国对华提出领土要

① 《遣使会年鉴》。

② 《花甲记忆》。

求：“瓜分中国是自然的扩张，正如俄国向西伯利亚，美国向西部伸张一样。”^① 美国传教士卜舛济还著文具体阐述立即瓜分中国的五大好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他的《通信集》里，还提出了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具体实施方案，其主旨是组成一个完全听命于列强的中国内阁。这些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给予的种种特权，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国的灾难更加深重。

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看传教士在策划和促成《辛丑条约》中的作用。在勒索赔款问题上，樊国梁等传教士在其政府提出的要求以外，列出所谓教会受损清单，迫使清政府增加赔款。另外，以被杀传教士为借口，要求法国公使对华索取“精神赔偿”，迫使清政府出卖更多的主权，后来确实成为《辛丑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篇幅所限，类似上述的事例不再一一举出。传教士的“特殊贡献”受到了本国政府以及所辖教会和侵略军司令部的表彰，主教樊国梁就得到教皇赐以“宗座卫士”的梵蒂冈最高荣誉头衔，还受到法国总统和外交部长的宴请。而他们在八国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一系过程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掉的。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① 《北京使馆被围记》。

穿道袍的帝国主义强盗

——义和团运动时期洋教士在北京的罪行

陈月洁

2000年是义和团运动 100 周年，100 年前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震撼中外的反帝爱国运动。这是中国人民反对瓜分斗争达到的高潮，也是多年来遍及全国反对外国侵略者利用宗教侵略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教案。1900 年夏季，北京成为这个运动的中心。中国人民直接与帝国主义联合武装相对抗，无数中华儿女用生命和热血谱写了一曲悲壮的颂歌。

义和团运动是把反对利用宗教侵略、反对列强瓜分和抵抗八国联军结合起来而进行的民

族自卫战争。它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巨大力量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性，表现了中国人民敢于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概；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狠狠地教训了入侵者，对中国当时面临的亡国危机起到了挽救的作用。周恩来对义和团运动曾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说“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为争取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献出生命和鲜血的义和团先烈们，丹心碧血，将青史永垂。

为“基督文明”而战的八国联军(许多传教士也不例外)在攻打北京和北京陷落后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的全部罪恶是罄竹难书的；西方在华的强力传教与“护教”军队在中国人灵魂所造成的极端痛苦与屈辱，中国人民也是不会忘记的。本文仅就义和团运动时期，洋教士在北京的暴行，略作叙述，以兹纪念义和团运动并缅怀先烈。

义和团运动期间，洋教士无恶不作，始终与中国人民为敌。他们从干涉、参与武装镇压到抢劫，直到设计进一步侵华方案，欠下了中国人民数不清的血债。

19世纪末到1900年春，义和团在山东、直隶和京津迅速发展，帝国主义大为震惊，列强公使纷纷出面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严惩义和团，以后又发展成八国联军侵华。洋教士也兴风作浪，推波助澜。

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所谓中国问题专家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他早在山东时就用各种手段抢占房地产，以扩展他的地盘。他以《字林西报》专栏作家的身份，大写文章、广造舆

论、诬蔑和谩骂，并要求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他于 1899 年 12 月 2 日，向驻京美国公使馆发出了下列电报：“拳民叛乱在山东、直隶两省的 20 个县迅速蔓延。枪杀、放火、暗杀之事有增无已，其明显目标在杀害基督教徒，驱逐所有外国人。除非四国公使联合起来，使用压力，则庞庄一临清一济南府的美国人，认为形势是毫无希望的”。^① 同年《字林西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北方火灾临头》。他疾呼“若不从速扑灭，则全帝国将无外人可居之地，甚至连将来的势力范围也就没有了”。明恩溥还亲自出面控告鲁西道台古灿升，平原县令承泗、高唐州知州李恩祥、和县屠乃勋和恩县的秦应举等，“惩办拳民不力”。袁世凯任代理山东巡抚后，他又和袁商讨有关镇压“大刀会”事宜。

李提摩太也竭力参与帝国主义列强镇压义和团的活动。1900 年春，李提摩太到美国出席“环球基督教会议”和“布道差会会议”。在会上，指陈中国局势的严重，预言不久将有“变乱”发生，要求各个传教机构采取共同行动，设法弭止。接着又到波士顿、华盛顿、纽约州等地，发表演说，会见美国政府要人，请求美国干涉正在中国兴起的义和团运动。返华途中，他听说义和团运动已经由直隶发展到许多省份，便发电给上海英国总领事，转请英国首相要求中国各省督抚对在华英人的安全负完全责任，如有事故发生，惟该督抚是问，提供了“东南互保”思想的端倪。

1900 年 5 月 19 日，樊国梁致函毕盛，因义和团在京师及直隶

^① 麻海如：《华北公理会七十五年》，第 64 页。

发展迅猛，请法国武装人员驻北京，“保护我们和我们所有的东西”。^①

1900年5月末，传教士们一再向荣禄、裕禄、顺天府尹和总理衙门发出紧急函件，要求他们迅速镇压义和团，保护洋教势力。樊国梁写信给荣禄说：“……却是保安、安肃、安兴、新城、霸城、霸州等处拳匪日众，凶焰甚炽，眈眈虎视，……本主教目击如此情形，不得不为之太息流涕也，而乞阁下遇便代为奏明皇太后，设法救教民于水火之中也”。“若不作速想法严办”的话，列强将“护教弭乱”，将要“仿效占据胶州之故事”，各国军舰“将衔尾而至”，“数平匪乱”。^②

1900年6月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7月14日，天津陷落，在准备向北京进军时，联军搜罗了不少传教士充当侵略军的向导、翻译、情报官等。

樊国梁在给巴黎遣使总会白登卜的报告中说：“我们在京城有一所中法学堂，为法国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官，其中有八名是精通中国话的传教士，……这是为了提供军队将领们所需要的情报，这些情报对他们来说是很有用处的，他们都受到法国将军们的感谢和致意。在此我还要向你报告，我手中已掌握义和团头目的全部名单，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逃遁的去处。”^③

法国远征军伏依龙军团司令福里在给天主教在北京教区副主

① 《蓝皮书》，第72页。

② 樊国梁、林懋德：《信稿录存》1900年，《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3期，第23页、26页、20页。

③ 《遣使会年鉴》1902年（今订本），第71页～72页。

教林懋德的信中透露：“自从联军开到直隶境之后，你非常乐意派遣传教士们以随军司铎身份加入军队，我们对他们在各方面无不尽量照顾。……他们离开自己传教的职务，在各种情况下，特别是在作战期间为军队服务的热情和诚意，是值得我们十分感激的”。^①

除天主教传教士外，基督教一部分传教士也有人担任情报官的职务，丁魁良、明恩溥等都脱去了道袍，成为翻译官，并拿起了武器。义和团开始包围使馆时，丁魁良搬进了英国公使馆大院，领了毛瑟枪，参与巡逻和枪杀义和团。明恩溥也借华北公理会举行年会之时，跑到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与丁魁良等一起荷枪实弹地镇压义和团。

在天津的英国传教士宝复礼被英国远征军雇用，任远征军情报处官员，随联军进攻北京，他还带了几名中国教徒充当便衣密探。据他自己说：“情报处负责绘制每天的行军地图，……图上标明每一村庄和道路，以及密探所能获得的其他情报，包括敌方的炮位、炮数和战壕；事实上，这张行军地图对军官们的重要性等于航海图对船长一样。……在我们出发前 5 天，首先派出两名基督徒学生充当密探，……当他们回来向我们报告时，我把他们带到司令部，……将他们提供的全部情报在地图上——标明。……这已成为每天的日常公事”。^② 宝复礼在跟随联军打到北京的过程中犯下了一系列的罪行。据他自己的叙述：“这时我们已捕获了不少俘

^① 《传教杂志》1902 年合订本，第 123 页。

^② 《传教杂志》1902 年合订本，第 123 页。

虏，……通常是把他们编成 12 人或 20 人一队去拖船或推车。……凡敢于逃跑的就立即射杀。……我的一部分任务就是审问这些俘虏，把所得的情报给情报处”。^①他又说：“8 月 12 日，参谋长巴鲁将军把我叫去，……把窦纳乐的一封急信出示给我看，……内容是指示攻入北京城最适宜的地点，并附有一份作战计划书。……我认为他要我们从永定门打进城去的建议是错误的；首先，这样做使联军多走三英里路，这将浪费时间；其次，永定门要比东南城沙窝门坚固得多。我们建议从沙窝门（即广渠门，为外城的东门）打进城去。我的意见被采纳。……13 日黄昏，先头部队出发后，我接到命令，叫我次日凌晨两点钟跟随将军率领步兵团出发攻城”。^②实际上宝复礼早在被英军雇用前就已为他们效劳了。1900 年 7 月 14 日八国侵略军攻陷天津。宝复礼奉命带一名骑兵上尉去搜查总督（裕禄）衙门，把总督留下的一些重要文件带走。

从以上可知，所谓“传播基督福音”的传教士已撕去其伪装，成为八国侵略军的一部分，直接参与了武装侵略的行列。

八国联军攻下北京后，烧杀掳掠，“京内尸积遍地，腐肉白骨纵横。”^③他们在北京下令大杀、大抢、大烧三天，实际上岂止三天。侵略者的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的。就连后来担任八国联军总司令的瓦德西也说：“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④当时各国在北京的

① 《跟随联军从天津到北京》，第 80 页 ~ 81 页，第 101 页 ~ 105 页。

② 《跟随联军从天津到北京》，第 101 页 ~ 105 页。

③ 《义和团》第 1 册，第 90 页。

④ 《义和团》第 3 册，第 34 页。

传教士，各国公使及其随员，也都趁火打劫，大发横财。

以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为首的传教士们，在法国公使的同意下，下令教徒抢劫，樊国梁自己也参与这一行动，从 8 月 18 日始，连续抢劫了八天。1901 年樊国梁同巴黎《时报》记者谈话时承认了这一事实。他说：“我们应该不应该下令抢劫呢？我于是去会见法国公使，……公使认为这个请求是合理的，就立刻准我所请”。^① 樊国梁于是公然出了“布告”下令教徒抢劫，并规定教徒抢劫不满五十银两的，不用上缴。超过五十银两的，一切抢来之物都应归公，堆放一处，然后大家均分。命令如下：“(1) 每户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后八天之内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五十两银子（折合 175 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需。(2) 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如超过五十两银子的，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多余之物归公”。^② 据美国《纽约先驱报》1901 年 1 月 9 日的报道称樊国梁仅在一处王府立山家里就抢去财物珍宝约值 100 万两银子。樊国梁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抢劫，但他只承认抢劫了“二十万三千零四十七银两又五十枚”。^③ 八国联军是同天主教传教士一起进行抢劫的。1900 年 12 月 14 日，法国的《北方醒报》登载了某回国士兵的陈述道：“从北堂我们开向皇宫，修士们跟着我们去，……他们怂恿我们屠杀、抢劫，……我们行抢都是替教士干的。我们奉命在城中为所欲为三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实际抢了八天。教士们做我们的

① 《遣使会年鉴》，1902 年（合订本），第 69 页。

② 《遣使会年鉴》1902 年（合订本），第 229 页 - 230 页。

③ 《传教杂志》1902 年（合订本），第 121 页 - 123 页。

向导。我们过一家就随便拿东西，我们把店掌柜抓了当仆役，教士们把抢来的东西，让他们背着运到北堂去了……”。天主教的传教士还到各个县去勒索巨额赔款。

基督教传教士和天主教传教士一样疯狂地参与了抢劫的活动。丁懋良也是抢东西的强盗。他对当时的北京情况是这样描写的：“有一大半居民放弃了他们的住所，向城外逃走了。由于他们仓惶逃跑，他们的衣橱里塞满了值钱的皮货，地板上撒满了最华丽的绸缎，有些地方满地都是银锭。多么诱惑人去抢劫啊！”^① 丁懋良承认自己“干了一点小小的抢劫”。^②他还描述了美国公理会都春圃牧师在一处王府抢劫的情况。他说：“美国公理会在一处王府驻扎，都春圃牧师发现该处和附近一带房屋里有大量的皮货、绸缎和其他值钱的东西。他向军队和使馆做了通告，把这些物品拿出来公开拍卖’。”^③

美国公理会梅子明牧师的抢劫活动更为疯狂，可谓是典型。他在使馆解围前就已动脑筋要抢占一座蒙古王府。8月14日后，他就挑选了他以前住处东首的那座蒙古王府，梅子明会同几个传教士，带领200余名教徒占领了王府。他们首先抢劫王府里的所有武器，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在他的指挥下，兵分两路，一路在王府里搜劫，一路到王府周围的各个富户家中进行抢劫。他的一部分亲笔信，反映了他当时的强盗行径。如8月20日从蒙古王府他写的信中称：“由于我是王府的头头，我突然变成了一个显赫的人物，周围的邻舍把我当做一个王子对待”。在8月29日的信中

① ②③丁懋良：《北京被围日记》，第131页，第135页，第136页-137页。

他说：“今天我在这里前主人藏财宝的阁楼中发现大量的珠宝、纹银和四只表。我们将尽快地把这些财宝全部运到美国公使馆的保险库中去”。9月18日的信说：“福西士上尉带了二百名骑兵到北京东郊沙河和别的地方进行扫荡，我担任向导和翻译。我们放火烧了两个义和团总部，摧毁了一些军事设施”^①。梅子明还将劫物进行公开拍卖，甚至私设公堂审问群众，进行逼供和敲诈勒索，并要他们供出义和团人员的去向。他还不时地跑到乡间去强迫派粮、派食物，要他们运送到侵略军的军营中去……等等。

传教士们还到处任意勒索赔款，“用人头抵人头”杀害无辜农民和索取银两。从1901年到1902年，仅北京和直隶白筹赔偿给教堂和传教士的银子竟达11 124 012两，这些都是在签订条约之外的额外勒索。

对于传教士们的强盗行径，李佳白在1901年美国出版的《论坛》杂志上，发表题为《抢劫伦理学》一文中却为之辩护。他说：“抢劫是战争的战利品，倘若中国人不愿被抢劫，他们就不应该发起这场战争”，“抢劫是一种高级伦理学”。他还对自己未能进行更多的抢劫表示遗憾。可见这位传教士的帝国主义本质。

美国著名的进步作家马克·吐温对当时传教士们在中国的暴行作了义正辞严的谴责。他写了题为《给坐在黑暗中的人》的长篇文章，发表在1901年2月出版的《北美评论》上。他首先引用了一段1900年12月24日《纽约太阳报》刊载的该报记者钱伯兰从北京梅子明处直接采访的消息：梅子明“已为每一个被杀害者索到三

^①傅恒理：《梅子明传》，第190页～191,195页～199页。

百两银子，并强迫对所有被毁损的教徒财产给予充分的赔偿。他还征收了相当于赔款十三倍的罚金。梅子明先生声称：他所索取的赔款，比起罗马天主教来，还算是适度的。天主教除了要钱外，还要‘用人头抵人头’，他们为每一个被害者索取五百两银子”。

接着，马克·吐温评论说：“梅子明先生为了清算别人的罪行，从贫困的中国农民身上榨取十三倍的罚款，因此让他们、他们的妻子和无辜的孩子们势必慢慢地饿死，而可以把这样获得的杀人代价用于传播福音。他这种搜刮钱财的绝技，……正具体地表现出一种亵渎上帝的态度，其可怕与惊人，真是在这个时代或任何其他时代都是无可比拟的。”文明之福托拉斯，用聪明谨慎的手段来经营，是一个聚宝盆。比起世界上的人所玩弄的任何把戏，这里面有更多的钱，更多的领土，更多的宗主权，以及更多的别种利益。”马克·吐温的正义谴责击中了要害，使这些干坏事的传教士张惶失措，美国的反动势力也为此慌了手脚。

不仅如此，传教士们还为帝国主义强盗设计了义和团运动后如何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方案。

1900年7月14日，李提摩太为列强拟订了一份“如何在中国恢复秩序”的“意见书”，印发给西方各国政府机构参考，重弹他在维新运动期间提出的“国际共管”的老调，其内容如下：“目前中国既然没有一个被各国信任并能执行条约义务的中央政府，北京政权已通过一个秘密策划使全国陷入战争状态，……各国被迫必须组织一个新的、能够维持永久秩序、使中国人和外国人获得持久和平与繁荣的联合内阁。1. 这个内阁将由一半外国人和一半中国人共同组成。2. 每个能派遣10 000名常备军驻扎在中国的大国得

派 2 人为阁员。3. 中国的总督和巡抚得推派同等数目的人（譬如说 2 人）为阁员。这些人必须是列强所绝对信任的。4. 这个内阁的主要任务是：（1）保护各国人民的生命财产；（2）保障中国的领土完整；（3）毫无歧视地保护所有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一个或几国的利益；5. 新内阁将不受任何一国的直接管辖；6. 应组织一个国际法庭处理这个联合内阁产生的一切问题；7. 在过渡时期责成各国督抚负责各自辖区内的秩序，不可派遣军队援救北京。”^①

同年 7 月，丁韪良也草拟出《告基督教世界各国书》，叫嚷：“让基督教列强把这个异教的帝国（指中国）瓜分了，使中国跟着新世纪的到来而出现一个新秩序”。但不久，他又改变了主张，向各国公使提出新的主张。9 月 15 日出版的京津《泰晤士报》上正式发表了他的“以华制华”的方案。其内容有：“1. 为了根除慈禧太后制造的灾难，在各大国共同拟定下，将慈禧放逐，恢复光绪帝的合法权利；2. 取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颁布的一切政令，包括她任命的党羽的委任状，新政权许可者除外；3. 恢复光绪帝的改革方案，在各国批准后执行；4. 让各国划分势力范围，指派代表控制在其势力范围内的各省督府的行动。”丁韪良进一步提出：“对中国来说，完全的独立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上述计划可使现有的机器保持运转，避免无政府状态，有利于进步，并可获得中国人中间最开明的人士的支持。另一个选择是推翻清朝，由帝国进行正式瓜分，这是一个包含长时期和痛苦摩擦的过程。按照我上述的方案，各国可有时间酝酿他们的政策，推动逐步改革，这比公开的或暴力的

^① 《李提摩太通信集》，第 50 号。

吞并所希望获得的利益要更为广泛。利用中国人治理中国人要容易得多，而用相反的办法不可能达到目的”。^①

同年9月28日，丁懋良在路经上海的返美途中，在上海的新天安堂(英侨礼拜堂)发表演说，又重申了上述的主张，并提出了一些“新”的“意见”。即“若能有一个由外国官员组成的强有力的委员会来指导这位年青的皇帝进行治理中国，和平与秩序就可以恢复。像目前这样的暴乱必须要采取预防的措施。为此目的，就必须解散中国军队，接收所有兵工厂或加以摧毁。当你抓到了这只老虎以后，就必须拔掉它的牙齿，斩掉它的爪子。……”^②这一番话中其狰狞面貌完全暴露无遗。

很显然，丁懋良的新“计划”，是要求由各国组织“联合委员会”，通过扶植傀儡来控制清政府，并实施对中国的“改革计划”，使中国成为各帝国主义共管下的殖民地，而所保留的仅仅是傀儡政权的外壳。

丁懋良后来又写了《北京被围，中国抵抗联军》一书，除了恶毒地攻击义和团外，还为美帝国主义出谋划策。他在提出“以华制华”政策之后，又为美国提出了领土上的要求。他说“假如让我在中国境内挑选任何地方以代替战费的赔偿，由中国割让给我们一个‘立足点’，那最好是海南岛，这是一个在香港与菲律宾之间的踏脚石。它只有西西里岛的一半大，但在出产方面可能是同样富饶。那样我们就有一个踏实的基地，使我们在有关中国前途的一切重

① 丁懋良：《北京被围目击记》，第145页～147页。

② 《北华捷报》，1900年10月3日，第729～730页。

大问题上发言权。60年前英国要求香港岛并不是为了掠夺土地，它所要的是一个根据地，一个转动世界的支点。对我们来说，为了取得海南岛而进行谈判，也不是越理非分的侵略。”

“……美国应当像英国一样，不因惧怕发展而放弃它光荣的卓越地位。……我们将领土扩展到太平洋沿岸，并将我们的势力延伸到日本和中国，是由于自然的伸展。……在中国，直到目前，我们的政治影响一直不够显著，但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机会出现了，上帝不允许我们任其消逝，而不加利用。在我看来，我们并不需要大块土地作为我们的立足点。如果一个海南岛不够称心的话，再有一个大陆上的海口就可满足我们的需要了。也就是说，有了一个作为我们海军舰队的避风港，一个驻防阵地，使我们军队为了反对某个贪欲的国家企图吞并中国时，或是为了镇压另一次像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种世界的暴动时，有一个集结的所在”。

丁韪良揭开了“善良的传教士”面纱，显现出了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出谋划策的殖民主义者的原形。

以上仅是洋教士在北京犯下滔天罪行的一部分，已可见他们侵略中国的活动，猖狂到了何等程度。洋教士参与镇压义和团的罪证俱在，不容抵赖。

百年来义和团运动研究的再审视

孙占元

1900 年和 2000 年两次世纪之交的 100 年间，义和团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备受关注或难以忽视的重要事件，引起了研究者们颇为浓厚和较为广泛的兴趣。如果以 1949 年新中国的建立为界标，对于义和团的研究可大致分为前后各 50 年两个时期。对这两个时期的义和团运动研究作概要的回顾，会有助于对义和团研究的总体把握和审视。同时，展望 21 世纪的义和团运动研究趋向，也成为学者们探讨的一大课题。况且，无论是从史学理论界近几年提出的“史学降落民间”的呼吁

来说，还是自唯物史观指导了数十年间的史学研究来看，义和团的研究都应纳入对“群众自发”斗争的范畴加以开拓性的研究，甚至也可以从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的角度加以考察。因此，对百年来义和团运动研究的再审视，不但可以体察与把握 20 世纪义和团运动研究的轨迹，而且能够进一步思考与明晰 21 世纪义和团运动研究的发展趋向。

一

从义和团的兴起到新中国建立之前，出现了数量比较可观的一批或考察性、或叙述性、或研究性的成果，为义和团运动研究起步打下了基础。

在义和团还处于萌发阶段时就已经有人开始对其进行考察或研究了。清朝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为维护统治秩序，着意于探寻义和团的起源和流向问题。如山东巡抚张汝梅在 1898 年上奏中认为义和团起源于乡团，吴桥县令劳乃宣于 1899 年撰《义和拳教门源流考》，继任吴桥县令支碧湖于 1900 年撰《续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为统治阶级出谋划策。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时，社会上各政治派别极为活跃，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申报》、《中外日报》、《国闻报》、《同文沪报》、《清议报》等都有大量文章谈及义和团^①，绝大多数文章把义和团称为“拳匪”“拳乱”。

^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第 171—237 页辑录了当时国内报纸对义和团的舆论，内容涉及义和团的起因、发展、评价、教案问题等等。

随后，分别属于立宪派或革命派的人物也对发生不久的义和团运动予以评价，同时分析中国的政治形势，表明自己的态度与把握自己的策略。梁启超作为立宪派的代表人物写有《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暴动与外国干涉》等文章，站在君主立宪的立场上，反对民主革命，连带攻击义和团。在他看来，革命会引来外国干涉，八国联军侵华就是义和团暴动召来的，而且人民大众素质还太低，没有谈论革命的资格。革命派中的许多人则肯定了义和团的积极作用，1901年《开智录》发表了《义和团有益于中国说》。该文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导致了义和团的发生，赞扬了义和团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指出义和团有益于中国，义和团运动后出现的政治形势是革命者可以利用的大好时机。这篇文章发表在义和团运动惨遭失败、朝野上下许多人对义和团是一片诅咒和诬蔑的时刻，显然别具一格。孙中山也对义和团作了重要评论，他一方面批评义和团的愚蒙，由排外之心而出狂妄之举，另一方面又从义和团看到了蕴藏在下层群众中的巨大力量，是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严重障碍^①。还有章太炎、汪精卫等人也以分析的态度对义和团运动进行了评价。应该说，这种分析是可取的，看到义和团愚昧落后的一面有利于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肯定义和团的巨大力量又使革命党重视会党在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中的作用。

这一阶段为后人留下了大量有关资料，各种上谕、奏折、函电、笔记、日记，记载了义和团发生前后的情况，如《义和拳教门源流

^①孙中山：《支那保全分割合论》，《孙中山全集》第1卷，218—2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考》、《教案奏议汇编》、《有关“东南互保”资料》、《庚子海外纪事》、《庚子教案函牍》、《拳案杂存》、《山左教案函牍》、《拳匪纪略》、《辛忠纪略》、《平原教匪纪略》、《津乱纪实》等等^①。它们虽然多数带有统治阶级的偏见，但不失为价值较高的史料。

这一阶段，人们对义和团的研究刚刚开始，显得比较粗糙，虽然研究的面已涉及到源流、起因、地位、作用和性质等方面，但总的来说还是不系统的。不过毕竟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从辛亥革命后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国内史学界对义和团的研究出现了初步繁荣，整理出版了许多有关的研究资料，出版了几十种研究著作。形成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方同以王芸生、李鼎声等人为代表的另一方对义和团评价的截然不同的观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些学者开始采用唯物史观研究义和团运动，使研究工作更加深入，成效也较显著。

这一阶段，大量有关义和团的研究资料得以整理出版。主要有：《清实录》、《东华续录》、《清史稿》、《光绪政要》、《光绪条约》、《续碑传集》、《碑传集补》、《清季外交史料》、《清史纪事本末》、《清鉴辑览》等，还有《清稗类钞》、《国闻备乘》、《掌故拾零》、《满清外史》、《清代轶闻》、《晚清祸乱稗史》、《清朝野史大观》等稗史掌故类史书，其中都有专门章节记述了义和团运动。还有关于义和团的各种专门资料，如《拳时上谕》、《庚子京师褒卹录》、《庚子纪事长

^① 《义和团书目解题》，资料丛刊：《义和团》（四）529—59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札》、《庚辛纪事》等等^①。

辛亥革命后，许多学者考察了义和团运动的全过程，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看法。1913年出版的《庸言》杂志刊载了罗惇颐《庚子国变记》、《拳变余闻》两篇文章，这是最早系统记述义和团的文字。两文互为补充，反映了义和团运动概貌。以清政府为中心记述义和团，对帝后两党与主剿和主抚两方力量的对比消长，义和团的源起与组织和发展状况等都有所记载。行文中处处称义和团为“拳匪”“拳祸”“匪党”，暴露了他对义和团运动的偏见。^②

梁启超在192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六章《史迹之论次》中，用了很长的篇幅论及义和团运动。他用“因缘果报”的方法来分析义和团，力图从历史事件中寻找必然的联系，这是一种新的史学理论方法。而且他注重了民族性和心理史的研究，为史学研究开辟了思路，拓宽了领域。他的史学研究对当时及后世都有很大影响。同时代的一些有关义和团的著作，如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大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等，在对义和团的评价中大体沿袭了梁启超的看法。梁启超认为，义和团之“因”，在心的方面为排外的心理和迷信的心理，在境的方面为外力之压迫，政纲之废弛。义和团之“缘”，又分亲缘、间缘，亲缘又分主缘和助缘，戊戌政变、教案问题等都是义和团运动之缘。义和团之果，主要有：山东直隶团匪组织蠢动，两省官长纵容，北京王大臣附和，对全世界宣战，戕杀教徒及外国人，围攻使馆，毁坏铁路等。义和团之报则为：八国

^① 《义和团书目解题》，资料丛刊：《义和团》（四）529—59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② 罗惇颐：《庚子国变记》，上海，神州国光，1936年版。

联军入京、东南互保、俄占东三省、辛丑和约、清末新政等^①。

有一些史学家对义和团运动表明了与梁启超等人不同的看法，如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陈捷的《义和团运动史》和陈功甫的《义和团运动与辛丑和约》等，对义和团的起因、性质、作用都作了较为客观的分析评价。如王芸生指出，甲午战后割地赔款造成排外仇教的感情洋溢全国和清王朝吏治败坏为义和团发生的主要原因，他肯定了义和团在近代外交史上的重大意义，阻止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企图，对中国有保全之功^②。李鼎声也认为，义和团是一种反帝国主义运动，反映了民众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痛恨^③。他们对义和团的分析评价比较符合客观实际，也比较公正。

在这一阶段，义和团研究中非常引人注目的新进展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无产阶级革命者开始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考察中国近代的历史，开始系统、全面地研究义和团运动，不但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还出版了一些专著，开拓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与义和团研究的新局面。

早期共产党人对义和团的研究始于 1924 年。这时，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指导着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中国人民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洗礼，觉醒程度不断提高。1924 年，全国出现收回关税自主权、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高潮。从 1924 - 1927

①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 145 - 150 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年版。

②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四卷，天津大公报社出版部，1932 年版。

③李鼎声：《中国近代史》，上海，光明书局，1946 年版。

年,每逢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之日的国耻纪念日,全国各地都要举行集会以纪念国耻。《向导》、《中国青年》发表“九七”特刊,专述义和团。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彭述之、肖楚女等共产党人用唯物史观对义和团进行了重新评价。探讨了义和团的起因、性质、历史地位、失败原因等问题,推倒了强加在义和团头上的诸如“匪”、“野蛮”等诬蔑之词,认定义和团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之悲壮的序幕,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探讨了义和团的起因,指出义和团是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必然结果,从全民族解放运动的高度上给义和团以肯定评价,从历史的、阶级的等原因上分析了义和团失败的必然性。毛泽东对义和团的论述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他肯定义和团同抗日战争一样,“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①他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革命动力、革命对象,及有关农民运动的一般论断,为义和团研究的深入展开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

1940年5月,杨松、邓力群合著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大纲》问世,这是用马列主义方法和观点研究分析中国近代历史的初步尝试。大纲分析了义和团爆发的原因、起源、思想、组织、阶级基础、发展经过、失败的原因及教训等。认为义和团反映了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和农民与封建贵族地主之间这一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矛盾,由于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被反动的清政府利用,很快失败,并未表现出反封建的性质。

^①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945年11月，范文澜在延安写成《中国近代史》上册，1947年秋出版发行。该书第八章以“对抗瓜分野心的义和团反帝运动”为题论述了义和团运动，着重从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分析了义和团的起因，再加上外国侵略和清朝的暴政，义和团运动终于爆发。义和团是中国人民自发的广泛的群众反帝运动，表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反抗精神，同时也教育了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抛弃了旧式农民起义，转向自觉的民主运动。

这一时期义和团运动研究中的主要问题包括有义和团的源流、义和团与近代教案的关系，义和团运动的起因和性质、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辛丑条约》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东南互保、驻外使节的活动、义和团盲目排外的落后性、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原因、义和团运动的地位与作用、义和团与五卅运动的比较研究等十几个方面，尽管此时的研究还处于起步时期^①。

二

对于建国后的义和团研究，不少学者是分为1949—1966年、1966—1978年、1978年至今这样三个阶段加以阐述的。这样的段落划分与学术讨论所处的社会政治氛围有关，不无道理。但就义和团研究的状况来看，实际上是形成了纪念义和团运动50和60周年、80和90周年以及100周年的数次研究的小高潮。

^①参见魏晓明：《建国前义和团研究史的考察》，《历史教学》1981年第7期；罗超：《建国前国内研究义和团状况述评》，《安徽师大学报》1982年第1期。

1950年是义和团运动50周年。经过长达百年浴血奋战争取到国家独立的人们自然忘记不了义和团反帝运动。在中国史学会拟定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时,《义和团》虽被列为第九种资料,然而却最先投入编纂与出版工作中去。1951年,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卷本由神州国光社出版,成为这套资料丛刊首批问世的史料。

资料丛刊《义和团》的出版,为史学研究提供了便捷查阅和较为丰富的史料,1955年义和团运动55周年之际与稍后,有关义和团研究的论著相继问世。1955年戴逸发表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柳志坚撰写的《义和团》,1956年丁名楠发表的《义和团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及其历史意义》、翦伯赞《义和团运动报告题纲(初稿)》、包村和朱愈分别撰写的《义和团》同名著作和三联书店出版的辑录建国初期纪念义和团50周年前后有关文章的《义和团运动史论丛》,1957年金家瑞撰写的《义和团运动》等,均推动了义和团运动研究的初步展开。

为纪念义和团运动60周年,史学界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此时,又是新史料的出版为研究工作起到了便利作用。1959年,由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纂的《义和团档案史料》由中华书局出版,将1896-1904年间的一些与义和团有关的上谕档、宫中朱批奏折、总理衙门档、外务部档等择其要者提供在研究者面前。这套上下卷本的档案史料与四卷本的资料丛刊《义和团》起到了互补的作用,着实为义和团研究的深入提供了资料来源。

1960年,可以说是义和团研究取得较大收获的一年。仅从义和团研究综述方面的论文来看,就有张奇谦、吴松龄、孙孝思、郑鹤

声、王介平、赵宗诚、王庭科、刘大年、黎澍、茅家琦、袁定中、许克华、史思群等人发表的一批研究成果^①。这一年在山东济南举办了纪念义和团运动 60 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会后编辑的《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由中华书局出版。该集所选的许多文章着重论述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和历史意义，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以及阐述山东、河北、天津、北京、山西、内蒙古、东北、河南、四川等地区的义和团活动。

1980 年的义和团研究，为近 20 年来研究工作的振兴与深化开了个好头。这一年的义和团运动研究在史学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热点之一。

这一年在山东济南召开的纪念义和团运动 80 周年学术讨论会可谓规模空前。会议期间把解放思想、各抒己见作为学术研讨的前提。因此，这次会议讨论的范围不但涉及义和团的性质与地位、义和团的源流、义和团与清政府的关系、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的评价等问题，而且从国际关系的视角研究了西方列强与义和团的关系，使研究视野大为开阔，会后由齐鲁书社结集出版了《义和团运动史讨论集》。在会议期间，还成立了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1980 年的有关义和团的史料出版颇引人注目。齐鲁书社出版了义和团的资料丛编《八国联军在天津》、《山东义和团案卷》、《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山东教案史料》等，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胡滨翻译的《英国蓝皮书有关义

^①参见吴士英编：《义和团运动史报刊文章索引》，《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546 - 547 页，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由中华书局出版，1983年中华书局还出版了有关山东巡抚衙门经办洋务交涉和拳教案件的文牍辑录《筹笔偶存》。义和团史料的大量编纂出版，推动了80年代的义和团运动研究。其中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廖一中、李德征等著的《义和团运动史》、由齐鲁书社出版的李文海、林敦奎等著的《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成为代表作。

从1980年起，有关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在各方面不但讨论得颇为热烈，而且颇有影响^①。其中有两个问题应当是讨论的热点。

第一，关于义和团在中国近代史中所处的地位问题。从50年代有关中国近代史分期与基本线索的讨论曾形成三次革命高潮说，义和团被列为第二次革命高潮。1980年《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了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一文，把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比作近代历史不断发展的四个阶梯，认为义和团运动时期反八国联军的战争同鸦片战争一样，不应作为近代革命的高潮。胡绳则在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导言中认为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应当是第二次革命高潮。显然，是把洋务运动还是把义和团运动纳入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成了讨论的焦点。于是，由此引起了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同时，怎样确定义和团运动的性质问题也引起学者们的广泛注意。这样，围绕着义和团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还是反帝而不反封建、义和团是一次反对外国教会侵略斗争的总汇还是具有反洋与反官府的特点、义和团运动

^①参见孙占元：《十年来义和团运动研究述评》，《山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

是一场对外战争还是兼反对外国教会侵略与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双重性质，学者们争论不休，而学术论争也促进了学术进步。

第二，关于义和团的爱国性和落后性的分析评价。《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和1981年第1期分别发表了王致中的《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孙祚民的《关于义和团的“奉旨造反”及其他》两篇观点截然不同的文章，引导了这一问题的讨论。王致中列举了义和团的种种蒙昧主义的表现，甚至认为对义和团笼统地冠以“爱国主义”的美称是一大悲剧。孙祚民则认为义和团的笼统排外，虽然属于一种蒙昧落后的表现，但却有着强烈的反帝爱国性质。与这个问题相关联的是对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的评价，李侃、廖一中、陈振江、陈月清、丁名楠等人对此就“扶清”与“灭洋”的含义和是不是一个策略提出了各自的看法^①。李文海、刘仰东另辟蹊径，发表了《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社会心理分析》一文^②，转换了一个视角来深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

此外，从教会、教案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入手，也数次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仅80年代就在四川成都、安徽绩溪、贵州贵阳召开了三次规模较大的近代中国教案与义和团的学术讨论会。一批有关教会、教案论著的问世，扩大了义和团研究的领域和视野。

1990年，在山东济南召开了“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国际学

^①李侃：《关于义和团运动评价问题》，《人民日报》1980年4月10日；廖一中：《论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陈振江：《义和团几个问题的析析》，《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陈月清：《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剖析》，《文史哲》1980年第5期；丁名楠：《义和团运动评价中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81年第1期。

^②李文海、刘仰东：《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社会心理分析》，《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

术讨论会”，讨论内容较为广泛深入，涉及近代农民问题、爱国主义问题、义和团的组织源流、义和团运动的社会环境、义和团的思想与文化、教会教案与义和团、义和团与清政府的关系、义和团与清末新政及中国近代化问题、义和团运动时期的人物评价、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国际关系、义和团与维新派革命派的关系等，会后齐鲁书社出版有论文集。

为纪念义和团运动 90 周年，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路遥的《义和团运动起源探索》、徐绪典、韩景琪的《义和团运动时期报刊资料选编》、李德征、苏位智、刘天路的《八国联军侵华史》，东方出版社出版有感其章、王如绘的《晚清教案纪事》，中华书局出版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的《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等一批著作和史料。此后，陶飞亚、刘天路的《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等论著都在不同的领域进行了拓展。

90 年代的义和团运动研究，基本上是对 80 年代研究的延续，尽管许多问题的讨论不像 80 年代那样热烈，却也在领域的拓展和研究的深入方面做了一些扎扎实实的工作^①。其中有关义和团与近代文化及社会状况的讨论^②、义和团时期有关人物及政治派别

^①参见余支政、张二平：《近十年义和团运动研究综述》，《史学月刊》2000 年第 2 期。

^②程啸：《拳民意识与民俗信仰》，《中国社会科学》1991 年第 3 期；张红琴：《略论民俗信仰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民俗研究》1992 年第 1 期；严昌洪：《义和团运动与民间风俗》，《史学月刊》1993 年第 1 期；欧阳跃峰：《义和团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近代史研究》1992 年第 1 期；林教奎：《社会灾荒与义和团运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1 年第 4 期。

的分析^①、义和团运动时期的中外关系和国际关系的讨论也颇为学界所关注^②。

当义和团 100 周年来临之际，史学界为改变前几年研究不力的状况，又加强了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1999 年在山东平原召开的纪念义和团平原起义 100 周年学术讨论会拉开了这一序幕。会后由齐鲁书社出版有杨文平、李德征主编的论文集。在 2000 年的前三个季度，研究义和团的论著陆续问世。有的学者关注对义和团运动研究回顾，苏位智、刘天路主编有《义和团研究 100 年》，山齐鲁书社出版，任灵兰、张春与李志军等分别撰写了义和团研究综述的文章^③，在其他著作的出版方面，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有王守中的《山东教案与义和团》、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有路遥主编的《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等书。特别是 2000 年 10 月中国史学会、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等单位联合筹办的纪念义和团运动 10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山东大学的召开，使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①赵春晨：《资产阶级维新派与教案及义和团》，《汕头大学学报》1991 年第 1 期；商鸣臣：《义和团运动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北方论丛》1991 年第 3 期；翁飞：《试论义和团时期的李鸿章》，《安徽史学》1991 年第 1 期；江中孝：《论孙中山在义和团运动期间的活动及其对义和团的态度》，《广东社会科学》1997 年第 2 期；季云飞：《义和团运动研究中若干问题新探》，《求索》1992 年第 6 期。

^②丁名栋：《德国与义和团运动》，《近代史研究》1990 年第 6 期；王晓青：《义和团运动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新探》，《历史教学》1993 年第 2 期；刘志义：《论义和团时期英国的对华政策》，《东岳论丛》1994 年第 3 期；李宏生：《义和团与国际公正舆论》，《山东师大学报》1991 年第 1 期。

^③参见任灵兰：《义和团运动研究综述》，《文史知识》2000 年第 9 期；张春、李志军：《义和团运动研究五十年述略》，《社会科学动态》1999 年第 11 期。

三

纵观 100 年来的义和团研究，实际上它是伴随着 20 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而前进的。对于 20 世纪中国历史学所取得的成就，戴逸在 1998 年中国史学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作出的归结认为，进化史观是 20 世纪中国历史学的显著标志；唯物史观的运用是中国历史学发展的伟大进步；理性的觉醒和理性精神的发扬；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各分支学科的开辟与创造和建立了全面系统的学科体系；远远超过以前任何时代的高质量史料的大批发现与整理出版等^①。回顾百年来义和团运动研究的成就与进展，与上述六个方面均有吻合之处。对于 100 年来人们为潜心于义和团运动研究的艰辛劳作和丰厚成果应当予以充分肯定。

当然，在回顾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学之际，也必须展望 21 世纪中国历史学的趋向，不少史学家已对此十分关注和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瞿林东指出，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学术领域，都不可能是纯而又纯的一种学派，但这并不意味着某个学术领域中沒有起主导作用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思想的存在。中国史学自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由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同中国史学史中的优秀思想遗产和历史进程相结合，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当今中国史学的主流。这个主流的存在和发展，一方面在历史观上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一方面在研究风格上具有鲜明的

^①戴逸：《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和展望》，《历史研究》1998 年第 6 期。

民族特点。从世界范围来看，这可以说是当代历史学的中国学派^①。唯物史观应当继续是 21 世纪中国历史学的理论指导，这已被中国广大的史学工作者所认同。因此，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也必须沿着这个方向前进。同时，对外国文化精华的汲取和外国史学理论的借鉴，也可以丰富中国的史学研究。由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一书，对西方近百年来的史学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不仅包括历史哲学中的主要学说的代表人物和著作评介，而且包括西方史学流派的概述，如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美国史学理论、法国年鉴学派、前苏联学者的史学理论研究等^②。于沛在《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一书中认为，体现人类文明新成就的思想、理论、方法的合理成分，逐步被中国史学工作者接触、消化与吸收，例如年鉴学派整体的经济社会史观、心理史学的精神分析理论、口述史学对民间史料的重视和发掘与利用，家庭史学对微观社会组织的深入解剖、计量史学对民间数据的精确化、模式化处理等^③。中国的史学研究近些年来正是不断地借鉴国外史学研究中的—些合理的成分，使—些以往不被重视的细节或薄弱的领域又被重视起来。义和团运动研究中曾出现过的诸多新问题也与此有关。

对于怎样进一步深化义和团的研究来说，有不少人认为该研究的课题已经被史学专家们研究透了，新的课题难以寻觅。这种认识不无—定的道理，但对事物的认识应当是永无止境的。从这

① 瞿林东：《坚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创新》，《求是》2000 年第 11 期。

② 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③ 于沛：《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个意义上说，新一代的研究者们还应鼓起勇气，积极开拓义和团研究的新领域。其实，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者中已有人在寻找新的研究视野和领域了。如辛亥革命史一向被视为中国近现代史中的“显学”，应当说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已经有了十分丰厚的研究成果了。然而，研究者们仍未白缚于现状，却是在积极地找寻着新的出路以保证这个领域的活力不减。严昌洪、马敏在《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一文中指出，近20年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其实正在悄悄经历一场研究范式的转移，只是还没有自觉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罢了。他们认为，这场研究范式转移的内容包括从革命向社会转移、从个体向群体转移、从表层向深层和基层转移三个方面。这表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范式正在发生革命，辛亥革命史研究正在融入“新史学”的潮流，渐次具备了“总体史”“综合史”的格局。下一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在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下，有可能实现由单一的政治史研究范式向“总体的”“综合的”社会史研究范式的转换^①。

如果以此来考察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在1980年和1990年前后两次义和团研究热中，不少学者已不再把义和团仅仅作为一次革命高潮来研究，而是把研究的视野不断加以扩大。当世纪之交纪念义和团运动100周年之际，展望下个世纪的研究趋向，笔者感到有以下两个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注重历史研究方法的继承与创新。唯物史观的指导无论是对建国前50年还是建国后50余年的义和团运动研究都有着

^①严昌洪、马敏：《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重要的意义，这样的研究方法论对于新世纪的义和团研究仍起着主要的指导作用。义和团运动作为一次群众的自发式反帝爱国运动，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确定这场运动的正义性和群众性特色是毋庸置疑的。其实，当史学理论界呼唤“历史降落民间”之际，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义和团运动并不是在这个方面无题可作了，而是有着更广阔和深厚的领域尚待开拓。既然是要写民间的历史，义和团的源流、构成、组织等也恰是出自民间。问题是在写这一民间历史的过程中，是否应借鉴或必需借鉴西方的史学理论。诸如已往有的学者从社会心理、民间调查等角度对义和团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应当说是受到了心理史学的精神分析理论、口述史学对民间史料的重视等史学理论的影响。继承中国业已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借鉴西方史学理论的精华，这样对史学研究来说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也许在这样的创新背景下才能不断地取得新的研究成果。

第二，注重把对义和团的研究与对它前后相关联的事件的研究有机地联系起来。义和团运动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应当把它置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范式下加以探讨。以往人们对与义和团运动紧密相关的教案问题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作了深入的研究，同时也就义和团与清末新政及中国近代化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仅就后者而言，应当把义和团运动放到近代社会转型的视角下加大研究的力度。义和团运动处于从戊戌维新到清末新政的两次新政之间，它对清末新政的出台确实起到了间接的催发作用。郭大松、廖一中分别撰文认为，义和团运动导致清末新政的出现，正是统治阶级中不同派别势力的消长及其思想

认识的转变，成为两大运动兴替至关重要的原因^①。也有学者认为，就义和团运动本身而言，它并不是近代化运动，但它却为清末新政的出台和中国的近代化起到了间接的促进作用^②。近代社会的转型问题是一个不同事件互动关联的近代化过程。即使从有关战争的角度看，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的近代化遭受挫折，但甲午战后中国的资本主义却又呈初步发展之势；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仅庚子赔款 4.5 亿两白银就给中国带来了沉重的包袱，用这笔款项可以创办 750 个福州船政局或 200 个上海机器织布局，但在 20 世纪初中国的资本主义仍在继续发展。这不是因为外国资本主义帮助了中国的近代化，而是中国内部的因素痛感民族的危难，中国的资本主义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压制下曲折艰难地前进。况且，戊戌维新继甲午战败而起，辛亥革命继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而兴，以及清末新政推行了十年之久且有立宪运动、挽回利权运动等事件的前呼后拥，都表明义和团运动的本身与前后均与中国社会的变迁有着重要的关联。

在纪念义和团运动 100 周年之际，人们不仅要反思一下这场震惊中外的大事件，诚如陈振江所言，我们既要实事求是地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深刻反思庚子困难的方方面面，同时亦要正视和反思造成庚子困难的各种内部因素，正确认识我国国情^③。20 世纪

^①郭大松：《义和团运动与清末新政》，《人文杂志》1992 年第 3 期；廖一中：《义和团运动与晚清“新政”》，《历史教学》1991 年第 5 期。

^②孙占元：《义和团运动与晚清社会》，《北方论丛》1991 年第 1 期；王兴业：《近代化在中国的嬗变与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史学月刊》1991 年 6 期。

^③陈振江：《庚子百年祭》，《文史知识》2000 年第 9 期。

的义和团运动研究已是成果丰硕，面向 21 世纪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应当在方法论的指导和研究范式的创新方面取得新的进展。

世界各国进步人士 同情义和团的正义呼声

王晓秋

今年是义和团运动 100 周年，百年前中国人民的这一场反帝爱国运动，曾在世界上引起轩然大波，欧美和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界、舆论界、宗教界发出一片喧嚣，各国的报纸、杂志上充斥着对义和团的各种诬蔑攻击言论。某些资产阶级政客、议员和教士、记者，拼命煽风点火，挑拨对义和团的仇恨。他们把义和团描绘成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制造了种种义和团杀人放火、“把外国公使和传教士撕成碎片”的谣言，进而叫嚷“中国人仇视欧洲人”，

“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义和团要毁灭西方文明”。甚至捏造中国人企图征服全世界的所谓“黄祸论”也甚嚣尘上。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和御用文人千方百计通过攻击义和团、煽动仇华情绪来为其侵略掠夺中国和镇压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政策制造舆论，并立即拼凑了几乎包括当时所有帝国主义强国在内的八国联军，发动了一场大规模侵华战争。

面对这一片咒骂义和团的喧嚣声，俄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挺身而出，在 1900 年 12 月俄国《火星报》第 1 号上发表了《中国的战争》一文。他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有力地驳斥了帝国主义的种种谬论，肯定了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者对民族解放运动应抱的态度。列宁一针见血地深刻指出：“试问，中国人对欧洲人的进攻，这次遭到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等等疯狂镇压的暴动，究竟是由什么引起的呢？主战派硬说，这是由于‘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引起的’。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 年英法对华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列宁还愤怒斥责那些“向政府和大财主摇尾乞怜的记者们，拼命在人民中间煽风点火，挑起对中国的仇恨。”他尖锐地揭露：“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

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它们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的,而是像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就在这些基督徒立功的时候,他们却大叫大嚷反对野蛮的中国人,说他们胆敢触犯文明的欧洲人。”^①

各国工人阶级和进步人士也对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给予同情和支持。1900年6月19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刊登了题为《铁拳》的社论。文章响亮地提出:“如果说有所谓‘神圣的战争’,那么,中国奋起抗击以主子姿态出现的外国剥削者的战争,正是这样一个‘神圣’的民族战争。”社论尖锐地责问:“是谁给了外国人要求中国人放弃他们原有的信仰并强使他们信奉其教义,即同‘基督教’列强的行为大相径庭的宗教的权利呢?是谁给了外国人瓜分中国人的国家并强迫他们接受外国工业品的权利呢?”《前进报》最后认为“中国在其维护本国领土和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应该同布尔人一样得到一切具有政治道德的朋友的同情。如果我国青年正在东亚的战场上流血,我们当然为他们的牺牲而伤心,可是对于他们的敌人,我们却不能不寄予同情。”^②

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倍倍尔 1898年2月3日在德国帝国议

^①列宁:《中国的战争》,俄国《火星报》第一号,1900年12月。中译文见《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一卷,第213—21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铁拳》,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社论,1900年6月19日,中译文见《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5期第6—7页。

会上，严正谴责德国政府以保护基督教为名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的行为。他说：“不，这不是什么十字军东征，也不是什么神圣的战争。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掠夺战争和报复行为，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暴力行为”。^①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在一次演说中也表达了对义和团运动的深切同情。他说：“义和团是爱国的，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前一天，马克·吐温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的同情是在中国人民一边，欧洲掌权的盗贼长期以来野蛮的欺凌中国，我希望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轰走，永远不许他们再回去。”在一篇题为《十九世纪致二十世纪的祝词》的文章中，马克·吐温用辛辣的讽刺笔法写道：“我把这位名叫基督教的尊严的女士交给你。她刚从胶州、满洲、南非和菲律宾的海盗袭击中回来，邋里邋遢，污秽不堪，名誉扫地。她灵魂里充满卑污，口袋里塞满贿金，嘴里满是虔诚的伪善话语。给她一块肥皂和一条毛巾，但镜子可千万要藏起来。”马克·吐温还在《北美评论》上撰文痛斥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梅子明（William Scott Ament 1851—1909年）在中国侵略掠夺的丑行。1900年圣诞节前夕，美国《纽约太阳报》报道梅子明“不论走到哪里，都要强迫中国人赔款。他已为每一个被害教徒索取三百两银子，并强迫对所有被损毁的教徒财产给予全部赔偿，他还征收了相当于赔款十三倍的罚金，这笔钱将用来传播福音。”马克·吐温看到这条消息，当天晚上就极其愤慨地写道：“梅子明先生为了清算别人的罪行，从贫困的中国农民身上榨

^① 倍倍尔在德国国会的发言，《德国帝国国会 1900—1902 年会议期间速记报告》第一卷第 35 页。

取十三倍的罚款，因此让他们、他们的妻子和无辜的孩子们势必慢慢地饿死，而可以把这样获得的杀人代价用于传播福音。他这种搜刮钱财的绝技，并不能使我心里感到意外。他的言行，总的看来，正具体地表现出一种褻渎上帝的态度，其可怕与惊人，真是在这个时代或其他时代都是无可比拟的。”^①

热情支持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日本人士宫崎滔天也发表了谴责帝国主义侵华和同情义和团的言论。他曾用白寅学人的笔名，在 1900 年 3 月的日本《二六新报》上连载《独酌放言》一文，借用酒后放言的形式，谴责西方传教士是“政治家的爪牙”；“挥舞着博爱人道大旗，却干着盗贼媒介的勾当”。宫崎滔天慷慨陈词：如果遭到列强瓜分的灾祸，作为中国人应该怎么办？“那就只有去当义和团了”。“你如果生在中国，你也会参加义和团去和八国联军拼个你死我活吧？”^② 在当时日本人士同情义和团的言论中最突出的一篇文章是青柳猛写的《义和团赞论》，刊登在 1901 年 2 月 25 日发行的《女学杂志》513 号上。该文一开始就指出，尽管当前世界舆论都把义和团描绘成一群暴徒，而怜悯在华外国人的遭遇，但是作者却坚定地认为更值得同情的却正是“那些集全世界的恨怨于一身，成为万人咒骂对象的义和团徒。”他严正指出：“应该痛责的恐怕并非是义和团，而是那些外国人，那些顽固恶劣的耶稣教徒，特别是依仗外国政府的势力而骄横妄为的传教士们。”文章有力地阐述了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青柳猛把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形

^① 马·克·吐温：《给坐在黑暗中的人》，美国《北美评论》，1901 年 2 月。

^② 宫崎滔天：《独酌放言》，日本《二六新报》，1900 年 3 月。见《宫崎滔天全集》第 3 卷，第 10—12 页，平凡社，1972 年。

象地比喻成“如同手持凶器抢劫的强盗，擅自侵入民宅，肆意掠夺”；“对这种暴徒自然很难用和平手段说服，只有诉之武力。”他指出：“为了防御手持凶器的强盗而拿起刀枪，决没有罪，在哪一国的法律上也应属于正当防卫，不能问罪。”正是由于外国传教士依仗殖民势力在中国横行霸道，为非作歹，才引起中国人民的痛恨和反抗，因此青柳猛大声呐喊：“只知谴责义和团，而对那些外国传教士和耶稣教徒可鄙的行为保持沉默，这是任性胡说，也是极不公平的！”“我认为义和团是值得同情的，而应该谴责的恰恰正是外国人（包括日本人）和他们卵翼下的耶稣教徒。”^①

读了以上外国人士的言论，可以加深我们对义和团反帝运动原因、性质和历史意义的认识，也可以有力地驳斥那些对义和团运动的种种污蔑攻击，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及其庇护下的传教士的侵略罪行。同时还说明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并不是孤立无援的，即使在当时就曾赢得世界各国具有正义感的进步人士的同情和声援。

^①青柳猛：《义和团辩论》，日本《女学杂志》513号，1901年2月。

八国联军侵华暴行实录

庄建平

1900 年

1 月

27 日英、德、法、美等国驻华公使照会清政府，要求公开宣布镇压大刀会和义和拳。

是月 英军侵犯云南片马附近的小江，并侵占茨竹、派赖、滚马等寨，焚毁民房，肆意掠夺，并枪杀土弁士兵 100 余人。

2 月

13 日 英军强占滇边片马，并伤毙土民土

练百余人。

4 月

6 日英、美、德、法四国公使限令清政府在两月以内铲除义和团，否则将代为剿平。

12 日俄、英、法、美等国军舰糜集大沽口，进行武装示威，蓄谋伺机挑起战事。

5 月

29 日 大沽口外的各国舰队奉命向天津派遣海军陆战队。各国驻京领事要求直隶总督裕禄备车送其“使馆卫队”入京。

31 日 裕禄奉命备车放行，英、美、意、日、法、俄六国侵略军 356 人当晚抵京。

6 月

1 日 德军 50 名由天津乘火车入京。

3 日 奥军 30 名由天津乘火车入京。

10 日 英国的西摩尔中将率领联军士兵 2053 名分公批乘火车由天津向北京进犯。在廊坊地区遭到中国军民顽强抵抗。

◎俄国西伯利亚第十二团 1600 人山旅顺开往天津，12 日，俄军在大沽登陆。

15 日 驻天津俄军抢占天津老龙头火车站。

16 日 各国舰队司令向大沽炮台守将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令其交出炮台，遭到拒绝。6 月 17 日，联军攻占大沽炮台。

22 日 西摩尔联军进犯北京受阻，向天津撤退，途中占领西沽武库。

23 日 英军攻占并焚毁天津陆师学堂。

26 日 上海道余联沅代表刘坤一、张之洞，与各国驻上海领事举行会谈提出《中外互保章程》和《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嗣后由于领事团拒绝签字，互保章程没有订立，但“互保”的局面维持下来。

27 日 八国联军侵占天津东机器局。

7 月

3 日 美国提出第二次“门户开放”政策。

9 日 一股日军攻占天津南郊的纪家庄，疯狂烧杀。整个村庄被烧毁，上千名义和团民和无辜百姓被杀戮。

14 日 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城。城破后侵略军在天津进行疯狂的烧杀淫掠。

15 日 八国联军对天津城实行分区占领：日军管理东北方，美军管理东南方，英军管理西北方，法军管理西南方。

17 日 俄军制造惨绝人寰的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大血案。

是月中旬 俄军分兵七路，大举入侵东三省。

30 日 八国联军成立“天津都统衙门”，对天津及其周围地区

进行军事殖民统治。

是月下旬 沙俄公然不顾国际公法，派彼什科夫率领上乌丁斯克团第四、第五两连哥萨克兵，越过国境，强行进驻库伦，并在俄国领事馆四周架设铁丝网，挖壕固守。

是月 俄军占领天津总督衙门作为兵营，将衙门里的档案文件书籍全部毁掉。

◎ 日军抢劫长芦盐运使署白银 200 多万两。美军从该处地下挖掘出价值几百万元的纹银，悉数囊括而去。俄、英、法军也从该处抢走难以数计的银两。

◎ 俄军把天津造币厂的几百吨存银抢劫一空。

◎ 美军劫取天津铸造局价值 37.6 万余美元的白银。

◎ 八国联军将天津道署、天津府署、天津县署及其他各官署的银库存银洗劫一空。

◎ 俄军在所占据的天津炮台、火药库、营盘、东局子以及李鸿章的宅邸内掠获了 300 余门火炮、大批弹药和各种有相当价值的财物。

◎ 美军在天津南门军械所内掠获了 40 门克虏伯炮和新式鲁登佛特炮、大量的小武器及包括各种口径炮弹在内的大量弹药。

◎ 日军在天津水师营及海关道衙门等处抢获各种枪支 800 多条、火炮 8 门及大量的弹药。

8 月

3 日 俄军占领哈尔滨。俄军对周围村庄悉行烧杀，遭害者

不下数千村，被杀者不下万户。

4 日 八国联军由天津向北京进犯。至 11 日，相继占领北仓、杨村、蔡村、河西务、马头、张家湾。12 日占领通州，兵临北京城下。

◎ 俄军占领营口，并擅自制定《营口管理条例》设置民政厅，警察局和司法机关，实行殖民专制统治。

5 日 俄军攻占瑗珲城，烧杀劫掠，使这座具有 200 余年历史、上万人口的古城化为灰烬。

12 日 天津都统衙门出示晓谕，将天津城厢划分为八段管辖。

14 日 八国联军对北京城发起总攻击。次日，北京沦陷，慈禧携光绪出京西逃。

◎ 俄陆军中将格里布斯基将黑河屯和瑗珲城分别改称“伊里亚哨所”和“玛丽娅·玛格里达丽娜哨所”，并带领官员、军队和宗教人士在黑河屯的废墟上开庆祝会。

16 日 八国联军长官特许军队在北京公开抢劫 3 日，其实公开抢劫了 8 天。在联军的烧杀淫掠下，占都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和蹂躏。

19 日 俄军抢先占领颐和园，至 10 月 2 日撤离。10 月 3 日，英、意联军继占该园，至翌年 8 月 27 日撤出。俄、英、意在占领期间，将颐和园内陈设的珍宝窃掠殆尽，并对园内建筑大肆破坏。

20 日 清政府以光绪帝名义发布“罪己诏”，向列强政府赔礼致歉。

是月中旬 联军司令官经开会讨论，决定由日、俄、美、英、法、

德、意七国侵略军对于北京的皇城、内城和外城实行分区占领。

28日 3000余名联军及各国使节和司令官在大清门前举行阅兵式，阅兵式后又至紫禁城游行。

29日 俄军占领齐齐哈尔，黑龙江省失守。俄军入城后，先将将军府什物掳掠一空，继将练饷、兵饷及各杂款银钱，并军械、军装、火药库、军器库及一切官物尽行强占和劫走，又将各官署所存储书籍、律例、案卷、舆图、藏经、战图等搜罗一空。

◎ 八国联军在庄王府杀害义和团民 1700 余名。

◎ 京城内文武大小官绅耆民等不堪联军暴施淫威，阖家或引火自焚、仰药以死、投井而死者 1798 人。

◎ 俄、德、日军先后以守卫紫禁区域的名义，以及其他各国侵略军以“参观”的名义，偷窃和破坏紫禁城内的稀世文物、珍本图籍和金玉宝翠。至 1900 年冬天，宫内已所失过半，贵重之物被劫掠无遗。

◎ 八国联军洗劫南海、中海和北海。

◎ 天坛、先农坛、社稷坛、太庙、嵩祝寺等神坛庙庵被联军占为驻兵地点。各坛庙内的金、银、铜、瓷、锦祭器和家具被八国联军抢劫，其中天坛损失祭器 1148 件，社稷坛损失祭器 168 件，嵩祝寺被俄军抢劫一空。

◎ 日军从户部银库抢走银子 291.4856 万两，从户部的缎匹库和颜料库抢走无数的綾罗绸缎，从内务府的官三仓、恩丰仓和官房租库抢走所存的 32 万石米和全部银两。

◎ 八国联军焚烧翰林院，《永乐大典》又失去 307 册，其他珍贵经史典籍被毁 4.6 万余本。

◎ 八国联军将钱法堂的安息万串新铸铜钱、禄谷仓的数万石积年陈米、太常寺和光禄寺的金银器皿和銮驾库的各色御用车马搜索一空。

◎ 法军从礼王府抢走 200 余万两白银和无数古玩珍宝。

◎ 法军从户部尚书立山的家里抢劫 365 串朝珠和约值 300 万两白银的古玩。

◎ 日军从前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宝 璠的府第中抢走藏在井中的 30 万两白银。

◎ 法国主教樊国梁从立山家抢走价值 100 万两的珍宝。

9 月

8 日 驻津联军前往“天下第一团”的根据地独流镇镇压义和团，肆意杀人毁屋。尸横街市，大火几天不熄。

11 日 俄军占领吉林省伯都讷城。俄军抢劫白银 32499 两又 11 箱，吊钱 1144 万千，谷物 2394 仓石，以及副都统衙署的全部档案。

◎ 德军 1700 名侵扰北京西南面的良乡县城，枪杀居民 250 人。

16 日 八国联军袭击八大处义和团，打死团民 30 人，烧毁了被义和团作为活动总部的灵光寺、证果寺，并炸毁宝塔一座。

18 日 日本侵略军在大兴县庞格庄一带杀死义和团民 24 人。

19 日 八国联军在京郊西山观音村镇，炮毙义和团民 100 余

人。

20 日俄、德、法、奥、意、英六国侵略军攻占北塘炮台，翌日，俄军侵占芦台，27 日又焚毁唐山火车站。

23 日 俄军侵入吉林城，吉林省全部沦陷。

25 日 清政府屈从于德国的“惩凶”要求，发布上渝，宣布对载勋等 9 名王公大臣予以革职、停俸，交有关衙门议处惩罚。

◎清政府向德国、日本发出国电，对德国公使克林德、日本驻华使馆书记官杉山彬之死表示哀悼和歉意。

28 日 俄军占领开平、古冶，向山海关进犯。

30 日 英军抢先占领山海关。

10 月

1 日 俄军占领盛京(沈阳)。

2 日 八国联军占领山海关和秦皇岛。

5 日 俄军攻占巴彦。12 日，又攻占呼兰。俄军占领两处后，杀伤无辜平民 218 人焚毁房屋 2004 间，损伤庄稼 2 万余晌。

10 日 俄军治永平府的治所卢龙城，因搜出快炮等武器，便以有助“拳匪”嫌疑为名，将知府重燠等人抓起来，百般凌辱，并押送到旅顺口。后几经交涉，于次年一月发回。

12 日德、法、英、意四国联军组成四国远征队，分别从天津、北京出发，向保定进犯。

16 日英、德签订关于瓜分中国扬子江流域利权的《英德协定》。

18日 法军数千人侵入正定，将该镇枪械抢劫一空，并殴打正定总兵董履高。

20日 德国闯入青县，逮捕县令并折磨致死，杀害绅民 5 人，并大肆搜括钱帛等物，肆虐四天始离去。

25日英、意、德、法四国联军血洗易州孤山村，屠杀 73 人，打伤 100 多人，焚毁房屋 1000 间。同日，侵略军抢劫西陵，仅金、银、铜、木等祭器就被盗劫 5516 件。

◎ 德军侵入完县，杀害知县、典史、外委，并肆意毁坏庙宇，又把五里岗村付之一炬。

29日 四国联军攻打紫荆关，中国守军英勇抵御，阵亡 60 名，受伤 20 余名，退至浮图峪。

31日 英军侵扰直隶永清县，扣留县令勒索赔银四万两。

是月 保定布政署由侵略军划归英军占领区，英军不时到大堂寻衅，毁坏无数档册，并将司库存银 16 万两抢劫一空。

11 月

6日 四国联军在保定设立“国际军事法庭”，审讯他们 10月 23 日晚以纵容资助义和团等罪名拘捕的布政史、城守尉、参将、按察史和直隶候补道 5 位中国官员。结果将 3 人判死刑，1 人革职，1 人解往天津继续受审后来也被天津都统衙门处死。

7日 联军侵扰遵化州马兰峪清东陵。

8日 联军侵扰直隶迁安县。

◎ 革职道员周冕与俄在旅顺议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 30

日，盛京将军增祺在章程上画押签字。

9日 八国联军将天津郊区王庆坨村全部烧毁。

12日 德、意、奥三国侵略军由北京向张家口进犯。17日，侵入宣化。19日，侵占张家口。三国联军沿途滥杀团民百姓，并在鸡鸣驿、宣化、张家口等地勒索8万两白银和大批牲畜及昂贵的毛皮。

13日 沙俄财政大臣维特、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代理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拟定《俄国政府临理满洲原则》，把东三省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完全置于俄国军事与财政当局的监督和控制之下。

12月17日，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了这一原则。

17日 德、意、奥三国联军侵入宣化城，勒索“保险费”银2万两。

20日 法军进驻山西门户获鹿。

◎ 法国驻天津总领事杜士兰擅自发布扩展法国租界的通告。

21日 德军直扑安子岭和龙泉关，企图进犯山西。

24日 德、法联军在保定设立“权理保阳司”，加强对保定地区的军事殖民统治。

◎ 意大利侵略军封锁固安城，围困全城文武官员，逼交军械。意军将各衙署营寨的枪械、银两、马匹掠劫一空，杀害勇从20人，经绅董许给白银8000两、给通事银2000两，始撤兵出城。

是月，德军人永平，将东街抢劫一空，并索银8000两。

12 月

4 日 德军侵占沧州,肆虐 8 天始退,继而南下,先后侵占南皮、盐山、庆云、吴桥等县及东光、泊头等镇。

5 日 德军袭击直隶容城县。

10 日 八国联军成立“管理北京委员会”。

◎ 法军进犯井陘东天门。次年 1 月 28 日,法军再次进犯东天门。

15 日 以法军为主的联军侵扰直隶束鹿县。16 日占领束鹿,遭乡民袭击,联军架炮轰击,焚庐舍 2000 余间,伤 4000 余人。

26 日 沙皇批准俄政府拟定的“单独协定大纲”。其基本原则是巩固《俄国政府临理满洲原则》的效力,从中国取得“价值相当的特惠”,以充当赔款,保持俄国在满洲的驻军权。

27 日 清政府李鸿章等接受列强提出的苛毒的《议和大纲》12 款。次年 1 月 15 日在大纲上签字画押。

30 日 李鸿章与沙俄公使格尔斯签订《天津租界条款》。旋各列强相继发出照会,签订条款,抢占和扩大天津租界。

是年秋 德军侵扰抚宁,诈银 2000 余两。

◎ 联军入昌黎县安山站,惨杀商民 70 余人。

◎ 联军骚扰迁安,索赔教款数 10 万两,勒索军费 8000 两。

是年冬,八国联军从保定分兵三路,进犯山西省境。

1901 年

1 月

17 日 沙俄代表凯列尔与德军参谋长签订铁路移交协定,规定俄军将杨村至山海关的铁路移交给德军,但仍占有山海关车站,并将全线的车辆带走。山海关至牛庄的铁路仍由俄国代管。

21 日 天津都统衙门下令把已有五百年历史的天津城墙全部拆尽。

2 月

13 日 清政府按照列强的要求,发布加重惩处“祸首”的上谕。

◎ 1000 千余名德军闯至永清县,遽行开枪,毙杀中国兵民 200 余人,最后强行索银 1 万两始离去。

19 日 德军由沧州侵入青县。

20 日 德军占广昌城。旋继续西犯。占领艾河。21 日,再占安子岭。

27 日 英国从德国手中接管北京至山海关的铁路。

3 月

8 日 德军攻占山西五台城岭村和铜钱沟。

14 日 德军进犯五台县的横岭村,并北窜五台山。18 日、19

日山西巡抚锡良派代表与德军官订约五条：距长城岭 60 华里以内不驻清军，德军以长城岭西 40 华里为限，两军中间留隙地 20 华里，行人往来须执白旗，两军彼此可通往来。次年 5 月，驻扎此地的德军才完全退出晋境。

是月，俄国外交部驻吉林、黑龙江两省办理交涉事务大臣刘巴、与吉林将军长顺订立《矿务草约》，取得了勘探、开采吉林省金矿的权力利。

4 月

23 日德、法侵略军兵分四路，侵入山西，攻打娘子关和周关。

29 日 清政府为满足帝国主义列强的要求，以义和团运动期间焚烧教堂，伤害教士、教民，致酿事端等罪名，发布上谕，惩处地方军政官员 56 名。

5 月

10 日 德军再犯张家口。13 日，将驻防旗营引燃，焚毁营房数十所，炸死数十人。

26 日 清政府被迫同意列强提出的 4.5 亿两赔款。

30 日 清政府同意驻华公使扩大使馆区。

是月 俄国驻京领事波佩与天津河间道张莲芬等签订协定，正式划定俄国在天津的租界，占地 5474 亩。

◎ 俄国交涉员科夫与长顺在哈尔滨签订《续订吉林开办金矿条约》，取得了勘探夹皮沟、宁古塔、琿春三处金矿的权利，并规定无论股份若干，总以俄出股份占多半。

6 月

3 日 清政府发布上谕，惩处 11 名地方官员。

4 日 清政府派醇亲王载洋为头等专使，就克林德案赴德国谢罪。

16 日 清政府派那桐为专使，就杉山彬案赴日本谢罪。

25 日 清政府为德国克林德在北京被杀处建立牌坊。

7 月

14 日 沙俄尤哥维奇与长顺签订《改订吉林开采煤斤合同》规定东省铁路公司在吉林享有探看煤苗、开控煤斤的擅专之权。

20 日 德国驻天津领事秦莫漫与张莲芬等签订协议，新扩充了占地 3166 亩的租界。

23 日 沙俄科洛特科夫与黑龙江将军在黑龙江签订《黑龙江省采勘矿苗草约》。沙俄夺取了黑龙江省五段（自达赉诺尔湖至北五寺河、自北五寺河至呼玛河、自库马尔河至瑛瑛城、自瑛瑛城至观音山、自托罗山以下入松花江处起至都鲁河口）金矿的采勘权。

24 日 清政府同意列强的要求，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

8 月

19 日 清政府在发布上谕,惩处 58 名地方官员。至此,清政府为满足帝国主义列强的要求,前后共惩处各级文武官吏 100 余人。

9 月

7 日 李鸿章等代表清政府,与德、俄、美、日等十一国公使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15 日 “关东省”行政首脑阿列克谢耶夫批准《旅顺暂行管理条例》,在旅顺市成立市议会。

1902 年

1 月

14 日 沙俄尤哥维厅与萨保订立黑龙江省采煤合同,规定东省铁路公司在铁路两旁各 30 里内有采煤专权,30 里之外有开采优先权。

30 日英、日两国背着中国和朝鲜签订涉及中、朝两国主权的第一次《英、日两国同盟条约》。

2 月

6 日 比利时驻天津领事嘎德斯与张莲芬签订《天津比国租界合同》，又称《天津永代租地协定》，正式划分比租界，其面积为 740.5 亩。

4 月

8 日 清政府与俄国签订的《交收东三省条约》在北京签字。在条约签订之前，沙俄代表璞科第曾向清政府代表贿赂 3 万两银子。

著名天主教 学者孔汉思访谈录

李平晔 韩 松

孔 汉思(Hans Küng,又译“汉斯·昆”),著名天主教学者,1928年生于瑞士,现任德国图宾根大学荣休教授,并曾担任图宾根大学普世宗教研究所所长。主要著作有:《基督教和世界宗教》、《中国宗教与基督教》、《当基督徒》等。自1979年以后多次来中国访问讲学。他是宗教对话的倡导者,曾为1993年在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议会大会上达成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的主要起草者。他把宗教对话与世界和平联系在一起,提出了著名的论断: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就没有世界和平,没有宗教间的理解就没有宗教间的和平。

2000年9月,孔汉思教授应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邀请来华讲学,9月23

日，孔汉思教授在下榻的北京国际俱乐部饭店接受了《中国宗教》杂志记者的专访。

问：您来过中国多次，在世界伦理、宗教对话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非常有造诣，在中国和世界的学术界、宗教界非常有名气。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有这样的机会与您探讨一些问题。如宗教对话，在国际上是一个热门话题，在中国的讨论也非常多，是您把宗教对话与世界和平联系在一起。在本世纪末，宗教冲突此起彼伏，特别是亨廷顿也提出了文明冲突论，我们想问，您所提出的宗教对话在下一个世纪的可能性，以及它对于宗教间和平和世界和平的意义。

答：宗教可以被人在好的方面应用，也可以被人在坏的方面应用。宗教是人心灵深处的一种东西，它与人的深层情感有一种关联，所以特别重要。受宗教鼓舞的这些人有一种献身精神，甚至完全牺牲自己在所不惜。这种献身精神可以从好的方面去运用，也可以从坏的方面去运用。从坏的方面去运用，可以举出好多例子，当然也有好的例子，如南非种族歧视被结束，在相当程度上与宗教的作用是有关系的。早在亨廷顿发表文明冲突论 10 年以前，我就提出了另一个立场，即没有宗教的和平就没有世界的和平，没有宗教的对话就没有宗教的和平。亨廷顿的观点是很荒谬的，好像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一定要有冲突，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一定要有冲突，其实，不同文化之间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和平的前提是对话。

问：从中国近代史来看，西方基督教、天主教传入中国，是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中国紧密相联的。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传教士起了不好的作用。您怎么看待传教士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

答：确实，近代史上，基督教传教士与军事的力量有时候是关联在一起的，特别是在中国。这与当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有关系，这是很不幸的，但这是事实。否认这一点是很荒谬的。

问：与这个问题有关的，您可能知道，最近罗马教皇要册封 120 个圣人，其中有 80 多个是在 1900 年义和团运动中致命的传教士和教徒，在被封圣的人当中，有一些人在中国下了坏事，是有劣迹的，而且梵蒂冈选择在中国的国庆日举行封圣仪式，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答：作为一个天主教的神学家，如果在北京对梵蒂冈的作法作评价，是非常困难的，也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可能会被人看成是在一个共产党的国家被召来做这样一件事。但是，我又是一个独立的学者，我会在北京和梵蒂冈说同样的话。我一直觉得非常疑惑，为什么罗马教廷把这种宗教事务变得越来越政治化。我宁愿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历史上，政治化的例子很多，如非常开放的约翰二十三世和非常保守反动的庇护九世在同一个仪式上被封圣，这种做法是非常矛盾的。为了了解传教士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还要考虑义和团的例子。事实上，义和团最开始不是反传教士的，到义和团运动第三阶段才反对传教士。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在 19 世纪的后半叶，传教士越来越多地涉及到西方列强的活动中，即传教士与中国社会前后期关系的变化。罗马教廷方面应该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传教士的问题；一个是所谓基督教国家列强干涉的问题。实际上，在义和团运动中，被中国人反对的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而是完全政治化的西方列强。所以我认为，梵蒂冈方面不应把这些传教士神化。

问:近年来,中梵双方开始有所接触,而在这个过程中,梵蒂冈突然提出将封圣 120 个人,这对将来的中梵关系会产生什么影响?

答:西方对中国 1949 年以后的成就应该给予肯定,中国社会实际上在前进,罗马教廷应该认识到这一点。中国要求教会实行三自,我觉得很好,没什么问题,这也是许多天主教国家的共同要求,不会损害中国与梵蒂冈的关系。其实,自圣没有问题,我们教区的主教就不是梵蒂冈任命的,而是选出来的。自圣在天主教国家里是很普遍的,很多主教都是自选自圣的,这已成为世界的一种趋势,在自己的国家里选自己的主教,如维也纳、科隆等地主教都是自选的,教廷也承认。如果是在中国自选主教,完全是可能的,不应该成为问题。当然,关于政府和主教任命间的关系问题,在德国和瑞士,政府可以对主教候选人表示意见,但不能直接干涉。最后还是由教会内部来决定。政府对候选人表态,一定有重要原因,政府可以否决,但不等于政府可以任命,这是需要特别强调的。我对中梵关系很关心,但中梵关系的进展,双方对话的基础应该是真理。

问:国际上对梵蒂冈的管理体制的批评很多,特别是您对教皇永无谬误的信条提出了质疑。在现代社会日益发展、日益多元化的情况下,教皇这种体制有没有可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行改革,以适应社会。如梵二会议就有许多改革内容。

答:梵二会议的目的是促动一种范式的转换,而原来的梵蒂冈错过了这种范式的转换。罗马天主教会传统的最重要基点是十一世纪格列高利的宗教改革,在改革前本没有教权等问题。此后罗马天主教传统受到两个挑战,一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一是启

蒙运动。罗马天主教会一直坚持对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包括法国大革命持批评态度。所以在梵蒂冈大公会议以前，罗马天主教会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直到梵二会议，罗马天主教才向世界打开它的窗户。梵二会议确认了许多宗教改革者的意见，比如确认了地方教会的自主权，确认了教会仪式的本地化，用本土语言，而不是拉丁语进行教会活动等。这些都是宗教改革者的意见。梵二会议也确认了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关于现代社会的许多原则，尤其是民主、宗教信仰自由、人权等项内容。同时也确认了基督教教会内部的人道主义原则，接受了不同的信仰，包括犹太教、伊斯兰教，也包括东方的一些宗教传统，也向世俗社会打开了门窗，接受了现代化的成果，如达尔文的进化论等。在梵二会议上，大多数人都持这种进步的观点，但还有一些人实际上持否定态度，所以你会发现，在梵二会议的文件中，有许多东西是两者的产物，两种不同的观点都有。所以一直有人希望重新获得教会的权力，重新去控制其他的地方教会。约翰二十三世去世以后，保罗六世在很长时间举棋不定，不知该倾向哪一方，而保罗二世则是倾向比较保守一方的。

问:在与中国不断接触的 20 多年中，您感觉中国宗教有什么变化？

答:变化很大,很明显,而且不仅在宗教问题上,各方面变化都很大。我第一次来中国时(1979 年),在北大讲课,发现所有的人都很胆怯,没有什么特别积极的回应,甚至问到关于儒学的问题时,中国人都不太愿意说。而现在已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开放地讨论。

问：作为一位国际上天主教的著名学者，您对中国宗教界有什么话要说？

答：如果可以对基督教会说些话，我要这么说：希望他们能促进自身的团结。中国基督教会的团结是由政府来促使的，这其实也不是坏事，如果他们真的能相互合作，对基督教的发展，对双方的合作都是有好处的。希望他们能真正发展一种团结。

如果对中国各个宗教说些话，我要这么说：在各种不同宗教中，仅有一个独一的宗教是不可能的，用一种宗教的价值统一所有宗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各种不同的宗教中，能够合一的就是和平，就是宗教的和平。现代社会中，没有一种宗教能够统辖其他宗教，包括梵蒂冈，现在已不可能变成一种至高的宗教，来高于其他宗教之上。在不同宗教之间，第一步是互相了解，第二步应该是寻找共同的一些准则、价值，第三步就是彼此合作，接下来就是能够造福全人类。尽管教义不同，但不同的宗教应该都能够找到共同的价值、共同的伦理、共同的标准。



1870年6月，因外国传教士虐杀中国儿童，法国领事丰大业开枪打死中国人，天津人民愤而火烧法国教堂“望海楼”。上图为版画“火烧望海楼”；下图是被烧毁的“望海楼”遗址

